

周易

张朝松 张朋 著

十日谈

上海辞书出版社



走进《周易》

——代序

茫茫上古时代，伏羲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观察地理，观察了鸟兽的花纹和人间的各种现象，根据事物和自身的某些特征，画成了八卦。这就是华夏《易经》的起始。后经文王演为六十四卦，至周公选编卦爻辞，而终告成，名之《周易》，以别于其之前已失传的《连山》、《归藏》。

《周易》是一部包罗万象讲道理的大书，上有天道，下有地道，中有人道。《庄子·天下》说：“《易》以道阴阳。”《周易》所阐述的阴阳及其消长变化，就是最根本的大道。这正如《周易·系辞》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譬之于自然界的昼夜、四季更替——白天过去了，黑夜来了；秋冬过去了，春夏来了。自然界这一阴一阳的交替，表现在《周易》的卦象中，就是阴爻和阳爻的交替和变化，而所谓阴爻和阳爻的交替变化，简单地说，无非也就是一个去了，一个来了。去了一爻来了一爻，卦就变成另一卦。《周易》正是用卦象的变化，象征着天地之间不停的变化，而所谓变化，就是一个去了一个来了。变化，是天地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周易》要表现的最基本的道理。这样的道理慢慢地讲得多了，逐步地讲得深了，就渐渐地变成了今天所说的哲学。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说明孔子晚年喜欢《周易》，爱不释手。《论语·述而》中孔子自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朱熹对这段话注释道：“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这个注释既概括了《周易》的基本思想，又表明了《周易》的内在价值及学习《周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概括言之，《周易》为五经之原、三玄之冠，其六十四卦含无尽藏，摄无量义，广大悉备（“广”则无不包，“大”则无有外，“悉备”则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而归本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博而有要。

这样看来，学习《周易》当是要长智慧了。怎样学呢？答曰：活学。记得鲁迅在《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1925年）里曾不无揶揄地说过：“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这实际上是“死学”，把《周易》弄成了“咒”语，因此，除了尽显莽味、滑稽，却绝不会“翻”了潜水艇。

本书的内容，在阐述《周易》的基本思想、道理和智慧的基础上，阐发了它与中华上古文明的关系，描绘了古往今来的易学研究轨迹和风貌，掘发了中国文学、历史传统中所蕴含的易道菁华，叙述了它与道教、佛教、中医养生、风水、建筑、自然科学的关系及其原理运用，展示了它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力和独特风采。

在写作的形式上，考虑到现代人生活、学习快节奏的特点，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人的大众化阅读方式，本书行文尽量采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以求便于更多读者。

让我们一道走进《周易》，汲取其思想和智慧，以更好地成就自己。

张朝松 张 朋
辛卯年三月廿三日



目 录

走进《周易》——代序	(1)
第一日 天地大智慧	
——《周易》与中华上古文明	(1)
一、真人时代	(1)
二、阴阳：河图、洛书、太极图	(3)
三、伏羲画八卦	(7)
四、八卦盘与六十四卦	(8)
五、周文王姬昌	(12)
六、周公姬旦	(13)
第二日 如何解读天书	
——《周易》的基本内容	(15)
一、《周易》卦爻辞的创作	(15)
二、《周易》体例与卦爻辞的应用	(18)
三、《周易》卦爻辞中的八卦推理模型	(22)
四、孔子“序”《易传》	(31)
五、《易传》各篇的基本内容	(40)
第三日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古今易学研究概述	(45)
一、汉代象数易学	(45)
二、宋代义理易学	(49)
三、清代的学术总结	(51)
四、20 世纪的易学研究	(51)



第四日 算卦古今谈

- 《周易》与占筮 (55)
- 一、孔子与《周易》占筮 (55)
- 二、占筮的心理学解释 (58)

第五日 五千年文明的菁华

- 《周易》与文学、历史 (64)
- 一、《周易》经传与古今人名 (64)
- 二、《诗经》、《易经》同一首歌 (75)
- 三、《周易》经传词语串讲 (82)
- 四、《周易》时代的文化风俗 (90)

第六日 玄之又玄

- 《周易》与道教、佛教 (95)
- 一、《周易》与道教修炼文化 (95)
- 二、佛教高僧解说《周易》 (98)

第七日 医易同源同理

- 《周易》与中医养生 (106)
- 一、《周易》与《黄帝内经》 (106)
- 二、易学与中国古代人体科学 (114)
- 三、健康长寿在阴阳 (124)

第八日 天人合一的独特智慧

- 《周易》与建筑、风水 (129)
- 一、《周易》与古今建筑 (129)
- 二、《周易》与中国古代风水文化 (134)

第九日 重现古文明之光

- 《周易》与自然科学 (140)
- 一、易学与中国古代天文 (140)
- 二、《周易》与现代物理学 (145)
- 三、科学易 (151)



第十日 化成天下

——《周易》影响遍海外	(155)
一、《周易》的西语翻译	(155)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	(157)
三、太极旗与韩国	(159)
四、20 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周易》文化热	(161)



第一日

天地大智慧

——《周易》与中华上古文明

一、真人时代

放眼全球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卓越独步，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自豪。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呈现出独特面貌和恢弘气象，这是在中华上古文明的创立时期就决定了的，从伏羲、女娲到黄帝、神农，这些开创中华文明的英雄奠定了中华文明此后的走向与趋势。那么，中华上古文明究竟是如何创立的呢？这就必然要涉及那些处于真人时代的真人们的文化创造了。

“真人”一词较早出于《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其中言道：“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段话就是在直接向我们描述上古时代的真人：他（她）们是与天地阴阳合一的人。相对而言，我们常人则是在精神上与天地阴阳互相隔离的人。

在较晚的《庄子》、《淮南子》中也有关于真人的一些描述。其中《淮南子·本经训》说：“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庄子·大宗师》中更是集中论述了真人的风貌与特征：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谄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以这种真人为最高理想生存状态，庄子认为自然和人是浑然一体的，因而他主张清心寂神，离形去智，忘却生死，顺应自然，与天地阴阳合一，这种状态也就叫做“道”。庄子理想中的真人能做到“天”、“人”不分，因而真人能做到“无人”、“无我”。真人的精神境界就是“道”。只有真人才能真真切切地体察“道”，而“道”是“无为无形”而又永恒存在的，因而体察“道”就必须“无人”、“无我”。总之，“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句话无疑彰显了在认识、理解世界过程中主体状态的决定性。具有“道”这种特质的人，在认知功能上具有了整体性的品格，而非常人那样仅仅是理智或智力的使用者。按照通常的理解，真人的这种整体性的认知能力既为感性、理性、直觉、想象等认识能力的无限拓展，也体现为认知与记忆以及理智与情感等精神能力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在庄子的心目中，老子和关尹子是位列真人的，所以他在《庄子·天下》中感叹地说：“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老子西出函谷之时，关尹子尚是一个守关官员，他以老子为师，日后修成大道。庄子很可能就是关尹子的门徒。

实际上，由老子再上溯千万年，中华始祖伏羲更是上古中华文明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博大真人。

伏羲与天地阴阳为一，感悟出无相的大道自然和有相的宇宙万物的真理，从而演画出八卦，成为中华易道文化的创始者。据文献记载，在中华民族流传的人文始祖中，燧人发明火，有巢发明居，神农发明农业、药物，而在这些英雄人物之外，唯有伏羲发明最多，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上古时期所有的发明创造，立下了齐天功绩，后人因此称他为“始祖”、“斯文鼻祖”。“太昊”，即是人们对伏羲的赞词，意为伏羲功德无量，像日月那样光明无私，是道在人间的化身。

另一位创造发明众多的博大真人，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即炎帝，三皇五帝之一。传说神农三岁知稼穡，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医药之祖，今天还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周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里的“益”就是指六十四卦中的益卦，表明神农氏也是深得易道的上古真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上古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因为有了伏羲、神农等真人,因而有了真人时代。在这一真人时代,真人们创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大局和走向,使得中华文明传承至今而蔚为大观。

二、阴阳：河图、洛书、太极图

河图、洛书,是中华易文化之根,是中国象数文化生成的酵母,是八卦灵感的源起,是阴阳五行术数文化的发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源生于此。它们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易经、风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数、择日等传统文化之中。

河图、洛书诞生于真人时代,一直流传至今。《传》云,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究竟是指什么呢?应该如何解说?几千年来很多人对此问题争论不休,极少有人能够说得明白。概括地讲,同太极图一样,河图、洛书是讲述阴阳变化的。

那么,什么是阴阳呢?

根据古人的解释,天和地,在有形体的“物”中是最大的;阴和阳,在没有形体的“气”中是最大的。按照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判别,所谓“阴阳”,是“形而上”的,是事物的无形的气的存在。具体来讲,某个事物的“阴阳”,则是在宇宙阴阳二气整体涵盖之内来看这个事物的个体性质或局部性质,其最终仍然可以归结为超越了具体形象的阴阳二气。所以说,“阴阳”是中国古人以阴阳二气的观念和方法对事物无形的气的存在的独特把握,而这种把握就是古人所说的真人之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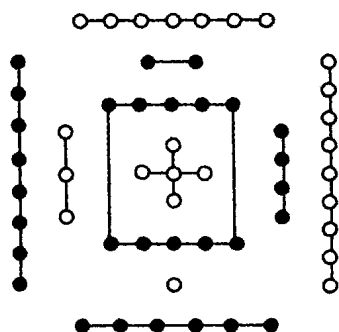
古人早就指出:《易》是讲述阴阳之理的,卦象是表示阴阳变化的,中国古人一般是以易卦符号来描摹阴阳配比,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易》或《周易》就是关于阴阳的系统化的理论以及针对阴阳的各种不同情况所作出的具体说明。

河图、洛书、太极图都是对阴阳理论的模型化(简单讲也就是形象化)表述。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看，河图、洛书、太极图都是用黑色表示阴，用白色表示阳，进而通过黑白颜色和图形的变化来表示阴阳变化规律——而这种阴阳变化规律其实也就是应用的大法门。

我们先来看一看河图，看看它是如何向我们揭示阴阳大道的。



河图

关于河图的出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远古的时候，华夏族始祖伏羲在黄河岸边观照宇宙运化。忽然有一天，黄河中跃出了一匹“龙马”，而这匹龙马身上的图案，与伏羲所观察到的阴阳运化奥妙互相契合，这可以称之为“天启”。此后，伏羲画出了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也流传下来，这就是河图的来历。

河图是由一到十的十个圆点组成，其中黑色圆点表示阴，白色圆点表示阳，这十个圆点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配置如下：

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五行配属为水。

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五行配属为木。

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五行配属为火。

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五行配属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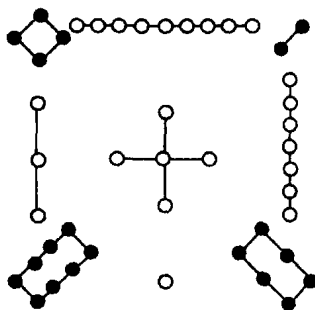
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五行配属为土。

其中，单数用白点表示，为阳，双数用黑点表示，为阴。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字叫做生数，代表着河图之中阴阳二气的第一次循环。除了生数之外，还有五个成数，即六、七、八、九、十，代表着河图之中阴阳二气的第二次循环。因此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就是天地生成之数，其规律是一个生数配一个成数，而且这两个相互配合的数字的阴阳属性是相反而相成的。从数字的角度来看，河图之中所有阳数相加总和为二十五，所有阴数相加总和为三十，阴阳之数总



和为五十五。古人认为天地之数就是五十五，很早就开始把河图之数与《周易》结合在一起进行了研究。

我们再来看一看洛书，看看它所揭示的阴阳大道与河图有何不同。



洛书

关于洛书的出现也有一个传说。据说大禹治水之时，大禹发现一只神龟出现在洛水之中，龟背上天然生成的纹理就如同数字，其排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洛书。看到这个图像，大禹受到了启示，于是把这个图像记载下来，流传至今。

关于洛书的数字，人们一般将其描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就是说，洛书一共有九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以数五居中，其余八个数均匀分布在八个方位。其中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是单数，为阳，用白色圆点表示，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是双数，为阴，用黑色圆点表示。

洛书之中，三纵、三横以及两个对角线的三个数字之和皆为十五，实际上这揭示了阴阳二气运化之时的均衡原理。进一步来讲，《周易》占筮之中代表老阳的数字是九，代表老阴的数字是六，代表少阴的数字是八，代表少阳的数字是七，而九与六之和为十五，七与八之和也是十五，所以《周易》无疑是体现这种均衡原理的。

古人还把洛书之中一至九这九个数字配属五行，其中，一、六为水，二、七为火，四、九为金，三、八为木，五为土，这与河图所配属的五行是一致的。

洛书一共是九个数字，每个数字占据一个宫位，如果把中央五的这个宫位刨除在外，其他八个数字的宫位可以分别配属八卦，而这里的八卦方位就是后



天八卦方位。一般我们把这种与八卦结合的洛书叫做九宫八卦图，它是应用最广的图形。九宫八卦图在中国传统数术中的应用非常普遍，比如“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等几乎都是九宫八卦图的直接运用。在建筑、风水和中医之中，洛书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果把洛书与河图进行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河图所描述的是宇宙的总体生成规律，而洛书所描述的则是宇宙的总体运化规律。所以相对而言，洛书的实际应用更加广泛。

最后，我们来看看太极图。



太极图

就第一印象而言，太极图的形状就像是一黑一白两条鱼互相纠缠在一起，首尾相连，运转不休，因而太极图在民间被称之为“阴阳鱼”。

太极图也有“中华第一图”的美誉。因为这种图形从古到今几乎随处可见：从京剧的脸谱到算命先生的卦旗、卦摊；从中医、气功以及中华武术的理论图形到道教观字的标记物；从道士的道袍装饰到韩国国旗、新加坡空军机徽，到处可以见到太极图的独特魅影。

所谓“太极”是指创生万物的本源，出自《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图形象地表达了阴阳互依、相反相成的深刻道理。太极图描述的是一个变化或运动的世界，它以旋转作为世界万物运动的普遍形式，以生灭作为世界万物变化的必然过程。所以，太极图简洁形象地阐释了宇宙的终极运化，可以说是形式最简单、内涵最丰富、造型最完美的阴阳运化图形。

太极图中有黑白二色，说明世界是由阴阳二气共同构成的，通俗讲可以指代天和地。黑白二色之间存在着玄妙的界限，也就是太极图中间的S形曲线，



它是勾连天地阴阳的中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太极图之中白的那一面有一个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黑的那一面也有一个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阴极生阳。因此，一张太极图其实至少包含了五个部分：阴、阳、阴阳的中介、阴中之阳和阳中之阴——这才是所谓“阴阳”的真正含义。

河图、洛书、太极图在宋代初年才被学界发现，一般认为它们始传于宋代著名的华山道士陈抟。实际上，河图、洛书、太极图的来源古老悠远，它们对于我们认识《周易》所阐述的阴阳大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伏羲画八卦

伏羲是中华文明的肇启者，以画八卦为标志，将中国历史带入了有文字符号的文明时代。这也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可见，伏羲画八卦，是将宇宙永恒存在的阴阳变化，通过简单的符号象征表示出来。

伏羲氏观察昼夜四时，四季代换。白天之后是晚上、晚上之后又是白天，其中日月轮转，无止无休；春、夏、秋、冬，也都依照次序在更替、循环。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推动，在运作？是什么力量使得宇宙万物这样有规律地变动着？

只有真人才能够体会到：在时间变动不居、宇宙万物无一物一时不在变动的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和物质在驱使万物变动不息！

那么，这种力量和物质及其规律运作又是怎样表示出来呢？

于是在灵光一现后，伏羲在地面上画出最简单也是最深奥的符号“——”、“——”，来代表他的智慧思考。

所以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知道：上古时代，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对于推动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终极力量——阴阳——有着深刻的领悟和感知，进而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创造出了八卦符号，并重之为六十四卦。所以，华夏文明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闪耀着“易”的夺目光辉。这种光辉经由神农、黄帝、巫



咸、大禹、文王等无数智慧英雄的不断接续而亘古传递，沿袭至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周易》六十四卦、450 句卦爻辞。

如果我们领悟了阴阳的真谛，也就理解了河图、洛书、太极图，那么，《周易》六十四卦、450 句卦爻辞就会变得浅显易懂，《周易》应用也就不在话下。

四、八卦盘与六十四卦

那么，八卦又是什么呢？

八卦是乾、坤、震、艮、离、坎、兑、巽。

八卦的卦象构成很独特，我们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卦象符号来记忆，前人将其归纳为歌诀：

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这首歌诀意思是说，乾的卦符是三个连接的横画，坤的卦符是六个断开的短横，震的卦符就像一个仰面放置的孟盆，艮的卦符就像是一个倒扣的碗，离的卦符中间是空虚的，坎的卦符中间是充满的，兑的卦符上面破缺，巽的卦符下面断开。八卦卦符两两对比，就很容易记住了。

准确讲，八卦是根据阴阳二气的八种不同配比关系来把握事物阴阳属性的方法，所以八卦符号实际上是对这八种阴阳二气配比关系的一套符号表述。自古流传是伏羲“始作八卦”，而伏羲是中国上古文明第一人，这就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开始用八卦来表述和把握事物阴阳属性了。

在春秋时代，这种表述和把握事物阴阳属性的方法仍然存在。比如《国语·周语》有“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对所发生的地震是这样解释的：“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八卦符号之中的震卦一个阳画在下，两个阴画在上，表明阳气衰弱、阴气旺盛，阳气潜伏在下为阴气所压制，以至于呈现阳气不能升起、阴气不能蒸腾的态势，导致发生震动，即地震。在这里伯阳父虽然没有明确说出震卦的名称，实际上他却对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领悟，已经牢牢把握住震卦的卦象了。

万事万物皆在阴阳二气之中，禀持阴阳二气而生、长、衰、亡，所以八卦模型



广泛适用,无论其取象系统的大小远近。

比如以八方为八卦系统,则乾为西北,坤为西南,震为东,巽为东南,坎为北,离为南,艮为东北,兑为西。

以季节转化为八卦系统,则震为春,巽为春夏之交,离为夏,坤为夏秋之交,兑为秋,乾为秋冬之交,坎为冬,艮为冬春之交。

以自然运化为八卦系统,则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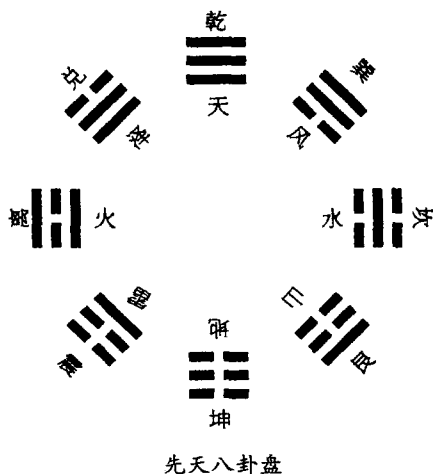
以家畜为八卦系统,则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猪),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以人体各个部位为系统,则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以家庭成员为系统,则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

就整体而言,八卦又叫八卦盘,而八卦盘又分为先天八卦盘(图)和后天八卦盘(图)。

先来看一看先天八卦盘。



先天八卦盘最为明显的特征是：盘中八卦分为四对，两两相对，每相对两卦的卦象都是反的，即两卦所对应的卦画属性是阴阳相反的：



位于南方的乾三个卦画全是阳,位于北方的坤三个卦画全是阴;

位于东南方的兑下面两个卦画是阳、上面一个卦画是阴,位于西北方的艮下面两个卦画是阴、上面一个卦画是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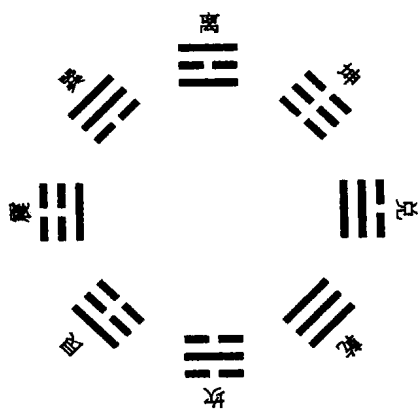
位于东方的离中间一个卦画是阴、上下两个卦画是阳,位于西方的坎中间一个卦画是阳、上下两个卦画是阴;

位于东北方的震下面一个卦画是阳、上面两个卦画是阴,位于西南方的巽下面一个卦画是阴、上面两个卦画是阳。

先天八卦盘把八卦所分别代表的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类物象分为四组,说明了它们之间的阴阳对待关系和八卦作为整体的均衡稳定性。按照《说卦》的解说,乾坤两卦对待,可以称之为“天地定位”;震巽两卦对待,可以称之为“雷风相薄”;艮兑两卦相对,可以称之为“山泽通气”;坎离两卦相对,可以称之为“水火相射”。

先天八卦盘(图)据说出自北宋的大理学家邵雍之手,因此有人据此把他的易学称之为先天之学。

再来看一看后天八卦盘。



后天八卦盘

后天八卦盘最明显的特征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显示阴阳流行、四时变化:

万物出生于震,震为正东方,

万物整齐于巽,巽为东南方,



万物显现于离，离为正南方，
 万物颐养于坤，坤为西南方，
 万物喜悦于兑，兑为正西方，
 万物交战于乾，乾为西北方，
 万物收敛于坎，坎为正北方，
 万物始终于艮，艮为东北方。

可见，后天八卦盘展示了万物从生到死的时空总规律。实际上，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个周期即一年是 360 天多一点，八卦之中的每一卦各自分属约 45 天，按顺时针方向运转。

据说先天八卦盘是从伏羲时代传承下来的，而后天八卦盘是从周文王时代传承下的，实际上二者都是八卦理论的基础。一般认为，先天八卦盘表示生成，为体，后天八卦盘表示运化，为用。所谓的后天和先天只是一种称谓上的区分而已，并不代表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事实上，在具体的术数运用中，后天八卦盘的运用要远远多于先天八卦盘的运用。

有了八卦盘，六十四卦的产生就是很自然的了：上下两个八卦盘一重叠，六十四卦不就产生了吗？所以说，八卦相重而产生出六十四卦，即就每一个六十四卦而言，其都是由上下两个八卦互相重叠而成。六十四卦名目如下：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
 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
 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
 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
 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
 损、益、夬、姤、萃、升、困、井、
 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
 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为了便于记忆，前人把卦序编为歌诀。比如宋代朱熹《周易本义》之中就有这样一个记忆口诀：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需要提醒的是，这种六十四卦顺序仅仅是为了叙述方便而给出的一种排列，历史上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很多种；而从汉代开始，《周易》经文中还出现了“经上”、“经下”的区分，即从卦一乾到卦三十离为“经上”，从卦三十一咸到卦六十四未济为“经下”，严格来讲，这种区分与《周易》本身无关。

那么，这个八卦组成的六十四卦各自代表什么意思，它们的名称又是如何得来的呢？这就涉及《周易》文本理解的问题了。

五、周文王姬昌

严格地讲，从伏羲画八卦、重之为六十四卦开始，就有了对“易”的解读和研究，也就有了“易学”。由于古人往往把“易”作为占筮的理论根据，所以“易”又被添加了很多文字，这样算起来，夏代的《连山》是“易”1.0版，商代的《归藏》是“易”2.0版，周代的《周易》是“易”3.0版——也就是“易”的最高版本。周代以来，由于《连山》、《归藏》已经失传，所以我们现代所说的易学主要是指对《周易》这个“易”3.0版本所作的种种阐释。那么这个《周易》是如何诞生的呢？这就要对周文王姬昌进行简要说明。

周文王，即殷商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小说《封神演义》以之为西伯侯），又称周侯，周季历（周朝建立后，尊为王季）之子，姬姓，名昌，西周奠基人。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又称伯昌，共计在位五十年。

商纣时封姬昌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今属陕西）之下。他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姬昌遵照祖辈后稷、公刘的遗训，取法先祖古公、父亲季历的德治，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繁荣发展。后来因崇侯虎（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在被商王囚禁期间，姬昌在狱中推演八卦，写就了《周易》一书。就是说，姬昌在囚禁中，集中精力“演易之六十四



卦,各为彖”。据《左传》载,周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史记纲目》记为三年)。被囚期间,文王很可能经受了殷纣王的重重折磨和生与死的考验,表现了忍辱负重、坚强不屈的意志。根据后来的相关记载,纣王断绝了文王与外界的联系,不仅在羑里驻有重兵,而且在通往羑里的道路上也层层设卡。文王的大儿子伯邑考来看望也不让其接近。文王身居囹圄,不得自由,于是潜心研究古代真人的传世典籍,特别是《连山》和《归藏》。白天他奋笔疾书,黑夜他默默推算,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是这时候又有人向纣王报告,说西伯昌研究《周易》就是圣人,能推知过去,预测未来。为了检验西伯昌是不是圣人,能不能知过去、测未来,究竟他有没有可能造自己的反,纣王把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杀掉,烹为羹,送给文王吃。文王不得已,忍痛含泪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羹吃下。纣王闻知,嘲弄说:“圣人当不食其子羹。吃自己儿子煮成的羹尚且不知,谁说他是圣人呢?”文王食羹遂又吐出,吐出之物后人称之为“吐儿堆”。尽管纣王这样对文王进行残酷迫害,文王为了让这个凶残狡猾的君王放心,还是找机会说:“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岂有君而可叛乎?”听到了这样的话,于是纣王放松了对文王的监视。文王虽身陷囹圄,但胸怀宽宏,绝不怨天尤人。他总结夏商两代无数巫史占筮解卦的智慧,用八卦(后人名之为“文王八卦”)将六十四卦进一步推算,每卦重新写有卦辞。

后来姬昌终于得到释放。归国后他仁政广施,天下诸侯多归从之。他还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进一步整顿国家,为讨伐商纣做准备。最终武王伐纣,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所以周文王姬昌实际上是西周王朝的奠基者。

周文王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所景仰、称颂。如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皇帝在祭文中说周文王“为民立极,功德惟厚”。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亲来致祭,说周文王“忠厚孝慈仁敬”,并挥笔写就《演易台谒周文王祠诗》一首。可以说周文王成为历代君王崇敬的英雄,《周易》是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厚重基石。

六、周公姬旦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食采邑于周



(今陕西宝鸡东北),故称之为周公,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

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胜于群子;武王即位,则以忠诚辅翼武王。一次,武王得了重病,生命垂危,群臣忧惧,占卜祈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替武王之身,而且自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从周公的自荐之言看,他也是深得易理的大贤人。正如《系辞》所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所以周公才能自信满满地说自己“能事鬼神”。

在周文王死后第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在周文王死后第四年,周公与太公望、召公奭辅佐武王败纣灭殷。克商后第二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于是由周公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商纣之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公奉命出师东征,经过数年战争终于平定反叛。周公于是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相传他还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多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周公终生辅国安邦,其“敬德保民”以及“礼”的思想和制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孔子生前最景仰的人就是周公,并以时常梦到周公为荣。所以自东汉以来,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唐韩愈则把周公列为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公旦进一步总结夏商两代无数巫史占筮解卦的智慧,以及周文王的卦辞创作经验,用八卦将六十四卦的变化进一步推算,为每卦设定了一爻变的情况,此外还给乾坤两卦特别增设六爻全变的情况,进而一共增加了 386 条爻辞,于是写成了《周易》,留给后人。于是有周一代,人们往往用《周易》来探索人生、宇宙变化的原理,推演人生、宇宙和社会变化的规律。《周易》的应用在《左传》和《国语》中一共出现了二十二次,可以说,这些都是周公旦所制定的《周易》解说在后世的流传。



第二日

如何解读天书

——《周易》的基本内容

一、《周易》卦爻辞的创作

历经夏、商、周三代,《易》(《连山》、《归藏》、《周易》)都与占筮紧密关联。从《左传》、《国语》、《周礼》、《尚书》等典籍和历年来出土的实物——特别是作为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来看,这一点毋庸置疑:《易》,特别是《周易》,在周代社会里长期充任着“占筮之书”的角色,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这种功能还极为重要:作为占筮工具书的《周易》被掌握在当时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手中,虽然有时就其具体解说而言,不同的人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其效验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即如《周礼·春官》: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觴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太史公“文王拘而演《周易》”(《报任安书》)的记载不尽翔实、准确。关于《周易》,周文王以及周公应该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编撰工作:



(1) 根据时代需要对六十四卦卦名进行了修改编订,使得《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名与《归藏》以及《连山》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2) 对卦辞进行重新编写。无论从出土材料来看,还是对比后世辑录遗文,《周易》卦辞与《归藏》卦辞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归藏》很多卦辞是讲述历史故事的话,那么《周易》的卦辞就明显具有哲理内涵;如果说《归藏》卦辞是意味隽永的诗句,那么《周易》大多数卦辞则属于字字铿锵的散文。

(3) 为《周易》特别编写了 386 条爻辞。从出土的王家台秦简来看,《归藏》是没有爻辞的,更早的《连山》很可能也没有爻辞,而《周易》爻辞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易》文本的内涵,也标志着古代易学的一个巨大成就。

《周易》的卦辞与爻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体而言,由于其各自的编撰者不同,创编根据不同,《周易》的 64 条卦辞与 386 条爻辞应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区分;又由于两者在编撰时间上有继起性、创编根据有相关性,所以卦辞往往又是爻辞据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

① 卦辞与爻辞的区别。

首先,《周易》的卦辞与爻辞创作者很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按照传统的一种说法,《周易》的卦辞是由周文王姬昌编撰的,而爻辞则是由周公姬旦编撰的。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文王编撰卦辞、周公编撰爻辞是最为可信的一种说法,而且这种区分是符合《周易》文本中爻辞与卦辞的实际差异情况的。所以在《周易》的具体解说中,需要对爻辞与卦辞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即首先要将 64 条卦辞作为一个整体,把卦辞与卦辞互相对比勘验,校正句读,判断字义,进而对其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说。

其次,因为文王编撰了卦辞、周公编撰了爻辞,所以卦辞和爻辞两者的创作时间基本相同,都是在周初,但是两者有着明显的先后关系,即在文王编撰 64 条卦辞之后,周公编撰了 386 条爻辞。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卦辞和爻辞在取象根据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卦辞的取象根据是一个六十四卦卦象,或者说是一下一上两个八卦卦象,而爻辞的取象根据是本卦、之卦两个六十四卦卦象,或者说是两下两上四个八卦卦象。

再次,卦辞和爻辞的表达结构不同。比较而言,卦辞以“元亨利贞”为主要表达结构,其语句的概括力更强,而爻辞则在表达结构上的特征不明显。

最后,比较而言,卦辞的语句更加浓缩精练,哲理性和系统性更强,爻辞的



取象则更加生动、广泛。

② 卦辞与爻辞的联系。

由于《周易》卦辞与爻辞的编撰在时间上有先后，所以周公在编撰爻辞时应是参照了文王所编撰的卦辞，继承和借鉴了卦辞之中的某些表达方式和取象内容，所以卦辞与爻辞具有内容上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卦辞是爻辞的前提和基础，是爻辞表述卦象的重要参照。需要强调的是，就根本而言，卦辞与爻辞的取象根据有相同的部分，即卦辞的取象根据，即六十四卦卦象，是爻辞取象根据的前半部分，即本卦。

在卦爻辞的编撰过程中，周文王以及周公很可能依据或参考了以往的占筮经验与成例，《周礼》所谓的“九筮”，即“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很可能就是历史上九个著名的筮者或大巫，他（她）们在无数次占筮中的得失经验被一直保存下来，在《周易》文本的创作中无疑被充分借鉴和多次引用。而《周礼》所谓的“八命”，即“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应该就是卦爻辞，特别是其中的吉凶断语所要直接回答的问题。使用“八卦取象比类”的方法对占筮所得到的卦象做出创造性的解说来回答所贞问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位筮者的中心工作，而《周易》卦爻辞就是要对此提供尽可能多的参考和帮助。

(4) 有一定可能性的是，周文王或周公还对六十四卦卦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次编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把乾卦作为《周易》之首卦，从而使得《周易》与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与以艮卦为首卦的《连山》明显区别开来。但是由于帛书本《周易》的出现，现在我们知道仅仅是就《周易》而言，其六十四卦卦序较早就具有了多样性。虽然这种多样性有可能是在《周易》编撰完成之后的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但这却足以提醒我们：无论是把卦序的不同当作是《周易》与《归藏》、《连山》的根本区别，还是把通行本卦序研究作为解开《周易》文本创作之谜的锁匙，似乎都是比较匆忙和短浅的做法，这很可能是易学研究之中的一条歧途。

(5) 与左丘明的《左传》对照，可以知道《周易》文本中的六九爻题很有可能是在孔子时代产生——在周文王以及周公时代作为另外一种《周易》版本的特征而产生的可能性也有，但是这种版本在那时候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并在



孔子之后成为《周易》文本通例的。六九爻题无疑是“爻象说”产生和流行的文本基础。

总之，周文王以及周公在编撰卦爻辞之时，一定是依据了《易》的某种内在规律，而这种规律现在看来就是筮占的基本规律和解卦方法，其核心就是“八卦取象比类”。自然地，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如果依据占筮解卦的原理与方法来对《周易》文本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所隐含的推理过程与思想脉络。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跨越历史所设置的重重迷雾，回复到《周易》的本真。

二、《周易》体例与卦爻辞的应用

从《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记载来看，春秋时代的《周易》爻辞与现在的通行本《周易》爻辞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其爻辞前面不是六九爻题，而是“某卦之某卦”。有学者认为这仅仅是《左传》、《国语》中引用爻辞的一种“通例”，并不认为这就直接反映了当时《周易》文本的实际书写形式。那么，春秋时期《周易》文本的书写形式真的与今本一致吗？让我们细读《左传》、《国语》文本，不难发现在关于《周易》的记载之中尤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这个引用实例最有说服力：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 年）的秋天，在晋国都城绛的郊外，有人看见了龙。魏献子对此感到迷惑，去请教蔡墨。蔡墨引用了《周易》乾、坤两卦的爻辞来证明自古以来龙这种动物就确实存在。很明显，蔡墨完全没有涉及占筮，他仅仅是引用《周易》之中的辞句，纯粹是对《周易》做“博物志”式的引述。



如果说这种引述方式还不能够说明当时的《周易》文本实际面貌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能相信带有六九爻题这种体例的《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存在的可能性了——要知道，无论在传世典籍中还是在出土资料中，至今没有一个例证为带有六九爻题这种体例的《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的存在提供支持。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春秋时代至少存在着一个《周易》的新体例——如果这种体例的版本不是当时《周易》的唯一版本的话——它与现在通行本不同：它的爻辞前面没有六九爻题，而全部是“某卦之某卦”的格式。具体而言，春秋时代《周易》的（一种）体例是这样的：

《乾》：元亨，利贞。

《乾》之《姤》：潜龙，勿用。

《乾》之《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乾》之《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之《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乾》之《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乾》之《夬》：亢龙，有悔。

《乾》之《坤》：见群龙无首，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之《复》：履霜，坚冰至。

《坤》之《师》：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坤》之《谦》：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坤》之《豫》：括囊，无咎无誉。

《坤》之《比》：黄裳，元吉。

《坤》之《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坤》之《乾》：利永贞。

（以下略）

这样看来，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卦辞，这部分内容对应着占筮时没有爻变（或变卦）的情况；

第二部分是 386 条带有“某卦之某卦”标注的爻辞，这部分内容对应着占筮



时发生爻变(或变卦)的情况。准确地讲,在 386 条爻辞当中有 384 条对应着占筮时候只发生一爻变而其他五爻不变的情况,有 2 条爻辞对应着占筮时候发生六爻全变的情况。

从篇幅或字数来看,第二部分无疑是主要的。所以至少从文本上来看,爻辞是以一个六十四卦到另一个六十四卦之间的不同演化关系作为对应内容的,它直接关联着变卦(或者爻变)前后的卦象改变。因此,从八卦卦象解说爻辞的角度来说,爻辞无疑也可以称作是“卦辞”,即从属于八卦卦象的辞句,它直接对应着发生变卦的前后两个六十四卦的四个八卦卦象的相互关联。严格来讲,每个爻辞对应的是两个别卦,而不是一个别卦;是卦象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卦象的静止。所以爻辞是从属于六十四卦卦象或八卦卦象的,而不是从属于某个爻——就这一点而言,所谓“爻辞”这一名称并不准确,至少在春秋时期名不副实。

依据占筮的原则与方法,带有“某卦之某卦”标注的爻辞明显比以六九爻题标注的爻辞实用性更强,所以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也就具有更强的占筮易用性,这与春秋时候的《周易》文本的主要功用相一致。

那么,爻辞前面的不同爻题——为了论述简便我们不妨把“某卦之某卦”也称为爻题——的区分会给《周易》文本的理解带来什么影响呢?扼要地讲,由于六九爻题含义的相对不精确而导致其在理解或解说上具有了两重性,以至于战国以降的无数学人所做的《周易》解说或阐发都具有了明显的失真性。当然,如果称这种“失真性”为“创新”似乎也并无不可,但是仅就文本而论,这些解说无疑与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内涵不符。

六九爻题的便捷之处是依据爻变所发生的位置诸如“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把爻辞与本卦卦象中的卦画——对应起来,在占筮的时候特别是在发生一爻变的情况下只要把对应于这个变爻的爻辞找到就可以了。但其弊端却在于过于简略,即省去了对爻变(或变卦)前后过程的表述,往往使得不明就里者望文生义地以为《周易》文本中的“九”即指代阳性卦画,“六”即指代阴性卦画!这就偏离了《周易》文本中“九”和“六”的本初含义。实际上阳性卦画和阴性卦画本身还可以代表“七”和“八”,这时候不发生爻变,阳是阳、阴是阴,即占筮时通常所说的“七、八不变”。

进一步来讲,按照春秋时古人的理解,《周易》文本中的六九爻题是用



“九”来标注卦象中的阳性变爻，即由阳变阴之爻，所以“九”所指代的卦画有两个性质：一、阳性；二、发生爻变。后人所理解的“九”往往仅仅具有第一个性质；用“六”来标注卦象中的阴性变爻，即由阴变阳之爻，所以“六”所指代的卦画有两个性质：一、阴性；二、发生爻变。后人所理解的“六”往往仅仅具有第一个性质——特别需要强调：在“初、二、三、四、五、上”六个卦画之中变爻是唯一的！即从属于一个六十四卦的六个六九爻题只有一个发生爻变并对应着一次占筮！一个爻辞与另一个爻辞严格地讲是互相独立的！二者之间的关联仅仅是由于在八卦取象上有共通之处进而有可能在具体解说时可以互相参照、说明。实际上一次占筮不可能既对应着这一个爻辞，又对应着另一个爻辞。

现在通行的《周易》版本大都如是注释：“䷀，属阳性，称其为九：䷁，属阴性，称其为六。”在一般的易学词典上也如是注释，如在关于爻题的解释中说：“阳爻䷀题为九，阴爻䷁题为六”，“九表示本爻的性质属阳”，“六表示本爻的性质属阴”，等等。从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来看，这种种解说都是误读，最初很可能根源于上文所述及的不明就里者的望文生义！

所以至今通行的关于《周易》体例的注释和说明已经混淆了变爻与不变之爻二者之间的区别，排除了理解《周易》的另一个思路和方法，从而产生了误导，长久以来使人们对《周易》文本的理解产生了总体方向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偏差。汉代开始广泛通行的所谓“爻位说”、“爻象说”就在这一根本点上失足，进而逐渐滑入了《周易》解说方法和阐释理论的误区。

对于占筮成卦后如何在《周易》文本之中找到卦象所对应文句以进行解卦这个问题，至今最有影响的是朱熹《易学启蒙》中的“变占”法：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象》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象》辞。



这套规矩是宋代朱熹整理出来的，它与春秋时期《周易》占筮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有很多抵牾之处，所以朱熹之说绝不足以信从——只要与本书前文所述之内容稍加对照，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

参照朱熹所归纳的条目，我们将这些规则作了调整，以对比说明：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以本卦卦辞占，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卦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之爻辞占，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爻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二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三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四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五爻变，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即可以查阅《周易》文本中对应之爻辞，其余六十二卦则以本卦与之卦之卦象占，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

所以，以上七种情况最终都归结为对本卦与之卦之中八卦卦象的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参照《周易》卦辞或者爻辞进行解说。可见，《周易》的实质内涵是一个完备的六十四卦符号体系，其卦辞和爻辞则对变卦发生的两种基本情况——不发生爻变和一爻变——作出了直接的说明。

三、《周易》卦爻辞中的八卦推理模型

《周易》文本之中蕴含着的“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这一套由低阶、中阶而高阶的推理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解卦实际上就是应用这一套模型对卦象进行解释，而《周易》卦爻辞就是这一解释过程的一部分具有经典性质的记录。

象——形而上的事物存在

《左传·僖公十五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即有物然后有象，成象然后有滋生繁衍，滋生繁衍然后有数。什么是物呢？用现在的



话讲,就是事物。正所谓“物生而后有象”,按照古人的这种理解,一个事物只要产生,就有“象”相伴而生。

那么什么是象呢?

《系辞》对“象”的描述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或者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如果我们把“形”理解为有形的物体或器物,那么“象”则超越了具体形体。对照《庄子·则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就是说,天和地,在有形体的“物”中是最大的;阴和阳,在没有形体的“气”中是最大的。所以,按照这种“形”、“气”即有形、无形的判别,所谓的“象”就是“形而上”的,是事物的无形的气的存在,是在阴阳二气整体涵盖之内的事物的个体性质或局部性质,其最终归结为超越了具体形象的阴阳二气。可以说,“象”是中国古人以阴阳二气的观念和方法对事物无形的气的存在的独特把握。

“阴阳”是中国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其涵盖范围非常广大,所以《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点反映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古人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阴阳是“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所以万物皆在“阴阳”的自在运化之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独立于世界的“我”或人类存在。人同万物一样,都与阴阳二气的运化密不可分。由此看来,“阴阳”实际上是“象”的观念和方法的总根基。

《庄子·天下》有“《易》以道阴阳”,《系辞》有“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中国古人一般是以易卦符号来描摹阴阳配比,进而把握事物之“象”。《易》就是关于阴阳的系统化的理论和知识。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那么就不能否认“象”这种观念和方法具有科学性。

此外,学术界有学者把《周易》中蕴含着的这种“象”观念和方法归结为“类比”的思维方法,但这种概括力度不足:

第一,这种说法忽视了“象”是这种类比思维的基础。类比思维有很多局限,正所谓“异类不比”,而“象”是形而上的事物存在,是世界万象具有八卦取象比类可能性的总根据。

第二,究其本质,类比思维不是必然性的思维方式,只有以“象”为基础,它才可以具有推理上的必然性。



所以仅仅把“象”观念和方法归结为“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全面的，也不够准确。

八卦——初阶推理模型

(1) 八卦之象。

八卦或八卦之象(简称“卦象”)是根据阴阳二气的八种不同配比关系来把握事物的“象”的方法,所以八卦符号实际上是对八种阴阳二气配比关系的一套符号表述。自古流传是伏羲画八卦,即《系辞》所记载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既然是包牺氏即伏羲“始作八卦”,而伏羲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位帝王,这就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八卦来表述和把握事物阴阳之“象”了。

正所谓“物生而后有象”,有事物存在就一定有“象”,要更好地把握事物及其发展变化,就一定要把握事物之“象”,即通过八卦卦象来描摹和表述事物之“象”。每一个八卦符号有三个卦画,所以根据阴阳二气的不同配比关系就有八种不同的“卦象”,其中每一种“卦象”既可以是“物”——静态的“象”,即“物象”,也可以是“意”——动态的“象”,即“意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一系列关系表达式:

象 \longleftrightarrow 卦象 \longleftrightarrow 取象为“意”或取象为“物” \longleftrightarrow 意象(各种动作、各种状态、各种变化)或物象(各种物体、各种动物、各种人)

值得注意的是,“象”具有时空一体性,所以八卦之象既可以表示时间(季节),也可以表示空间(方位)。

值得注意的是,金景芳先生认为:“《说卦传》说,‘乾,健也。坤,顺也’这个‘也’字的意义同‘是’。它是说八卦的性质。‘也’表明性质是不可变的。而‘乾为马,坤为牛’,这个‘为’字的意义同‘化’。它是说八卦的取象。‘为’表明象是可变的。”金景芳先生这些论说对《说卦》之中八卦之意蕴有深刻揭示。所谓八卦的性质,也就是八卦的核心意象,这个核心意象是不变的,而具体取象则可以变化多端。

(2) 八卦是普适的模型结构。

《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皆在阴阳二



气之中，禀持阴阳二气而生、长、衰、亡，所以皆受八卦之气的制约。即如《说卦》所说：“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八卦模型广泛适用，即具有普适性。

翻开《说卦》，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各个系统，包括自然界、家庭、人体、家畜、动物种群等。如以自然界中八卦之气的功能划分、以八卦之气的广泛作用划分、以八方为八卦系统划分、以季节转化为八卦系统划分、以自然运化为八卦系统划分、以家畜为八卦系统划分、以人体各个部位为系统划分、以家庭成员为系统划分，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占筮的推理过程是：

八卦卦象之间的关系 \longleftrightarrow 八卦卦象取象之物的关系 \longleftrightarrow 占筮贞问事物的发展变化关系

《左传·僖公十五年》的“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句话，实际上也对古人占筮理论的核心有所揭示：使用《周易》进行占筮的实质是通过“数”的推演表现出可以书写的“卦”，进而由这些可以书写、揣摩的有形的“卦”来揭示无形的“象”，即：

占筮之数 \longleftrightarrow 事物之象 \longleftrightarrow 事物的发展变化

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商周的占筮传统之中，占筮缘何次于占卜：因为占卜是直接揭示“象”的，而占筮则首先必须经过一个数的推演过程。所谓“筮短龟长”则不妨可以理解为占筮的时效短而占卜的时效长，即占筮所反映的吉凶变化的时效短而占卜所反映的吉凶变化的时效长。

(3) 八卦模型的数理解说。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八卦何来呢？《系辞》的回答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就是说“圣人设卦观象”，或者说“圣人设卦以观象”，“卦”本为“象”而设，而设“卦”以表“象”，即以有形的卦符来模仿或表述无形的“象”。

易是无，太极是“0”。这就是“易有太极”。需要强调的是，“无”不是什么也没有，绝不是数学上的空集，而是混沌未分的包含万有，是整体性的一个概念。

$0 = (+1) + (-1)$ 。这就是太极生两仪。

$0 = (+2) + (+1) + (-1) + (-2)$ 。这就是“两仪生四象”。



$0 = (+4) + (+3) + (+2) + (+1) + (-1) + (-2) + (-3) + (-4)$ 。这就是“四象生八卦”。

为了强调八卦的整体性，古人使用了“八卦盘”这个概念。确实，一般来说八卦就是指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个卦象。但是，如果忽视八卦的整体性，就会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八卦是八个卦。实际上八卦并非八个卦。如果八卦是八个卦，那么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也是八卦，兑、兑、兑、兑、兑、兑、兑、兑也是八卦，离、离、离、离、离、离、离、离也是八卦……这样八卦就太多了，八卦之总和也不等于太极或无了，八卦也就失去了整体性的含义，其周期性、对待性更是无从谈起。也正是在“八卦盘”这个整体概念的基础上，古人把“易”字理解为简易、变易、不易三重含义。

六十四卦——中阶推理模型

(1) 六十四卦的产生。

八卦相重而产生出六十四卦。《系辞》有“八卦相荡”，八卦互相抵荡就必然相互重叠，八卦互相重叠那么六十四卦就产生了。

根据《说卦》的内容可以排列出一个八卦盘来，即“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由此排列出的八卦盘，一般称之为“后天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或“后天八卦流停图”，简称“后天八卦图”。这个盘式自相重叠，把下卦与上卦一一对应起来，就是六十四卦，即《系辞》所谓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

按照这种思路再来看《系辞》中的“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这里的天，指示着居于上位的天盘。这里的地，则指示着居于下位的地盘。天盘、地盘也都是八卦盘。上面有一个八卦盘，下面有一个八卦盘，两两重叠那么六十四卦就产生了。

《周礼·春官》中有：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与《周易》之所以总称为《易》，就是因为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即以八卦为低阶系统模型而演化出六十四卦这一中阶系统模型。所以，就八卦模型的使用这一点而言，《连山》、《归藏》与《周易》是一体的。

比如 1993 年出土的王家台秦简中的《归藏》的体例是：卦画——卦名（加



“曰”字)——“昔者某人(请求贞卜人名)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筮人名),某人(筮人名)占之,曰:吉(或不吉)”——卦辞。这里的卦画就是六十四卦卦画,即由两个八卦卦画重叠而成,这与现今的《周易》是一致的。

(2) 六十四卦的八卦卦象解说。

《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条《周易》应用记载是易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反映了春秋时期乃至西周时期《周易》的基本面貌。这些《周易》应用记载之中有十余条涉及如何解读《周易》卦象,它们是证明八卦卦象与六十四卦卦象之间关系的最佳依据。因为在这些《周易》解读的记载中,对六十四卦卦象的解读根据就是八卦取象。

第一个例子:《国语·晋语》有“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泰卦是下乾上坤,卦象是:

坤

乾

《说卦》中有“乾为天”和“坤为地”,这里只是讲解乾、坤两个卦基本取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配”。所以泰卦的卦象就是下卦乾和上卦坤这两个八卦卦象。

第二个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有“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大壮卦是下乾上震,卦象是:

震

乾

《说卦》有“震为雷”,所以大壮卦的卦象是乾在下而震在上,所以是“雷乘乾”。

第三个例子:《左传·昭公元年》有“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蛊卦是下巽上艮,卦象是:

艮

巽

这里对蛊卦卦象的解说也完全是根据下巽上艮两个八卦卦象:巽为长女,艮为少男,下巽上艮的蛊卦是年长女子迷惑年少男子之象,即“女惑男”;巽为风,艮为山,下巽上艮的蛊卦是风吹落山上树木林叶之象,即“风落山”。

根据对以上几个例子的讨论,可以看出:八卦取象是《周易》六十四卦卦象



的解说根据。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六十四卦是由八卦这一初阶推理模型复合而生成的中阶推理模型。

本卦·之卦——高阶推理模型

(1)《周易》的数理结构是 $64 \times 64 = 4096$ 。

以《易传》成书为初始,特别是在汉代经学发展起来之后,人们都习惯以“爻象说”来解说《周易》,因此很多人对《周易》一直抱有一个误解:《周易》的数理结构是 $64 \times 6 = 384$ 。实际上这种理解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周易》原貌。

首先,就占筮而言,《周易》虽然一共有 384 或 386 (加上乾坤两卦用九、用六)个爻辞,这并不表明古人在用《周易》占筮的时候只会遇到 384 或 386 种情况。翻开《左传》、《国语》就会发现,古人在用《周易》占筮的时候会遇到 $64 \times 64 = 4096$ 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国语·周语》中的乾之否是三次爻变,《国语·晋语》的屯之豫是三次爻变,《左传·襄公九年》的艮之随是五次爻变,它们都不属于《周易》文本所罗列的 384 或 386 个爻辞范围之内,但是古人却仍然能够顺利地解读出个中含义。

其次,前文说过,春秋时代《周易》的编排体例与现在通行本不同。春秋时期《周易》的体例可以说明,《周易》爻辞是以六十四卦之间的演化为主要内容的,它所注重说明的是变卦前后六十四卦卦象变化情况。因此,爻辞所说明的是发生变卦前后两个六十四卦卦象的相互关联,所以每个爻辞对应的是两个六十四卦,而《周易》之中所罗列的爻辞只是六十四卦之间的全部演化情况的一小部分。

所以如果透过卦爻辞古奥语句的迷雾而专注于《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象符号,我们就可以看出《周易》本身所内涵的数理模型是 $64 \times 64 = 4096$ 。就是说,按照《周易》的这种数理结构来理解,古人其实是把生活之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分为了 4096 种情况而一一加以讨论。

(2) 本卦·之卦推理模型的展开。

基于对阴阳二气的运化规律的考察,古人对一个事物的深入把握是通过八卦盘的复合化来完成的。第一次复合是把八卦推理模型复合为六十四卦推理模型,即由初阶模型之中的用单个八卦符号表示事物复合为中阶模型之中的用两个八卦符号来表示一个事物。所以直观地来看,所谓六十四卦推理模型就是



把下面和上面的两个八卦盘重叠起来，这就是《说卦》所谓的“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不难看出，这个中阶推理模型的数理结构是 $8 \times 8 = 64$ ，仍然不足以描摹生活之中事物生长、衰亡等丰富而生动的诸多变化，所以在殷末周初创作的《周易》里，六十四卦中阶推理模型被第二次复合化为本卦·之卦的高阶推理模型。这个模型是通过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的流转变化的（在筮法之中称之为“变卦”）来更加全面地体现一个事物的阴阳属性——一般是由四个八卦符号来表示。在实际应用中，要找到一个事物的全面阴阳属性一般需要有两次定位过程：

第一次：找到这个事物的“基准位置”，就是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各抽取一个八卦符号，组成第一个六十四卦符号——这叫做“本卦”。

第二次：找到这个事物的“修正位置”，也是在下面和上面两个八卦盘再次各抽取一个八卦符号，组成第二个六十四卦符号——这叫做“之卦”。

经过这两个过程，就找到了两个六十四卦符号即四个八卦符号来表示一个事物的阴阳属性。这可以说就是这个事物在阴阳二气运化中的“准确位置”——对其进行探究，就可以揭示事物的“象”本质，而且古人相信，这个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就蕴含在这几个八卦符号里。所以无论是使用《周易》占筮还是引用《周易》文本，古人的各种说解（包括《周易》卦爻辞），其最终根据都是这些八卦卦象以及由这些卦象所进行的推理判断。

比如《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司空季子的解说是：“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源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

屯卦下震上坎，豫卦下坤上震，所以《屯》之《豫》的卦象是：

坎 震

震 坤

按照司空季子的解说，参佐《说卦》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知道，震是车，坎是水，坤是土。屯是厚，豫是乐。因此这里本卦与之卦的卦象是：下卦上卦都震，震是车，所以有“车”往来内外上下，即“车班外内”；震为训，坤为顺，顺于训导，所以是“顺以训之”；坎是水，为泉为源，有泉源以资利用，即“泉源以资之”；坤是土，土为厚，是“土厚”；豫是乐，坤是土，为土地所产之“实”，所以是“乐其实”。



正是基于对八卦卦象的详细分析讨论，司空季子做出结论：真是不意味着拥有晋国，还有什么配得上这种卦象呢？

再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国知庄子引用《周易》的《师》之《临》即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并进行了解说：“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师卦下坎上坤，临卦下兑上坤，《师》之《临》的卦象是：

坤 坤

坎 兑

师卦的初爻由阴变阳，即师卦的下卦由坎变兑。坎为众，兑为少女，为“弱”，所以坎变兑是“众散为弱”。《说卦》有“坎为水”，“兑为泽”，所以坎又为川，因此，坎变为兑又是川变为泽之象，所以是“川壅为泽”。“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坎下变为兑下是“否”，兑为竭，坎为律，所以是“否臧，且律竭也”。坎为盈，为天，兑为竭，为不整，所以坎变兑又是“盈而以竭，天且不整”。军队没有纪律，势必众散为弱，正如川壅为泽。所以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通过对八卦卦象进行推理判断而得出来的。

从理论上讲，第一次定位是找到本卦，有 64 种情况，第二次定位是找到之卦，再分为 64 种情况。所以这就再次证明，《周易》是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分成 $64 \times 64 = 4096$ 种情况，从而展开讨论的，而且是通过八卦复合模型中事物的四重复合“卦象”之间的关联和转换来把握这个事物“象”的性质和变化。现在看来，这个推理系统可谓完备细密，是对“阴阳二气”各种组合情况全面、详细的理论阐述。

总 结

类似于数学上的代数研究方法，可以用甲、乙、丙、丁分别代表本卦与之卦的内外卦，这样《周易》386 爻之中任意一句爻辞的卦象根据就是这样一组八卦卦象：

乙 丁

甲 丙

这时候“甲”与“丙”不同，或“乙”与“丁”不同。在“甲”与“丙”相同、“乙”与“丁”相同的时候，这一组八卦卦象其实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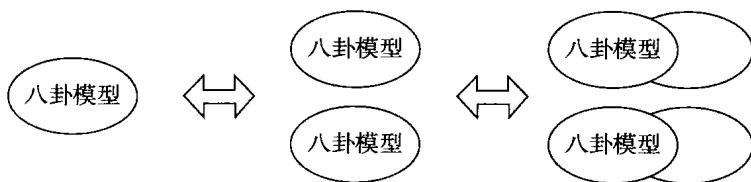


乙
甲

这时候与之对应的是《周易》六十四卦的一句卦辞。而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其卦象的解说基础始终是八卦这一低阶系统模型。

所以，根据这三种模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得出下面的关系式：

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即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唯一一本用符号和语言写就的著作，在其“占筮之书”的面纱背后，隐藏着“八卦 \longleftrightarrow 六十四卦 \longleftrightarrow 本卦·之卦”这一套完备而成熟的推理模型。这种模型化的对万事万物的考察方法，展示了中国古人对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运动的深刻理解和精微把握，至今仍有着不可抹杀的生命力。可以说，在占筮的外衣下，《周易》文本中蕴含着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通过建立模型而展开的阴阳合化的“象”哲学，而就这种思维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周易》无愧于中华第一经的称誉，值得后人再三揣摩。

四、孔子“序”《易传》

《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是关于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最早记载。但是古汉语中“序”字的含义比较丰富，做动词用的时候可以是“排序”、“赠序”、“叙述”等不同含义，太史公所谓的“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传统易学而言，从汉代直至唐代，都认为《易传》十篇全部是孔子所作，因此按照这种说解，太史公所谓的“序”有着“《序》”、“作”和“作《序》”这三重含义。比如《史记正义》就把“序”字直接解释为“易序卦也”，就是指《易传》中的《序卦》



这一篇——“序”就是“《序》”；但其又说：“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其中又把司马迁所谓的“序”字解说为“作”和“作《序》”两种意蕴。之所以说其中有“作《序》”的含义，是因为司马迁的原话里面并没有提到《序》或《序卦》。

再比如《汉书·儒林传》有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肯定司马迁所列举的“《彖》、《系》、《象》、《说卦》、《文言》”都出自于孔子的创作，这就认定了司马迁所说的“序”有“作”（“为”）的含义；而《汉书·艺文志》则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与《史记》中的原话相对照可以发现司马迁所说的“序”字又被解说为“作”（“为”）和“作《序》”（“为《序卦》”）这两个意思。

那么《易传》之中的十篇文章，即《彖》（上、下）、《系辞》（上、下）、《象》（上、下）、《说卦》、《文言》、《序卦》、《杂卦》真的都是孔子所作吗？现在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继承孔子解《易》的宗旨，借助于《周易》筮法的独特结构形式，综合诸家之说，演绎儒家的价值观念，编成《易传》一书”。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本人并没有亲手写作《易传》全部篇章，“但不否认孔子曾经讲《易》，不否认现存《易传》中载有孔子的言论”。所以，传统易学之中对“序”字的解说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以疑古思潮为背景，现代学者们改变这一句的句读，提出了对“序”字的新解说。比如金德建先生就对《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语进行了新的句点解读：“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里金德建先生把“序”字与“系”、“说”并列，都解释为动词，这样“序”字的含义就非常接近于“作”（创作），即传统经学之中“序”字的第二重含义。金景芳先生则认为对这一句的理解应该是“孔子晚而喜《易》，著《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里金景芳先生把“序”字解释为名词，其含义是“《序》”，指《易传》中的《序卦》，即传统经学之中“序”字的第一重含义。

一个拆拼词句，一个添字解经，现在看来，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序”字，恐怕很难给司马迁这句话一个圆满的解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而杨何为孔子易学传承体系中的九传弟子，这在《史记》之中有明言。司马迁的易学知识来源于其父，直接承续孔门正宗，所以《史记》中的这一段记载非常可信。既然太史公的所谓的“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是准确的记载,那么,太史公用相对含混的“序”字而不用含义明确的“作”字,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只有在对《易传》十篇的内容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梳理,特别是对孔子的易学思想有一个清楚的把握之后,我们才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回答。

孔子对《周易》的解释理路

《系辞》和《文言·乾》中有“子曰”共二十九句,应该是孔子之语无疑。所以可以通过对这些孔子直接解说《周易》语句的分析讨论来考察孔子解说《周易》的学术理路。《系辞》之中“子曰”共二十三见,《文言·乾》之中“子曰”共六见,根据其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易》的整体德义内涵进行阐述,共计六次。如: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所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其中出现了阴阳的概念,明显比《庄子·天下》之中的“《易》以道阴阳”一句要早。所以可以认为孔子时代,阴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往往是学者之常识。

第二类是对《周易》个别爻辞的德义内涵进行阐述,共计二十三次。其中有一些是先在文本之中引用《周易》爻辞,然后引用孔子所说过的针对这句爻辞的解释话语,共计十六次,其中有一句重复。限于篇幅,下面仅举出其中三例。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 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孔子对《周易》卦爻辞的义理阐发是非常彻底的,比如孔子解释“潜龙勿



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中的“龙”是“龙，德而隐者也”，“龙，德而正中者也”。那么这个“龙”很明显就是指有德之人，或者说是“德而隐”或“德而正中”的君子、大人；而这种解说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对龙的解说“龙，水物也”有着根本不同，甚至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自己所说的动物之龙，即“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也是决然不类。所以，“《易》之要，德之谓也”（帛书《易传·要》），这可以看作是孔子解说《易》的整体方向 and 核心原则，这一点绝不含糊。

在第二类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引用孔子所说过的话，即下面罗列的七个例子。在这些话里面包含着孔子对《周易》爻辞的解说和引用。这种《周易》爻辞引用意味着孔子对《周易》爻辞的义理阐发已经非常充分了。甚至《周易》爻辞已经有了完全义理化的倾向，即如儒家著作之中频繁出现的“观点—论证—《诗》或《书》文句”引述格式一样，出现了“观点或论述—《周易》爻辞”的例子。就是说，孔子在讲述一些道理后，往往会引述《周易》爻辞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述或观点，这就像是引述《诗》或《书》的文句一样。这说明，就阐释其中义理的角度而言，《周易》已经与《诗》、《书》等同起来了。试举几例：

子曰：“小人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不难看出，孔子在阐发《周易》爻辞的“德义”内涵之时，不讨论更不寻求其所阐述义理的“象”——无论是卦象还是爻象——的根据。即使孔子话语里面出现了“中”、“位”、“上位”、“下位”等字句也是义理概念，没有非常明确的爻象意义，所以在这个“德义”的解释过程之中，孔子无疑非常彻底地抛弃了《周易》爻辞的象数根据。

比如在解说“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句爻辞时，孔子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



其可得见邪？”对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之中陈文子对这句爻辞的卦象解说可以发现：

第一，困卦坎下兑上，大过卦巽下兑上，坎、兑、巽、兑这最基本的八卦卦象被孔子完全抛弃了，孔子所阐发的义理之中也绝没有什么“夫从风，风陨妻”之类的卦象解说。

第二，陈文子对这句爻辞的解释是“‘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这些都是对爻辞基本含义的解说。孔子的解说路数则截然不同，所谓“非所困而困”、“非所据而据焉”是由“困于石”和“据于蒺藜”的事件而生发出来的义理教训，而“名必辱”、“身必危”则是对义理教训的进一步发掘，所谓“非所困”、“非所据”、“名”、“身”明显是根据爻辞所做的义理推演，或者说是义理教训的提升。“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孔子用“辱且危”代替了对“凶”这个断语的解释，而且用“死期将至”这个推论，把“不见其妻”这个卦象判断消解为“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的义理推演。这种义理改造完全超越或覆盖了原有的春秋时期“据象说辞”的解说逻辑，纯粹代之以义理的推演和教训的开示。

综上所述，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孔子的义理阐发比较自由，其中也没有追求体系化的诉求。

《易传》成书的复杂性

在两千多年的易学研究史中，唐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易传》虽蕴含孔子思想，但非孔子亲笔所作，乃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准确讲，除了自古流传的思想资料外，《易传》中的很多内容是孔子口授而由其门人弟子们记录整理的，这是先秦诸子著作的惯例。比如《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之中都有这种祖师“述”之而门人弟子记录的内容。当然，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门人弟子们在文本之中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阐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各自时代的思想。所以，《易传》十篇的形成过程复杂，就其中某一篇而言，也往往并非是由一人一时完成的。整体而言，《易传》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即经过讲授、记录、整理、汇编等一系列的渐进和反复。《易传》的编撰者也不止一人，应该是从孔子到西汉儒者这样一个“创作—编撰”群体。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今本《易传》的内容在总体上分为三类：即自古



流传的《周易》解说、孔子的思想、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思想——即如金景芳先生所认为的：《易传》“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有弟子记录的部分，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

第一类，自古流传的《周易》解说。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易》或《周易》的产生以及《周易》占筮方法等。这些资料的首位整理者应该就是孔子，孔子把这些资料整理后汇编进了《易传》。而现在看来，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和传授才使得这些宝贵资料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就这一点而言，孔子功居至伟。

第二类，孔子的思想，其中主要是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言论的记录、整理和一些必要的补充、完善。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孔子确实是以“观其德义”为原则对《周易》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义理改造和阐发，而他的学术理路又被其早期的门人弟子们直接继承。在忠实继承孔子学术理路的基础上，战国早期的儒家学者对孔子思想不仅进行了记录、整理，而且很可能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完善。因此，《系辞》之中既有孔子直接阐说《周易》的原话，也有明显经过整理的理论性比较强的阐发易之德义的文字内容。

第三类，流传中掺入的与孔子思想有明显差距的晚出的儒家学者的思想资料。这些晚出的思想资料在《易传》之中分布较广，可以是《易传》之中的一篇或数篇，比如《序卦》和《杂卦》，也可以是一篇中的一章或数章。正所谓“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战国时期儒家学术的流变也反映在儒家易学之中。战国中、晚期的儒家学者的学术理路与孔子的解《易》理路往往不尽相同。

整 理 之 序

司马迁所说的“序”的含义虽然比较模糊，但是无疑有整理、编排的含义在里面，这可以说是“序”的第一重含义。吕思勉先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序者，次序之谓，原不谓其辞为孔子所自作。然则《彖》、《系》、《象》、《说卦》、《文言》盖皆《周易》之旧，孔子特序而存之尔。”这与《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里的“序”字含义相同。

那么，孔子整理、编排了自古流传的哪些资料呢？现在看来，这些思想资料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比较系统的文字资料。这种资料一定存在，至少从《周易》编创的殷末周初到孔子时代，对《周易》一定有一套系统的解说。《左传》、《国语》之中的二十二个筮例，以及《左传·昭公二年》所提到的《易象》都是这种典籍存在的明证。而且，由于这种资料对《易》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古代的学者对它一定都极为重视。可以想象，孔子拿到这种资料会如何处理。正如《论语·述而》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对这种材料最为可能的处理就是按照原文直接抄录，可能进行了必要的编排，但对其中特别完整的内容的处理极可能是单独成篇。这种单列的篇章在此后数百年的抄录、流传之中即使有意无意地混入一些其他的内容，或者部分文字有所改动，但这只是局部的情况，应该并不影响其整体和主要内容。

很明显《说卦》就是属于这一类，正如同任继愈先生所言，“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见诸于文字迟，其思想可以有很早的起源。阴阳观念以及五行、八卦观念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只是由于古代文献保存极为困难，致使其见诸文字比较迟，但是这些观念往往已经在古人的不言之中，因为这都是古代学者的基本常识。虽然《庄子·天下》之中有“《易》以道阴阳”，但这绝不是阴阳观念的源头或首次出现。

从文本来看，《说卦》除了开篇的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战国时期编入的具有义理阐发性质的两段文字以外，其余的都是对八卦卦象的阐述和八卦取象的例证，这些是自古相传的对《易》或《周易》进行解释说明的文字资料。因为正如某些学者所述，“从其内容言之，它专言八卦，是易学最基本的理论。也就是说，无论是解说《周易》，还是运用《周易》筮占，皆离不开八卦卦象的分析，而且这是重要的一步”。笔者怀疑《说卦》中保存的这些自古相传的解《易》资料就是《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所说的春秋《易象》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由于《易传》编撰者（《易传》的编撰者应不止一人，其第一位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其后就是战国时期直至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们，这里所说的编撰者偏重于孔子）的改动，把这篇文字的标题写作“说卦”，却把“象”这个含义更为深刻的标题放在典型的儒家作品《象传》上面——虽然这个《象传》中的义理解说与原本的《易象》在学术理路上差异巨大。后来儒门后学又在《说卦》篇首加入一些经过整理的孔子说《易》的文字，进而为《说卦》加上了一顶儒家的帽子。

第二种，自古相传的对《易》的口头解说，特别是对于《易》创作、八卦起源、



《易》的基本原理等最基本也是最关键问题的解释。可以想象,因为时间追溯久远,人们理解《易》的基础很可能就是口口相传的对《易》的作者和《易》的创作情况的描述和解说。这并不妨碍一代代的古代学者们进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不管能否理解,不管是否理解准确,《易传》编撰者(或者孔子)把听到的记录下来,再进行一定的加工和润色,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文字资料。《系辞》中的很多内容就属于这一类,而《文言·乾》之中对“元亨利贞”的解说则与《左传·襄公九年》穆姜的解说基本一致。

第三种,关于《周易》占筮的资料,其中有些可能是文献,更多的可能就是口头代代传授。这些资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卜官、筮者,或者是当时掌握《周易》占筮相关知识的学者的阐述讲解。“学而不厌”的孔子周游列国,拜访过很多学者,而其中很可能就有人特别擅长《周易》占筮。春秋时期《周易》的基本应用就是占筮,孔子自称“百占而七十中”(帛书《易传·要》),显然他专门学习过占筮并曾经多次实践——这是当时学习《周易》的重要方法。这部分内容包括《系辞》中有关于“大衍之数”的记载、占筮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对占筮的评论等内容。

讲述之序

根据上面对孔子易学思想的讨论,《易传》中包含的孔子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孔子的原话,或者说是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讲述进行记录和整理而形成的思想资料。《系辞》和《文言·乾》中有“子曰”共二十九句,可以都归入这一种。

第二种,孔子弟子门人对孔子的讲述记录进行补充、完善后而形成的思想资料。顺着孔子的思路,儒门学者对孔子思想的补充和完善,其中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孔子的学术理路。虽然阐释角度、阐释重点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可以归属为孔子的思想。

《系辞》之中还记录着孔子多次对同一问题或相关相近问题的申说,有的是论述角度不同,有些则仅仅是部分文字不同,但是也被一一忠实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可能有不同的传承来源。可以想象,在一个比较长的成书过程中,《易传》中的材料不停地被儒家学者们收集和整理,进而被加工和补充,很可能经过



了上百年才最终定稿，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司马迁所说的“序”的第二重含义：“序”即“述而不作”之“述”，孔子讲述《易》之大义，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易传·要》）。这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里的“序”字含义相同。

肇 绪 之 序

在《易传》之中，包含着很多晚出的儒家学者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之中的学术理路与孔子的解《易》理路并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些思想之中的学术理路与孔子对《周易》的解说理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差距呢？

与孔子的阐述思路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后期的儒家学者们以“德义”为导向继续对《周易》进行阐释时进行了“理论创新”，或者说他们对孔子的原有的学术理路进行了一些“修正”，而这种“理论创新”或“修正”就体现在讨论德义的象数根据和力图使《周易》卦德解说系统化、完整化。因此这些晚出的《周易》解说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而主要是后代儒家学者的思想。或者说，孔子的《周易》解说仅仅是“肇其绪端”，而儒家后学则抓住一点点内容乃至片言只语大加发挥，多方铺陈而力求完备。这就形成了非孔子所“述”的《易传》的一部分内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门传《易》的谱系：“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这个传承过程长达两三百余年，很可能只是一支主线，而在这些有名字留下的儒家学者背后还有更多的没有名字留下的儒家研易者。这些儒家易学传承者之中肯定有人在《易传》里写下了自己的义理发挥和理论创造，而且字数不会很少。

就其学理内涵而言，这些儒家学者们的思想又可以分解为三个理论展开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以八卦卦象生发义理，即以八卦卦象作为儒家义理的根据，以《大象》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也非常完整。这种解说维度无疑与春秋易说有一定的承接关系，所以其出现应该比较早，有可能是在战国早期。

第二个维度：为义理寻找爻象根据，即以爻象解说儒家义理，以《小象》为



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不完全，尽管在形式上其完成了对《周易》爻辞的全面解说；其产生可能是在战国中期，而对其理论方法的完善和补充则一直持续到汉代，并最终形成了“爻象说”。

第三个维度：用义理解说《周易》卦序，即以义理解说通行本《周易》之中的六十四卦卦序，以《序卦》为代表。这一个理论向度的理论发育完全，内容非常完整。但是由于理论基础的先天缺欠，其论说往往缺乏说服力，可以说是一个不很成功的“理论创新”。

就是说，沿着孔子阐发德义的解《易》理路，很多儒家学者对《周易》都进行了一番发挥创造，其内容不断地被整理、汇编，最后才形成了《易传》文本，并使得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印记。从这个角度来讲，司马迁所说的“序”含有“绪”的意义，“肇绪”是“序”的第三重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原话里面没有提及《序卦》和《杂卦》。《序卦》“似当成书于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杂卦》则稍晚于《序卦》。所以《易传》之中的《序卦》和《杂卦》两篇距离孔子时间最远，其内容也与孔子思想关联甚小。但是由于汉代经学兴起，它们也堂而皇之地名列《易传》之中了。

五、《易传》各篇的基本内容

《易传》是一部汉代结集的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最终成书于儒家学者之手。《易传》共七种十篇，它们是：《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序卦》和《杂卦》。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上面讨论过，《易传》十篇按照其重要性和历史分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说卦》和《系辞》。

第二类是《象》、《彖》和《文言》。

第三类是《序卦》和《杂卦》。

《说卦》和《系辞》

《说卦》又称《说卦传》，是系统地解说八卦的专著，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没有《说卦》，《周易》就不可能被读懂。



“说”，有陈说、解说之义。《说卦》一般被分为十一章，其内容主要说明八卦产生、过程，八卦的性质、功用、方位，以及八卦所代表的卦象。其中八卦的性质、基本卦象是分析《周易》卦象、进行筮占的基础。《说卦》与《系辞》性质接近，其中都包含着从春秋时期以至于西周时期一直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这两篇是理解《周易》本原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料。当然，《说卦》之中也有一些很可能比较晚出的思想资料，比如“参天两地”说、“三才之道”说，可能都是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儒家学者的思考和创造。最为重要的是，《说卦》对《周易》八卦中每一卦的卦义所象征的事物或原理作了归纳式的整理，反映出八卦取象之学是一套可以象征地解释天地万事万物的系统学说。

《系辞》题目之中的系，系属；辞，文辞。所谓“系辞”，本义是指系属在卦爻之下的文辞，即卦爻辞。《易传》以系辞为篇名，专指《系辞》，其含义为系附在《周易》后面关于《周易》通论的文辞。《系辞》分为上、下两篇，称《系辞》上、《系辞》下。《系辞》分章，自古以来不统一，一般说来，多采用两种分法：其一，分上篇为十三章、下篇为十一章；其二，分上篇为十二章、下篇为十二章。

《系辞》是对《周易》总的说明，也是学易必读之篇，大致而言，《系辞》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阐述乾坤在《周易》中的地位以及内在的深刻含义；追溯《周易》起源、形成、作者、成书年代（对于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都作了说明）；揭示《周易》的作用为认识事物规律、预知未来、道德修养、安邦治国、观卦象制作器具；解释《周易》其中的十六卦十八辞，其中的内容与《彖》、《象》大不相同；说明《周易》体例，包括卦位、作用、爻位、爻德等；保留了古代原始的占筮方法——大衍筮法，并对其客观根据作说明。

可见，《系辞》是内涵丰富的作品，比如如何解释卦爻辞、如何占卜、为何作易、远古社会的观象制器、儒家的天道观、易象如何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周易的体例宗旨等，很多有关《周易》的根本问题都在其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说。所以《系辞》是后人认识《周易》的入门书，也是进行易学研究的基础。

《系辞》总论《周易》大义，是今本《易传》中内容最为复杂的作品。比如《系辞》解释了一些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其中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以及爻位说，而爻位说则是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系辞》又论述了揲蓍求卦的过程，用古代数论的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的原理，这些内容基本上就是在春秋之前流传的思想资料。《系辞》还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



人之道的典籍，它有四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是卜占。这种说法明显就是战国中晚期以及秦汉时代儒家学者所作出的某种理解。《系辞》还认为，《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忧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这些说法都明显带有儒家说教的味道，并不是《周易》的本真。

对《周易》的基本原理，《系辞》保留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阐述和解说，比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实际上，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二卦、八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周易》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 worldview，用阴阳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系辞》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拟，其根源在于自然界，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系辞》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把以蓍求卦的过程的理论基础完全阐明，这也是八卦宇宙生成论，这都对后来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彖》、《象》和《文言》

“彖”，即材，通“裁”，有裁断之义。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叫“彖辞”。历史上有些学者把“彖辞”也叫“卦辞”。虽然有一些文字上的依据，但是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易传》之中的“彖辞”和《周易》之中的“卦辞”差距有十万八千里，初学者一定要注意区分。就《周易》而言，对卦辞的这一种并不准确、更不具有权威性的解释称为“彖”，《彖》以“彖”作篇名，这也就是指这些战国时期出现的某一套解说的汇编。《彖》共 64 条，按照《周易》分为上下经的分法，《彖》也分为上、下，即《彖》上、《彖》下。《彖》是针对《周易》每一句卦辞作逐句解说的解释性作品。《周易》有 64 条卦辞，所以《彖》就有 64 条彖辞条文。在王弼之后，绝大多数的《易经》编者，都直接把《彖》以及《象》、《文言》甚至《序卦》、《杂卦》之文



句编于每卦的卦爻辞前后,成为今日我们熟悉的比较通行的本子。这种本子叫做混排本,其编排方法很不科学,专业研究者不使用它,它很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古往今来很多易学学者都不知不觉受到了这种混排本的误导,很多人终身无法自拔。

《象》,又称《象传》。《易传》中的“象”,一般是指卦象。对于《周易》中卦象的划分,古代有不同的意见:有分为实象、假象两种的;有分为本画象、实取诸物之象和取象明义三种的;也有分为七种的,如: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易传》中作为篇名的“象”是指《象》,从上下经来看,它分为《象》上、《象》下两篇;从解说内容来看,又可分为两部分:《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卦象卦辞,《小象》是解释爻象爻辞。

《大象》解释卦象的方法,是先用八卦之象解释六十四卦卦象,然后比拟人事,君子应该如何如何,先王应该如何如何,说明根据此卦象当如何去行动。《小象》释辞的方法:第一,取爻位说。第二,用辞句来解释爻辞。《小象》在一些方面的解释很差劲,说了还不如不说,大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意思。第三,从义理方面释爻辞。

《文言》专言乾坤二卦卦爻辞,所以又可以分为《文言·乾》、《文言·坤》。“文言”之辞,古者多解,有说以文饰乾坤的,有说依文言理,有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故曰文言,也有说乾坤德大,持以文饰而为文言。本篇以“文言”为名,有指其文句优美之意。《文言》文字不多,专门解说乾、坤两卦卦爻辞,而且解说了三四遍,每一遍都不大一致,可以看出各个学者的学术功力和发挥角度之不同。《文言》通过注释乾、坤两卦卦爻辞,阐发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其中特别注重君臣上下、安邦治国、修心养性的儒家义理,所以可将它与《彖》、《象》一样都看作是比较纯粹的儒家作品。

《序卦》和《杂卦》

《序卦》对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及排列的根据进行说明,它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说明乾坤两卦为什么居《周易》之首,又以因果联系、物极必反、相生相成观点,解释随后的六十二卦卦与卦之间的关系,最后以“物不可以终穷”解释未济为《周易》最后一卦。

必须承认,《序卦》的解释颇多牵强附会,很多时候都是在自说自话。但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序卦》的创造性也就在于它是尝试着讨论和说明《周易》卦序之所以如此排列的第一篇文章。在讨论和说明《周易》卦序的过程之中,《序卦》的作者构造了一套世界演化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了《周易》六十四卦的循序演进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世界演化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思路的说服力是非常乏力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破绽百出的世界演化及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基本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实上《周易》卦序不止有一种,所谓的“世界演化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与《周易》卦序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

《杂卦》把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逐对进行对比说明,简要阐明卦名之义。之所以称“杂”,是因为它打乱了《序卦》六十四卦的排列,完全按照作者自己的理解重新排列六十四卦,从而对卦义进行非常主观和片面的解说——从这个角度讲,“杂”,几乎就是杂七杂八的意思。

《杂卦》是将《周易》六十四卦中每两卦所显示的某种对比意义予以阐发的一篇短文。有很多学者认为,从卦象来看,《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序,正好是以非“错”即“综”的方式排列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所谓“错”,就是两卦中每一爻之阴阳性正相对反,是为相错之两卦;所谓“综”,就是两卦由下至上之爻序正相对反,是为相综之两卦。《杂卦》以为《周易》卦序既有如此之特性存在,那么《杂卦》就可以将《周易》中所有或相错或相综之相临两卦的各种对比意义予以揭露,进而阐发儒家义理。实际上《杂卦》的这一做法及其结果,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启发后儒继续牵强附会以至于创造易学新原理的渊藪。



第三日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古今易学研究概述

从汉代开始,诸多儒者不断地对《周易》经传作出各种各样的阐释,从而形成了各个时代的易学。概括地讲可以分为四个各具特色的历史时期:汉代象数易学、宋代义理易学、清代的学术总结、20 世纪的现代易学研究。以下按照年代次序,分别加以介绍。

一、汉代象数易学

汉代易学据说开始于一名叫做“菑川田生”的儒者,后来也分化成了几个流派。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所谓“孟京”学派。他们在易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卦气说”。那么什么是“卦气说”呢?原来在战国秦汉之际,多数学者都接受阴阳二气学说,他们进而认为:一年四季的变化、更替,是阴阳二气运行不已所成。冬至日,阳气始发,后逐渐壮大,直至夏至日。然后阴气始发,后逐渐壮大,再至冬至日,阴气极盛,阳气遂又开始发生,完成一个循环。为描述阴阳二气在不同时间段中的运行状况,人们发明了不止一个符号系统,今天仍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就是这样的系统之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具体应用就是“七十二候”,即将每一个节气再划分成三段。“二十四节气”以及“七十二候”主要是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关。

受当时天人感应学说影响,在汉代儒者那里,气的周年运行,还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即是说,是上天让气如此运行不已的,这如同在西方思想中认为天



体运动是上帝推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上天让气运行,有一个正常的基本运行状况,而发现这个基本运行状况的不正常状况并进行别有用心的解释,就是汉儒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假如发现气的运行异常,往往就被认为是人特别是当时的皇帝的行为违背了天意,这时就要“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如同音律学用音律描述阴阳二气运行的正常状况那样,汉代易学则用《周易》的卦象描述阴阳二气的运行状况,这种学问,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依据就是“卦气说”。

具体来讲,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就是运用《周易》的六十四卦,挑选出其中坎、离、震、兑四卦,指定它们分别主管一年中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其他的四卦,也是每一个卦主管一个重要节气,如巽主立夏,坤主立秋,乾主立冬,艮主立春。卦气说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以及“六日七分法”可以配合起来使用。这样,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可以用某个卦象的阴阳配比状况进行说明。

所以依据阴阳配比的状况,说明一年之中每一时间段中气象、物候的正常状况。假如事实与说明一致,说明阴阳二气运行正常。不一致,就要进行占卜,推测天心天意,改进施政状况。

这样一种学说,似乎给天象的正常、异常作了一个合理的说明,所以受到扬雄、王充等人的支持和赞扬。扬雄仿照卦气说,创作了《太玄》。《太玄》用八十一个玄象代替卦象,用当时刘歆所造的《三统历》代替原来《四分历》。虽然关于每一时间段的天象、物候,各个学者说法也略有不同,但基本思想一致。比如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极力批评天人感应都是“适逢偶会”,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但是他又认为卦气说使每年的水旱灾害状况有规则可遵循,因而认为它是正确的理论。

由于卦气说要描述一年之中每一时间段内的天象、物候状况,所以后来成为历法的组成部分。直到隋唐时代,历法中还有卦气说的内容,并且作为预测气象的根据。由于后人逐渐认识到这样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对于生产实践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所以从宋代开始,历法中就不再包含卦气说了。

下面谈一谈“卦变说”。

《周易》原本是占筮书,然而,所占问的事情千变万化,卦辞和爻辞却只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使用《周易》占到的卦爻辞同实际占筮所贞问的事情不相符合,这就必然影响占筮者对占筮结果的解说和吉凶判定。为了使占筮能够在卦爻



辞不是完全符合所贞问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解说，春秋时期人们是直接通过对八卦卦象的解说得出结果。因为占筮时发生变卦，即占筮操作是通过六九爻变规则，使占筮的结果从一个六十四卦（本卦）改变成为另一个六十四卦卦象（之卦），这样就有一组一共四个八卦卦象可以作为解卦者创造新解进而得出吉凶判断的根据。直到现在，现代汉语中形容某些人轻易改变主张的情况，还往往说：“又变卦了。”用“变卦”形容人轻易改变主意的状况，起源就是《周易》的占筮方法。

但是这种在实际占筮操作时候发生的变卦，到了东汉时代却被别有用心地挪作他用：汉代易学家们充分发挥了理论创新能力，创造出了变卦的卦爻辞解说方法，进而出现了“飞伏”、“升降”等变卦的具体方式。依据这些变卦方式所制订的规则，当卦象不适合解说卦爻辞时，他们就可以无中生有地变到另一卦，而且可以一直变下去，直到得到比较满意的解说为止。根据这种规则，由一卦甚至可以变成其他六十三卦中的任何一卦。这样，儒家的易经解说者就可以用任何一种卦象，去说明任何一句卦爻辞的吉凶。不过这样一来，所谓卦爻辞的卦象根据也就失去了确定性。而实际上既然失去了确定性，这些众说纷纭的易学家们的诸多解说也就没有了准确性和基本的衡量尺度，也就近乎于智力游戏，根本谈不上什么可信、不可信了。

就整体而言，汉代易学对于卦爻辞的解说根据特别追求，所以对于卦象所象征的事物，以及卦象与其他事物比如星象等现象的表面联系，探讨得广泛而且深入。由此凸显了汉代易学的特点，就是强调“象数”，即以卦爻辞的象数依据作为最根本的易学问题，并以之为中心展开研究。所以学界一般把汉代易学称为“象数学”。当然，比较而言，汉代易学最重视的是“象”，“数”居于次要位置。对于“数”的重视，到宋代的邵雍那里才发展到最高的程度。

汉代的时候，由于“独尊儒术”的政治环境，《周易》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成为了一种“官学”，所以易学专业研究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周易》研究的学者。但是，由于对古代文献秉持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客观研究态度的孔子已经被捧成了“圣人”，以他的名义编撰的《易传》也被尊奉为金科玉律，因此几乎所有的易学研究都要从《易传》开始。这时候去古未远，学者们还略知《易》之本底，知道要尊崇象数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所看到的爻象和爻数已经不是春秋时代的卦象、筮数了，《周易》文本早已经在圣人之教的投影



下扭曲变形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先天欠缺是人为智巧无法弥补的。为了自圆其说、标新立异，也为了生计所迫、膏粱之谋，汉代学者们的“学术创新”层出不穷。很快，繁复的象数解释方法被推向了极致，覆象、半象、互体象令人眼花缭乱，其使用更是随心所欲，难以揣摩——似乎一切只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这些解释却使得人们对《周易》本真的认知更加糊涂。

一般来讲，汉代易学家们解说《周易》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爻象、卦变、消息卦。前二者是比较纯粹的理论说明方法，而消息卦则具有实际应用的内容。

所谓爻象，就是在一个六十四卦之中通过讨论六个阴阳卦画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辨析或说明卦辞、爻辞以及吉凶断语的根据和来源。就其具体使用而言，有得位、承、乘、比、应、据、中、主爻等很多种具体解说方法，古今很多易学书籍都对其进行了引用或说明，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上文提到过，所谓卦变，就是构造出一个六十四卦变化体系，通过讨论在这个变化体系之中一个六十四卦与其他六十四卦之间的转化关系来辨析或说明卦辞、爻辞以及吉凶断语的根据和来源。这种理论解说方法主要出现在汉末虞翻的易学之中。

消息卦，是用十二个六十四卦之中的七十二个阴阳卦画来解释一年之中的节气变化以及物候特征，其代表人物是西汉的孟喜。按照这种理论，十二个六十四卦，即“十二消息卦”，是由乾坤二卦相互推移而形成的十二卦，它们是其他六十四卦的基础。“十二消息卦”依阴阳消息的次序排列如下：

复卦初六 冬至 姤卦初九 夏至
 临卦六三 大寒 遁卦九三 大暑
 泰卦九五 雨水 否卦六五 处暑
 大壮初九 春分 观卦初九 秋分
 夬卦六三 谷雨 剥卦六三 霜降
 乾卦六五 小满 坤卦六五 小雪

按照这种理解，从复至乾，阳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阴爻则逐渐减少，表示阳气增强、阴气减弱，为阳息阴消过程；从姤至坤，阴爻逐渐增加，从下往上增长，阳爻逐渐减少，表示阴气增强、阳气减弱，为阴息阳消过程。

消息卦还以“乾”卦含子、丑、寅、卯、辰、巳，“坤”卦含午、未、申、酉、戌、亥，以两卦十二爻表示一年的十二个月，即以一年为一个循环周期。



就《周易》应用而言,代表人物为严君平、扬雄。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道家修行者魏伯阳将《周易》之中的阴阳之理与人体丹道修行实践结合起来,写就了《周易参通契》一书,足以光照后人。

二、宋代义理易学

宋明之后,《周易》的义理讲解已经泛滥,尤其是熔铸在宋代理学之中的易学义理可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驳杂繁复的义理发挥虽然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之中最接近哲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们对于《周易》本原及其文本生成仍然没有添加任何有力的说明。因此,清代大规模的易学整理也就集中在象数方面特别是汉代易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如果以求真的标准来衡量宋代义理易学,其学术价值委实不高。

宋代图书学派的易学学者在探究《周易》本义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研究成就直追汉代。其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河图、洛书、太极图三个图形上面,所以宋代易学在很多时候也被称为图书之学。

这一时期应用《周易》最为突出的就是大学者邵雍,他著有《皇极经世》,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易学推演。邵雍还开创了先天易学,并有“梅花易数”传世。

关于宋代的义理易学,下面主要介绍程颐、朱熹以及欧阳修三位学者的易学研究。

《伊川易传》,又称《程氏易传》、《周易程氏传》,是一部解说《周易》儒家义理的经典著作。北宋程颐撰,程颐(1033—1107),字正叔,洛阳(今属河南)人,后学者一般敬称之为伊川先生。绍圣四年(1097年)程颐开始撰写《易传》,元符二年(1099年)书成。书成后,程颐并不满意,所以并未急于示人,而是准备再用十年的时间进一步研究和修改,所以这部著作程颐直到逝世前才授与门人弟子。程颐治《易》推崇王弼,所以全书模仿王弼著作的体例,只注解六十四卦和《彖》、《象》、《文言》,而没有注解《系辞》、《说卦》和《杂卦》。在《经》、《传》混编之余,程颐又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作为全卦解说的中心。程颐解《易》,可谓是重义理而轻象数。他主张“因象以明理”,认为“事尽天理,便是易也”,将《周易》



视为天下万理的总括,实际上不过是在彰显理学。程颐借解释《周易》卦辞爻象来阐明儒家义理,并在《易传序》中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理学命题,认为无形的理寓于有形的象中,理与象即是理与事的体用关系。易象反映天地万物之物象,易理则概括了天地之理。理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又是社会等级、人生道德的由来。可以看出,实际上程颐通过注解《周易》构筑了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用理学思想成功地完成了对《周易》的发挥和诠释。

《伊川易传》是易学史上继王弼《周易注》之后的又一部义理派名著,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著作,朱熹的《周易本义》就是直接接续其论说。

《易童子问》,北宋欧阳修撰。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著有易学著作多种。《易童子问》是其易学代表作。因书中以作者与童子问答形式解释卦义,对很多疑难问题进行辨证诘难,故而得名。《易童子问》共三卷,卷一、卷二解说了四十个卦的卦辞及《彖》、《象》大义——也都是泛泛的义理阐发,卷三为《易传》之考辨——这一卷学术价值最大。总体而言,欧阳修说《易》,倾向于义理,反对卜筮,强调《易》的主旨在于急人事之用,而与天道无关。他以为卦义是为中人以上的圣人君子而设,爻义是为中人以下人士而设,因此专解卦义而不涉及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易传》中《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五种“繁衍丛脞”、“自相乖戾”,乃后人杂取拼凑而成,虽有孔子之言,却非孔子所作,强调必须明辨是非真伪,不能盲目尽信。《易童子问》的创作正处于宋庆历年间(1041—1048)汉唐经学向宋学转折之际,其大胆疑经之风在当时已经颇有解放思想之功效。对于《周易》起源与创作,从汉代开始人们都普遍相信“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千百年来在经学的统治之下人人习于旧说,而这本书实际上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对于这本书,《四库全书》不把它归入经部,而随《欧阳文忠公文集》一起归入集部别集类,可见其离经叛道之力度,直至清代仍然让正统经学家们难以承受。然而历史上的无数易学家都把它看作是解经之书。特别是在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就易学而言,欧阳修之论说可谓是易学研究思想解放之先导!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学宗程颐。但在易学方面他的见解与程颐不同。程颐治易主易理,反对穷极象数。朱熹则喜言卜筮和无极、太极、先天、后天的理论。



朱熹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相信河图、洛书是伏羲旧物，所以他在《答袁机仲书》中说：“某于世传河图、洛书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布悖，而证验不差尔。”他批评程颐的易学，说道：“《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所以有人认为，朱熹对于《易经》的解读，乃是一种对程颐解《易》思考方向上的补充与转折。朱熹虽然肯定程颐所阐发的《易》之义理，但是他也努力还原其作为卜筮之书的原貌。朱熹的易学著作很多，主要就是《周易本义》，其集中表述了朱熹的易学的思想。《周易本义》在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流传甚广，一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用书。

三、清代的学术总结

清代学者如毛奇龄、胡渭等，他们从考据入手，对前代许多易学文献提出了新的看法，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非常有益于后来的易学研究。毛奇龄的《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河图原舛编》等，都是以考据为主，不以空言说经，试图辨证图书源流，努力说明历史真相。胡渭的《易图明辨》，系清初以来易图辨伪的集大成之作，是后人研究河图、洛书以及太极图的基础。清代汉学流行，重视汉易，以汉代象数易学方法研究《周易》成为学术主流。比如惠栋、张惠言、李道平、焦循等人就对汉代易学家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辑录。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整理工作，近现代的易学学者才能够比较方便地研究汉代易学文献。

四、20 世纪的易学研究

20 世纪以来，由于西学东渐，随着新的研究方法的输入，以及考古发掘发现的大量文献资料，近现代易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古今中西各种观念不断碰撞，标新立异的各种论说甚嚣尘上，这些都是易学研究应用领域里的独特景观。而现在看来，现代易学研究的所谓成果在很多方面都值



得继续深入研究,其所做出的所谓结论也往往非常浮躁,需要再三勘验……

下面就 20 世纪非常流行的“以史观《易》”的易学流派及其研究方法谈一谈其中的问题。

“以史观《易》”有三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是从文献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周易》经文之中可能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挖掘,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第二种是借《周易》说史事或以史证《易》,基本上都是牵强附会;第三种是借《周易》的名目引述历史故事彰显义理教训,这实际上还是证明圣人教训万世不易的经学。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论文里进行考证,指出:大壮、旅两卦的爻辞记载了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是反映商代先祖王亥在有易氏部落被杀的情节;既济、未济两卦言及“高宗伐鬼方”,系殷高宗与边族的战争;泰、归妹两卦言帝乙归妹,是周文王娶帝乙之妹的历史故事;明夷卦的爻辞“箕子之明夷”是有商末箕子佯狂避祸的故事;晋卦卦辞是卫康叔善于畜牧的故事。顾先生以上这些考证虽然并不全然准确,有些证据和论证已经靠不住了,但是其论说基本上还是言之有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属于第一种研究方法。

《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作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这几句话无疑是在猜测,有可能《周易》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忧患意识,有可能其与周文王被商纣王幽拘之事有关。司马迁《史记》也明言“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古代历史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周易》卦爻辞之中确有关乎商周史实的文句。这些都是比较有价值的易学研究材料。

但是,由这些有关历史的易学材料催生出了一一种用历史解说《周易》的流派,它实际上是利用所谓的“历史事实”来附会《周易》,宋代的杨万里就是其主要开创者。入清以来,引史证《易》者也不乏其人,如王夫之、钱澄之、张尔岐、朱骏声等。20 世纪初继续这种“历史”探秘的还有沈竹初、章太炎。沈氏专论履、家人、睽三卦,认为其中包含有商周易代之际许多史事,如文王被幽、比干剖心、箕子佯狂、纣宠妲己等史实。章氏《制言》则明言《周易》实乃历史之结晶,是社会学材料,可看作一部社会进化史。直至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还有不少论著以此方式来阐说《周易》。

下面介绍几本现当代易学经典著作,便于初学者观其大要,选择有益于己者进一步阅读。



高亨：《周易杂论》

高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主要研究先秦文化史的著名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当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易学家，其易学著作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杂论》、《周易大传今注》等，都是易学经典著作。

《周易杂论》中有一篇《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其中高亨先生对春秋时期《周易》卦象解说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所以这里暂且将其列为高亨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刘大钧：《周易概论》

刘大钧先生是一位具有深厚国学素养的易学著名学者。《周易概论》1986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是刘教授的成名作，也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介绍并肯定象数易学的专著。该书开风气之先，影响堪称广泛，可以说，许多国人正是因为拜读了这部著作才走向了易学研究之路。

对《周易》学习者来说，《周易概论》涉及广泛，大致概括了易学研究的全貌，其中亦不乏创见，论述堪称精辟，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2008年10月，《周易概论》增补本面世，全面收录了刘大钧先生的相关著述文章。

李学勤：《周易溯源》

本书主要是由李学勤先生根据其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汇编而成，功力深厚，言简意赅。整体而言，作者运用近年来考古学的新发现对《周易》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使《周易》面貌在西周、春秋、战国以及汉代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之中展现出来。本书所使用的考古材料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指明了《周易》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考古。李先生对这些考古材料的分析也堪称精审。

《周易》是周代的占筮之书。这一点，从它在《周礼》为大卜所掌以及它在《左传》、《国语》诸书中的应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了李先生在其书中所列举出的考古材料，这一点就更加明确：《周易》在西周时期确已存在。

李学勤先生还着力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孔子与《易传》有很深关联，这一点不容忽视。

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

本书系杨庆中先生承担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世纪中国易学专题”的研究成果，全书由上下两编共十五章组成，其中上编七章集中讨论《周易》



古经相关问题,下编八章集中讨论《易传》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总结近现代《周易》经传的研究成果。

在上编七章中,主要涉及了卦爻象、卦爻辞、象辞关系、卦名与卦序、《易经》的成书年代、《易经》的性质、《易经》中的人道教训等七个问题。下编的八章,主要讨论了孔子与《易传》、《易传》成书的时代、《易传》成书的思想文化资源、《易传》解经的合理性、《易传》解经的思路、《易传》中的天人问题、《易传》中的“道”、《易传》与中国哲学等八个问题。

本书的主旨是对《周易》经传研究进行专题式的梳理,即看一看在经传研究领域存在着的的主要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哪些是传统易学讲对了,哪些是近现代易学讲对了,哪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本书对于读者全面了解现代易学研究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很有帮助。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作者将《周易》全文译成连贯、通畅的现代汉语,并加以详细的注释、解说,特别注重阐发卦爻辞之中的人伦道理。作者不仅把六十四卦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把每一卦之中的爻与爻辞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每一卦的末尾还专门对这一卦的人伦道理进行总结提炼,发挥引申。此书堪称是现代儒家义理派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在2001年9月,《周易译注》有了新版,补充了帛书的资料。

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对《周易》的历史、读易的方法、历代说易体例、外国易学研究状况等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了介绍,很适合初学者阅读。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

这是一部四册的易学哲学通史,工程堪称浩大。早在1981年,朱伯崑教授就在北京大学为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开设了易学哲学史课程,并于1989年最终把授课讲稿整理成了这部《易学哲学史》。

本书的主题是从儒家经学史的角度叙述古今学者对《周易》的不同诠释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包括的内容从春秋时期到清代乾嘉时期。其以冯友兰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叙述方式为蓝本,重点阐明中国易学思想中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内容。所以说,本书是从易经学史的传统学术视野阐述易学哲学的内容与特色,进而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领域,创立了一个新专题。



第四日

算卦古今谈

——《周易》与占筮

一、孔子与《周易》占筮

关于《周易》一书的形成,《汉书·艺文志》说是“人更三圣”,就是说除了伏羲、周文王之外,还有一位圣人参与了《周易》的创作,这就是孔子孔圣人。实际上,孔子对《周易》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易传》的部分内容之中。孔子晚年时,曾经非常投入地研究《周易》,由于阅读勤奋,以至于捆编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了好多次。“韦编三绝”这一成语就是出自孔子当年刻苦读易的故事,可见他的热衷程度。孔子学习勤奋,收获也很大。他说,如果早些年他就研读《周易》的话,他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少犯很多错误!帛书《易传》中《要》篇更加具体地记载了孔子研《易》、爱《易》的故事。其中有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是说孔子晚年家居和出行都在读易、研易,可谓是手不释卷。学生子赣问老师:“夫子方信其筮乎?”即,老师您相信周易的占筮吗?孔子大体肯定地回答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孔子算卦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孔子既然爱《易》,当然要研究《周易》的筮法,而且不断进行有关占筮的总结。孔老夫子和其弟子的《周易》的占筮经验,对后人学习和研究《周易》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示范。

贲卦：孔子尚质

孔子常常给自己占卦,测算自己的命运。有一次他占得贲卦,脸色不由得变得很不好看,一副不高兴的模样。弟子子张恭敬地走上前举手问道:“我



听人说占卜得贲卦，本是十分吉祥的。老师，您的脸上为啥显出不高兴的神情呢？”另一名弟子子贡也说：“贲卦好得很啊！因为在《周易》这一卦卦辞中说：‘小利有攸往’，”孔子仰天叹了一口气，然后严肃地回答道：“因为卦中有离象，离是火，而火的颜色有红有黄，不正，有些离谱。《周易》中说：山下有火叫贲卦，这不是颜色纯正的好卦象。从质地说，应该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色应该正。我现在贞问命运，占得贲卦，虽然不是凶，但是我一生所致力事业也就不会发扬光大。我听说：一件好漆器，涂了朱红色的油漆以后，就不必再绘花纹；已经是一块好白玉，也就不再加以雕刻；已是一块好珠宝，也就不需要再加任何装饰。总之，质地已经够好的东西，便不必追求好上加好，贪图无限，所以不要再接受修饰了。”这里孔子讲解了贲卦的卦象：离下艮上，离为火，艮为山。

孔子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是恢复周礼，让天下恢复太平。现在看来，他死后战国争雄，生灵涂炭，他这个心愿是绝对没有实现。但是孔子所整理的六经等历史文献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后学则举着他的旗号创立了儒学甚至儒教，也算是文采斐然，配上贲卦很合适。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孔子并不排斥占筮，因为他要“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数乎德”，所以在反复多次的占筮实践之后，他自称“百占而七十当”（帛书《要》），可谓已经“明数”了！然后才能够“观其德义”。后代的儒者们往往随意阐发“德义”。由孔子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完全脱离“数”的道德说教都没有什么基础，基本上都是随便说说。

火山旅：圣人而无位太遗憾

孔子自从接触《周易》后，常常自己起卦为自己占筮。一次，他偶然间用《周易》占卜自己的命运，占得一卦为“火山旅”。当时，他以此卦请教《周易》专家商瞿氏。商瞿氏看后道：“子有圣知而无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先生您虽然具有圣人的智慧，却没有圣知的权位。也就是说孔子没有实际的权威地位。旅卦的卦辞曰：“小亨。旅贞吉。”旅卦艮下离上，这是讲虽有太阳般的光明但却静止不动，象征孔子本人虽然集智慧于一身但却不能施行于天下。所以，孔子当时哭泣道：凤凰不向此地飞来，黄河没有龙图出现，这真是天命啊！我的命怎么这么惨啊！于是，孔子开始整理关于《周易》的文献。这些文献流传到后来就是



所谓的“十翼”。这十篇解说《周易》的文章在儒学经学化的过程中与《周易》本身逐渐融为一体，进而成为了易学的一部分而流传下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而孔子本人呢，亦被后世尊为圣人，以至于被冠以所谓的“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阿谀之词，最终化身为儒家的孔圣人。

折足鼎：不凶反吉

鲁国将要讨伐越国。孔子和其弟子们关心这场战争的胜负，于是用《周易》占筮其吉凶，结果筮得鼎卦。子贡占到鼎卦之后，断占的结果是“凶”。他的解释是：军队讨伐行进（出行）要用足，鼎卦又被称为“折足”卦，所以说是凶。孔子断占的结果却是“吉”，依据是：越国的人在水泽地居住，出行用舟船，不用足行进，所以断占“吉”。后来鲁国果然取得了胜利。

鼎卦巽下离上，卦辞是“元吉，亨”。一般占筮得到鼎卦即认为是吉利之象，就像孔子认为吉利。这里不知为何子贡占得鼎卦即认为凶。有人说古人凡是占得鼎卦，都有“折足”之象。这种说法是不懂装懂。在鼎卦六个爻辞之中，只有九四爻辞是“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刑）渥（屋），凶”。而且这里并没有说占筮时发生了爻变或变卦的情况。因此这一例子应该是六爻不变的卦例。

反观孔子如此断占鼎卦取意新颖，在子贡的分析之后反其道而行之，有新的创意：讨伐越国行军不需要用足，即使是折足也无咎，卦象有暗示攻战越国顺利的意思，所以孔子以为是“吉”。以上剖断可谓老谋深算，看来孔子的“韦编三绝”不是白练的。

鼎：“无足”而来

《诚斋杂记》上记载：孔子招使在外地做生意的弟子子贡来见，等了好久也没有到。孔子就叫身边的弟子们卜筮，看结果如何，结果占筮结果是鼎卦。弟子们纷纷发表意见：“鼎折足。无足不来，子贡来不了了！”只有颜回一个人在旁边掩口而笑。孔子问：“颜回，您为什么笑而不言？”颜回恭敬地回答道：“卦中无足的原因是，子贡是乘船来，所以不用足。”后来子贡果然乘船来到。

这个例子与上面那个孔子算卦遇鼎的例子有些类似。颜回得到孔子真传，这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占筮结果是鼎卦并不一定就要用“折足”或“无足”来断占。从这一点来看，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信度都不高。



二、占筮的心理学解释

看了上文叙及的几个算卦的“案例”，一定有很多人会问：算卦不是封建迷信吗？《周易》它又不是科学，怎么能算得准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关键是要弄清“封建迷信”这个词。

首先要明确一点，迷信就是迷信，它与“封建”两个字没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不仅封建社会有迷信，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迷信。只要人们的认识有误区，有盲点，那很多人的头脑里就会有“迷信”的存在。君不见，在所谓“科学昌明”的今天，对西方“魔法”大肆渲染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一样可以大行其道——成年读者一样读得津津有味，买了一本再买下一本，虽然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魔法”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是虚假的，什么“魔法学校”、“魔法学徒”那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封建迷信”里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

其次，迷信是盲目相信，不问究竟的跟从，是愚昧的近义词。反过来说，盲目的不相信、不问究竟的反对，也是迷信。所以说，只有有研究，才有发言权——对算卦的方法和原理没有深入研究的人，对算卦这件事儿原则上没有发言权。对“在当今的中国，有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给出的文化上的答案说得好——“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人过于相信科学，以为自己掌握的那一点点知识就是全部的真理、真理的全部，不仅容不得对已有知识半点怀疑，还对其他非科学的文化“一棒子打死”——这种态度，就是反科学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人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周易》是科学！”

注意，“《周易》是科学”这句话可不是笔者说的，是心理学家荣格说的——他可是对《周易》算卦的方法和原理有深入研究的人。

那么，难免又有人会问：谁是荣格？

荣格：考察“潜意识”的一代心理学大师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1875年出生于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一个名叫凯斯维尔的乡村里。荣格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孤独的。他有两个哥哥，但都在他出生之前夭折了；他的父母



不和睦,经常吵架,母亲的性情多变,反复无常。所以,荣格常常是一个人玩,他常常一个人沉湎在梦、幻觉和离奇的想象中。他还喜欢独自面对美丽的湖光山色,享受与大自然默契的愉悦,领悟大自然给他的神秘启示……

从学校毕业后,荣格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任教,并担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疗所的高级医生。1907年,荣格和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此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他们的“蜜月期”。弗洛伊德器重荣格,称他为“我亲爱的儿子”。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认为“当我所建立的王国被孤立的时候,唯有荣格一个人应该继承他的全部事业”。1911年,弗洛伊德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推荐荣格担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而荣格也非常尊敬弗洛伊德。但是,弗洛伊德把“性意识”放在了人的心理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性需要和性冲动解释人的绝大多数无意识行为——荣格对此绝对不能接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最终,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两位心理学的巨擘还是分道扬镳了。

荣格认为,人的人格应分成:自我、个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三部分。三者互相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自我是人格的中心,是指人的现实存在,是人的思维、情感、认知和感知觉的综合。个体潜意识是指个体发育过程中压抑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在潜意识中,这些压抑的体验以及相关的观念围绕着“情结”——所谓情结是指伴有强烈情绪和行为的观念簇——而情结中心则是原型,因此,原型属于潜意识范围。按照荣格的观点,一个民族或一种部落人群会具有相同的原型思想,而每人可以具有不同的情结,如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而具有相同情结的人也可以因为个体差异而外观行为迥异。集体潜意识是指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行为等心理要素。荣格发现:一些精神病人的幻觉、妄想具有普遍性,与一些神话故事、寓言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这种现象与病人的文化程度并无相关。因此荣格推论:人在潜意识水平具有相同的部分,称之为“集体潜意识”,与个人的潜意识不同,集体潜意识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因为它的内容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总要外向显示,当它们在意识中不能表现时,就会在梦中、幻想中以象征的形式出现。虽然不是每人都具备本民族所有的原型,或所具备的原型都对该个体产生同等的效应,但某些原型在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荣格提出,人并非自己的主宰,而主要受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的控制,



这些力量来源于自己的潜意识部分，而我们的意识部分仅仅是潜意识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荣格还认为，潜意识并非只是生长发育阶段压抑作用的总和，潜意识具有负面效应，同时也具有积极作用，它赋予人创造力，能帮助人确立生活的意义，并且指导人追求个人独立，正是人的这种独立本能，使我们持续地走向完善自我，寻找特定的生活意义。

潜意识也是意识转换、变形的场所，人不可能直接意识到潜意识，因此，常通过象征作用，使人具有能力去表达那些无法意识但确实存在的潜意识。潜意识还是我们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因为，原型具有能量，原型的显现本身就是力量的释放。因此，在心理治疗中如能很好地了解来客的原型思想，就能很好地了解此人。

《周易》占筮：通往潜意识的一条最佳途径

通过常年对《周易》的研究，荣格知道，在一定的心理状态下，通过占筮得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论这是常有的事，他把这种情况与他多年的个人经历和临床经验结合起来——潜意识中浮现出的心理事件有时会以意味深长的方式与外部事件相巧合——二者正好吻合。所以，荣格认为正规的占筮活动可以将人的潜意识以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显示出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奇妙的对应性和平行性。简单来讲，占筮时，通过潜意识的推动，占筮人的手不再是“自我”之手，而是“潜意识”之手，从而在一个更加深入的层面上把世界的真相展示出来。也就是说，是“潜意识”把人与世界紧紧勾连在一起，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潜意识”的能力，就可以及时和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自己也包括在其中的一切变化。而用《周易》占筮，就是理解潜意识的第二条最佳途径。

对于用《周易》占筮，荣格有过这样的感叹：“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他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

他认为，《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而正是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走向和旨趣，对认识层面的选择和认识方法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会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荣格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科



学,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

他说:“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潜意识”的作用规律

荣格一生可以说是与东方思想不断对话的一生。荣格曾犀利批评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是过分强调理性因而束缚人们思想的唯理智主义。可以说,荣格最有原创性的一些观念,都与东方思想有关。荣格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观点根本上源自东方思想的启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源于《易经》的“同时性原理”。荣格对他晚年才公然提倡的这项原理非常重视,因为如果同时性原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人类建构知识的基本设定——因果律,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荣格认为同时性原理除了可以从心理分析的案例中获得佐证外,主要是《易经》提供了最为完美的理论基础及程序运作。

在《周易》的启发下,荣格认为潜意识有一种作用规律——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联系,荣格称之为“同时性原理”,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在宇宙中普遍适用的规律。

荣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滚滚奔流过程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例如,万物在连绵不断的时间之流中并排地进行着,其中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它们可能是思想、符号、心理状态、某个数字、某种物品……等等,尽管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合和等价的意义。由于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时间演进系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发生因果性的联系,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荣格将这类现象称作“同步”或“相对的同时性”,认为这种现象受制于同时性原理。

为了说明“同时性”的确切含义,荣格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那是他在为一位年轻的女患者治疗时发生的真实事情。荣格记述道:“她尽管做事想叩两端以执中,诸事求好,结果总是做不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她对事懂得太多了。她受的教育相当好,因此提供了她良好的武器,以完成此种目的——意即一种高度明亮洁净的笛卡儿式之理性主义,对于实在具有永无差错的‘几何学’之概



念。我曾数度尝试以更合理的态度，软化她的理性主义，结果证明无效之后，我不得不盼望某些不可预期而且非理性的事情会突然出现，如此方可粉碎她用以封闭自己的理智之蒸馏作用。某天，我恰好坐在她对面，背依窗户，聆听她不绝的陈述。前晚，她做了一场印象极为深刻的梦，梦中有人赠她一只金色的甲虫——一件很贵重的珠宝。当她正对我诉说其梦时，我听到背后有轻拍窗户的声音，我转过头来，发现窗外有只相当大的昆虫正在飞撞窗棂，试图进入这黝黑的房间。此事颇为怪异，我立即打开窗户，在昆虫飞进之际，从空中抓住了它，是种甲虫，或说是种普通的玫瑰金龟子，它那种黄绿的颜色与金色甲虫极为相肖，我将之交给我的患者，并附数语：‘这就是你的甲虫。’此一经验洞穿了她的理性主义，打碎了她理智抗拒的坚冰，如今治疗可持续下去，且成效显著。”

荣格将女患者梦中的珠宝赠品——金色甲虫与谈话过程偶然出现的活的“玫瑰金龟子”，视为有“同时性”关系的两个事物，并认为这类有意义的巧合事例数不胜数。它们各自演进而平行，在不同的场境以不同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出现，即意味深长地“巧合”。

用《周易》原理可以解释得更明白

《周易》里面说得明白，宇宙是阴阳，人体也是阴阳，这个阴阳也就是那个阴阳。说穿了，人的潜意识应该就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运转而已。只不过，人的头脑或者说是人的“自我意识”在作怪，我们习惯于用逻辑思维，靠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来考虑事情、做事情，这使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体会不到“潜意识”——体会不到自己身上阴阳二气的这种“自然”运转，这样作出的决定也就往往与事情的真相背道而驰，就要犯很多错误了。

在梦里，由于“自我意识”的安睡，“潜意识”就可以出来进行表演。当然，这种表演仅仅依靠正常思维也很难理解——所以中国古代除了有用蓍草进行占筮以外，还有用梦来占卦的——叫梦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市井流传的《周公解梦》，就是这方面的一本书。

至于“同时性原理”，这也简单。阴阳二气的运转自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变化总是要以不同方式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展示出来，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可以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易经》咸卦里所说的“感应”，《易传》里所说的“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同气相求，同类



相动”等，也就是这个意思。

用荣格的话来说，同时性原理说明“事件在时空中的契合，并不只是几率而已，它蕴含更多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宏观的诸事件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观察者主观心理状态之间，有一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关系”。那么，观察者又如何通过“随机”起卦，使所起卦爻的含义与自己主观所希望了解的客观情境相契合呢？荣格说：“《易经》认为要使同时性原理有效的唯一法门，乃在于观察者要认定卦爻辞确实可以呈现他心灵的状态，因此，当他投掷硬币或者区分蓍草时，要想定它一定会存在于某一现成的情境当中”。这就是说，观察者只有通过坚定的诚信心念来实现卦与事的契合，此乃“唯一法门”。还是那句老话——心诚则灵。

原来在算卦时拨弄蓍草、骰子、铜钱，进而把命运之门推开一条缝隙的，不是你、我的手，也不是上帝的手，而是看不见的潜意识之手——阴阳二气的“自然”运转！



第五日

五千年文明的菁华

——《周易》与文学、历史

一、《周易》经传与古今人名

《周易》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第一经典，也一直是中国人取名字的重要参考。比如三国的蜀国大将赵云，他又叫赵子龙。我们知道这“云”是他的“名”，“子龙”是他的“字”。那么赵云为什么又叫赵子龙呢？这“云”和“子龙”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原来在《周易》的《系辞》里有“云从龙，风从虎”，这就是赵云为什么又叫赵子龙的根据。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龙云——民国时期的“云南王”，李云龙——小说《亮剑》里的主人公，这两个名字的妙处在哪里。

那么，古往今来的这么多知名人物，名字取自于《周易》的到底有哪些呢？下面列举出了几十位大人物，有详有略，他们的名字都与《周易》的文字有某种形式上的关联。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在这几十位人物中有些人的名字，特别是单名，是否一定是取自于《周易》呢？当然有些人是在取名字的时候直接参考了《周易》文本，还有些人的名字仅仅是文字雷同——误打误撞，纯属巧合。对我们后来人而言，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明确区别。那怎么办呢？好在我们也“不求甚解”，只要是其名字在《周易》中的意义与其生命历程中的某些特征、某些经历相吻合，甚至只要有一些相关，就足以让我们或者参考，或者借鉴，或者欣赏了。



学者李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学者,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1年他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1923年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上激烈争论,随后离开党组织,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有一个号,叫“鹤鸣”,倒是与他的学者身份、学者脾气很相配。“鹤鸣”二字,源于《易经》第六十一卦中孚卦: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句话意思是:树荫下一只白鹤在鸣叫,他的伙伴们也应声和鸣;我有壶美酒,愿与好朋友你一同分享。

翩翩白鹤本身就是一种气质高雅的动物,又称仙鹤,它的鸣叫,更是清越高亢,直入九霄;对于以白鹤自诩的人,最好是以朋友相处,既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可以获得很多善意的规劝和指正。

对于毛泽东,李达就是这样的高雅正直的朋友。

1958年,正值“大跃进”兴起之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成为湖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口号,李达对此深为不满。在武昌见到毛泽东时,他就指出这个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李达还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看到毛泽东毫不让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达很尖锐地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后来说,鹤鸣兄的话很逆耳!

“鹤鸣”,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操,体现得多么清楚!

正气凛然马永贞

马永贞,清末山东济南历城马家庄人。现在关于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已经拍了很多,大都把他描绘成一个在上海滩掘得第一桶金的江湖混混、流氓头目。其实并不是这样,马永贞自幼习武不假,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恃强凌弱,反而一直



是嫉恶如仇，配得上《易经》中的“永贞”二字——永远坚持正道，绝不同流合污。“永贞”二字，在《周易》里出现了三次：坤卦、贲卦、萃卦，都是永远固守正道的意思。

在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马永贞因为贩运马匹来到上海，刚好碰到四月初八庙会。马永贞在庙会游玩，碰见一伙流氓横行霸道，就上去“修理”了他们一顿。正好被当时上海租界的流氓大头子白癞痢看到了，他急忙拉马永贞下水，要收罗他做小头目。哪知道山东汉子果然正派，马永贞根本就不屑与流氓为伍：你做你的洋人狗好了，想把我也变成狗吗？

凭着一身武艺，马永贞在上海开设武馆，处处以“白道”行事。收买不成，反成对手，白癞痢恼羞成怒，纠集了斧头党，屡次加害。没想到马永贞的确武艺高强，几十个人再加几十把利斧照样被他赤手空拳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白癞痢设下毒计，趁马永贞到茶馆与朋友喝茶的机会，让埋伏好的斧头党先用石灰抛洒马永贞的面部，使得马永贞双目失明，被利斧劈死。

当然，白癞痢等人也难逃公道。后来，马永贞的妹妹来上海寻仇，在黄浦江边十六铺附近，把白癞痢一伙全给剁了。

革命诗人贺敬之

贺敬之(1924—)，很多人都会陌生，他是新歌剧《白毛女》的作者。当年有多少农家子弟是含着热泪看完《白毛女》，怀着对地主恶霸的仇恨踏上解放全中国的战场的。传唱了多少年的《南泥湾》，歌词也是他写就的，热情澎湃的大生产运动，因为这首歌而时常被人想起。

“敬之”二字，出自于《易经》需卦，是恭敬对待的意思。贺敬之对于人民的事业，始终恭敬对待，正如他在诗中写的：“羊羔羔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因而，他的作品是人民的心声，他的作品激情迸射，使得千万人激情燃烧。

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做到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他总是以敏锐的目光把握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回延安》表现了延安的巨大变化，赞颂了延安的历史功绩，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意义；《雷锋之歌》挖掘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十月颂歌》则是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



世纪诗魂臧克家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著名诗人、作家,因病于2004年2月5日晚8时3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噩耗传来,很多人默默吟诵他的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克家”,取自《易经》蒙卦,意思是兴家立业。臧老一生以诗为家,以诗为业,成就辉煌,为世人瞩目。自1937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后,臧老陆续出版有《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等十多部著作。2000年1月,他荣获首届“中国诗人奖——终生成就奖”,2003年获得由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老诗魂不死。

大石头蒋介石

蒋介石,字中正,他的“名”和“字”都取自《易经》的第十六卦豫卦: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中正是中正平和的意思,“介石”是“介于石”的简化。他曾经解释自己名字的“介石”二字:介石,就是搬不动的大石头,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要我做事情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蒋介石有志气做中国的亚瑟王,意图统一中国——从孙中山的卫兵,到黄埔军校校长,再到北伐军总司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接近于完成目标。就是在败退台湾之后,他仍要反攻大陆,坚持中华民国,决不建立“台湾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就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来看,他果然是一块“搬不动的大石头”。

下面列举了古今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名字都与《周易》的文字有关联。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排列如下:

列子,原名列御寇,“御寇”二字,只有在《易经》上才能够见到,所谓“不利为寇,利御寇”,“御寇”是抵御强盗、抵抗袭击的意思。列子是战国早期道家神仙人物之一,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有可能是在他出生的时候,父母为他算了



一卦，遇到了“不利为寇，利御寇”这句断语，于是小列就有了列御寇这个名字……

据说列子修道九年之后，能够“御风而行”——就是乘坐了一辆幻影无形“劳斯莱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后人对他的“翩翩风采”非常仰慕，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经下诏封他为“冲虚真人”——打这以后，《列子》这本书也就改名叫《冲虚真经》了。

《列子》这本书，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读过，但是毛泽东是读过的——他对《列子》这本书里的“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做了专门阐释，进行了义理提炼，就成了“愚公移山精神”，从而为亿万人民所熟知。

申不害(约前 385—前 337)，战国著名思想家，提出“术”的政治法则，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号申子。他名字里“不害”二字，似乎出自《易经》坤卦的六四象辞“慎不害也”，意思是“谨慎小心就不会招惹祸患”。

张升，字彦真，东汉文士，名字取自《易经》升卦。

吕蒙(178—220)，三国时代吴国将领，他的名字似乎取自《易经》蒙卦。最初他只知道打打杀杀，后来刻苦读书，进步神速，鲁肃称赞他：几年不见学识一下子就渊博了，不再是往日吴国城里的快刀小阿哥了——就这一点来看，吕蒙名字里的“蒙”字与《易经》蒙卦“启蒙”的意思还是很贴近的。吕蒙还大搞军事阴谋，白衣渡江袭击荆州，打垮了风头正劲、威震华夏的关大老爷，还斩下了关大老爷沉甸甸的一颗金头。

傅巽，三国时代文人，曾经说服刘琮投降曹操，因此被封为关内侯。他的名字似乎取自《易经》巽卦。“巽”指风，傅巽吹风吹得厉害，一阵风把一方之主说投降了。

支谦，三国时代佛经翻译大师，因为聪明非凡，当时人称“智囊”，吴主孙权特别拜他为博士——相当于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也似乎取自《易经》谦卦。



王复，南朝人，名字取自《易经》复卦，估计与梁武帝同一时期。身为士大夫，王复不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更加过分的是连马都没有见过——看到马嘶鸣跳跃，他吓得脸色青白，浑身瑟瑟发抖：“这哪里是马，分明是老虎嘛！”留下千古笑柄。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的大儿子，典型的天才儿童，五岁就通读《五经》，而且都可以背诵；长大后更是了不得，读书时几行字一起看，而且看过就能背诵。他还是个文学专家，亲自编撰《文选》三十卷，成为文学的经典教科书。可惜，他英才早逝，后代人都尊称他为昭明太子。“德施”二字，取自《易经》第一卦乾卦的九二象辞，是“施舍恩德”的意思。同样的，历史上还有一个西晋大官兼文学家，也叫孙德施。

韦鼎(514—592)，梁、陈、隋三朝元老，著名大学者，因为相面奇准而特别有名。他的名字似乎取自《易经》鼎卦。

李元吉(603—626)，唐高祖李渊的第四个儿子，李世民的弟弟。在《易经》里，“元吉”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差不多是最好的两个字了，可也抵挡不住李世民真命天子洪福齐天，在玄武门硬碰硬的较量中，“元吉”再加上一个“建成”，都被“世民”克掉了。

员余庆(622—683)，唐大臣，文学家。“余庆”二字，出自《易经·文言·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必然给后代留下许多祥庆，而积累恶行的家族，必然给子孙留下许多祸殃。员大人做得大官，写得好文章，估计是借了他祖先积善行德的光了。

李豫，大名唐代宗。《易经》豫卦里的“豫”字是安乐的意思。作为李氏王朝的败家子，李豫吃喝玩乐、穷奢极欲，好像深得“豫”字的真意。

韦处厚(773—828)，字德载，唐代名臣，诗人。“德载”二字，似乎是断章取义地取自《易经》中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字面的大致意思是：以高尚的品德宽



容事物。

窦常(749—825),字中行,唐大臣,诗人。“中行”二字,出自《易经》第十一卦泰卦的九二爻辞,是“中道行事”的意思,做大官的,都需要遵循“中道行事”这个基本的原则。

钱俶,字文德,五代时候的吴越国君。“文德”二字,出自《易经》第九卦小畜卦的象辞,“文德”是文章和道德的意思,用在名字上,有“文章和道德二者具备”的意蕴。

赵恒(968—1022),即宋真宗,他的名字似乎与《易经》恒卦有关。作为“主战派”寇准的上级,赵恒可是有恒心贯彻和平路线,他要与辽国和平相处,绝不打仗,情愿割地赔款每年倒贴,还要亲亲热热地管辽国的萧太后叫“婶婶好”。真是太肉麻了。

程颐(1033—1107),人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被合称为“二程”,他一般被称为“小程”,河南洛阳人,北宋儒家学者,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颐卦是《易经》第二十七卦,“颐”是颐养的意思。

程颐应该是很善于颐养的了。在理论上,他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把“养”与“学”并列起来,提倡要静坐,甚至要求他们的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把闭目静坐当成一种克己自省、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在实践中,他以身作则,自己经常长时间静坐。有一次,学生杨时和游酢来登门拜见,准备问两个学术问题,不巧碰到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他们就在老师身旁等候。等啊等啊,终于等到程颐睁开眼睛。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程颐说:“您二位是在等我吗?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吧!”两个人告辞出门,没想到,外面的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由此可见,程先生“颐养”的功夫深厚,刚才至少静坐了三四个小时。

刘豫(1073—1146),字彦游,估计他文章写得很好,居然考中了进士,外派做官。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刘豫竟然弃职潜逃;后来不知怎么又弄了个济南知府,杀掉抗金将领关胜(似是《水浒传》里大刀关胜的原型)后投降金军。因



为“忠心可嘉”，刘豫被金朝册封为“齐帝”，他又忠心耿耿地做了七年傀儡皇帝。看来在吃喝玩乐、贪图享受方面，他也算得上是深得《易经》里“豫”字的真意了。

黄裳，宋朝时福建延平人，大学者。他对道家经典很有研究，擅长养生，活了八十七岁。金庸小说里讲他读书读成了一个武林高手，还写了《九阴真经》上、下卷，这就是金庸先生的想象了。不过，“黄裳”二字，的确是取自于《易经》第二卦坤卦的六五爻辞，“黄裳，元吉”，就是“黄色衣衫，吉祥如意”的意思。

王重阳，原名王中孚，道教宗师，全真派创始人。“中孚”二字，是《易经》第六十一卦中孚卦的卦名，意思是诚信。王重阳以极端诚信的态度对待人生，不苟且于俗事，不虚度光阴，求真务实，寻求人生真谛，终于成为一代宗师。

他在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12月22日生于咸阳(今属陕西)大魏村的一个富裕人家。少年时，王重阳勤奋攻读儒家经典，后又弃文习武，考取了刘豫所建的伪“大齐”国武举，名中甲科，号称“天下第一”。很快，王重阳弃官回乡，散尽家财，隐全真居到终南县南时村，他在村里挖了一个深四米的洞穴，称“活死人墓”，在洞中坐禅清修。在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他提出了儒道释三教同源论，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派别——全真道。他有七位高徒，号称“北七真”，即后来人常说的全真七子，他们是：丹阳真人马钰、长真真人谭处端、长生真人刘处玄、长春真人丘处机、玉阳真人王处一、广宁真人郝大通、清静真人孙不二。

徐达(1332—1385)，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因为他字天德，所以又叫徐天德。“天德”二字，取自《易经》第一卦乾卦的用九象辞“天德不可为首也”，因为乾卦是指代“天”，所以这句话通俗来讲意思就是：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是不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徐达不居功自傲，与“天德”二字很是相配。

金庸大作《射雕英雄传》里丘处机千里追杀的南宋官员也叫段天德，实在是糟蹋了“天德”这个名字。

朱升(1299—1370)，字允升，人称枫林先生，徽州休宁(今属安徽)回溪台子上村人，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政治家。升卦是《易经》第四十六卦，“升”是前进、



上升的意思；“允升”取自升卦初六爻辞，是应当上升、适合上升的意思。朱升一生做事，该进则进，官至当朝一品；他学识渊博，见解深刻，帮助朱元璋建功立业，使大明基业蒸蒸日上，如旭日之升。

朱升五十九岁那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朱元璋一路攻城掠地，打到他的家乡徽州。为了避免百姓受苦，朱升冒着乱箭穿身的危险，一个人站在徽州府城下，说服了守城将领福童开城归降。朱元璋又攻婺源，却久战不下。听说朱升大名，就来拜访朱升，朱升留下锦囊妙计恭候，自己却避而不见。朱元璋依照朱升的计策，果然一举获胜，心里更是钦佩这位枫林先生。后来，朱元璋得知朱升隐居在石门这个地方，就轻车简从，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当面请求朱升出山辅佐他打天下。朱升再想躲避可就来不及了，只好婉言拒绝。朱元璋无奈，只好退一步，恳求朱升给他出一个安邦定国的大计。朱升不慌不忙，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开朗，兴建霸业的良策终于找到了！有了朱升的良策，朱元璋养精蓄锐，不断壮大实力，后来终于推翻了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朱升也被征召进京，先后被授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翰林学士等官职。

毛泽东主席对朱升的政治、军事才能也非常推崇。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里，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以说是吸取了朱升“九字策”的精髓。

名字取自于《易经》升卦的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具有火箭发动机般的上升推动力，而且马力更大——毕升。

毕升（？—1051），出生在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就是现在的湖北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当时他在印刷铺当工人，专门从事手工印刷。在印刷劳动中，他深知雕版印刷这种方法的笨拙和艰难——就是把一本书的每一页的所有字都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注意，字要反着雕！只要刻错一个字，一大块木板子就废了！毕升总结经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现在的凸版铅印，虽然技术设备已经日新月异了，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来源于当年毕升的一个灵感，一个创意。印刷术，中国制造，毕升发明！“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果然厉害！

于谦（1398—1457），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明史》称他“英迈过



人,历事三朝”。他的名字似乎取自《易经》谦卦。

詹天佑(1861—1919),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幼居南海,12岁留学美国,学土木工程及铁路专科,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归国,任教授。1905—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造“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天佑”二字,出自《易经》第十四卦大有卦的上九爻辞,意思是:上天保佑。有上天时刻保佑,人家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就不足为奇了。

熊秉乾(1885—1969),字载坤,湖北武昌人。他名字中的“秉乾”、“载坤”,就是运转乾坤的意思。在辛亥革命中,他确实是一位扭转乾坤的人物。

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由于起义消息泄漏,武昌全城戒严,在汉口和武昌的起义领导机构都被破坏,起义领导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迫逃亡。10月10日,湖广总督下令封锁新军营门,禁止所有人通行。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身为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名士兵,熊秉乾毅然率众起义,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又立即组织敢死队攻克总督署,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立下了首功。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福州人。严复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英国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很有研究。回国后,他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天理,中国人如果不自强就一定会被淘汰。这种“生物-人类进化理论”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巨大。1912年,严复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复卦是《易经》第二十四卦,“复”是返回正道的意思,晚年的严复一心趋向于复归中国传统文化。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912年他又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孔家店”被打倒、敲碎、搞臭,严复用心良苦却成空。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此后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人物。1937 年 12 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错误。王明在 1956 年后一直滞留苏联，直到 1974 年去世。“王明”二字，出自《易经》第四十八卦井卦的九三爻词：“王明，并受其福”，意思是：君王圣明，是民众的福气。看来王明这个人，还配不上“王明”二字。

金大中，韩国前总统，1925 年 12 月 3 日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2000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大中”二字，出自《易经》第十四卦大有卦的彖辞，简单讲就是“高尚尊贵而谦虚平易”的意思，有这么好的品质，难怪人家做总统呢。

莫文蔚，娱乐界的一颗星，“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一首《盛夏的果实》确实是好听，只是太缠绵了，听了让人心里酸溜溜的，感觉很受伤。“文蔚”二字，出自《易经》第四十九卦革卦的上六象辞，即“文彩蔚然”，简单讲也就是花纹绚丽多彩的意思。做娱乐这个行当，当然要多姿多彩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物，虽然也用《易经》文字作名字，但是他们在历史上不是那么有名，再有一些人，他们或者是用《易经》中除了六十四卦卦名以外的单字作为名字，或者是化用《易经》文字作为名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上罗列的这些名字的《易经》取意都可以作为我们给儿孙取名的参考。试想，哪个父母不想给儿女们取一个吉祥、文雅的名字呢？特别是读过古书的文化人，对名字也最讲究，最好是既琅琅上口，又古色古香。

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人物的名字与《易经》有关，比如：

黄文炳，《水浒传》里的江州通判，第一个发现宋江要造反的人，但掌握的证据太单薄——就是宋江在浔阳楼上写的“潜伏爪牙忍受”。这种作风，一是开“文字狱”之先河，二是树“拿人血染红顶子”之范例，三是走了“官逼民反”的老路。“文炳”二字，出自《易经》第四十九卦革卦的九五象辞，是“文彩炳焕”的意思，用在黄文炳身上似乎不合适。



方鸿渐，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的主人公，“海归”、“海待”老前辈。为了对父亲的大把钞票有个交代，为了回国后好找饭碗，他弄了一个子须乌有的克莱顿大学的文凭回来，在国内的大学里着实混了一段时间。“鸿渐”二字，出自《易经》第五十三卦渐卦，简单讲就是大雁飞来飞去的意思，引申之后有人才聚集的意思。可叹的是，在几十年后的中国，现代“方鸿渐”们仍然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有庆，余华小说《活着》的主人公福根唯一的儿子，死于一场飞来横祸——汽车撞墙，恰好他在墙边躲阴凉睡午觉。“有庆”二字，见于《易经》第五十五卦丰卦，简单讲就是有福气的意思。福根家里应该是没有什么福气的，一连出了三代败家子儿不算，有庆小小年纪也要死掉，按照只记男丁的旧风俗，他们家可以说是绝后了——太惨，太惨！

就地名来讲，似仅有北京密云县的名称大有来头——这“密云”二字，可是出自《易经》的。另外，河北承德的“承德”二字，广东顺德的“顺德”二字，都可以在《易传》的文字中找到根源；在历史上，河北省又叫做顺天府，这“顺天”二字，也出自《易传》。

二、《诗经》、《易经》同一首歌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作为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周易》自然可以与“人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先人的情感、经历、理想、困惑……都在里面。直到现在，其内涵还在与现代人的共鸣中不断地扩展和充实；其词汇精美，意象灵动，连钱钟书先生都夸奖《周易》文辞精美，“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

同一首歌——《诗经》与《易经》

先来朗诵一首古老的诗歌吧！注意，它不是取自《诗经》，而是《周易》第三十六卦明夷卦的初九爻辞：

明夷于飞，
垂其翼。
君子于行，
三日不食。

——《周易》第三十六卦明夷卦



意思是：受伤的鸟继续飞翔，却双翅难举飞不高；君子在远行的路上，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潜台词是：心中的苦闷，谁人能知？这段诗歌描写飞鸟力倦神疲，掩翅低垂，以兴起“君子”旅途疲惫，饥肠辘辘，抒发一种悲郁、伤感的情怀，可视为君子避难歌。

而《诗经》中以“于飞”一词起首的诗篇有很多，如《邶风·雄雉》，就是一首妻子怀念远行的丈夫的诗，下面是它的前两阙：

雄雉于飞，
泄泄其羽。
我之怀矣，
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
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
实劳我心。

意思是：雄雉起飞向远方，拍拍翅膀尽舒畅。心中怀念我夫君，自找离愁空忧伤！雄雉起飞向远方，忽高忽低咯咯唱，一心牵挂我夫君，思念的心儿真辛苦！

再比如，《周易》第六十一卦中孚的九二爻辞：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

意思是：翩翩仙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伙伴们应声和鸣；我有一杯美酒，愿与朋友你一起畅饮。这段诗歌描写鸟类互相应和，相与为欢，以兴起主人公“我”邀请对方同席共宴的友好情意，表达一种和谐、友好的情感，应该视为朋友宴饮诗。据说，孔子读罢此诗，曾经引申发挥，讲出了一番大道理：君子要以诚感人，而行为是“君子之枢机”，是“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而一代风流才子郭沫若则试图把它解释成恋歌：“‘吾与尔’假如我们更大胆地解释成一男一女，那会怎样呢？……那会是怎样一首有趣的恋歌呢？”

而在《诗经·邶风·燕燕》里有与之非常接近的文句，是以鸠居鹊巢起兴开



篇，来祝福出嫁的新娘子：

维鹊有巢，
维鸠居之。
之子于归，
两御之。

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喜鹊树上把窝搭，八哥来住它的家。这位姑娘要出嫁，百辆车子来接她——看来结婚的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古已有之。

上面提及的《诗经》和《周易》的诗句，从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上看，可说两者并无二致，皆以诗歌特有的比兴手法描绘形象，创造意境。我们知道，《诗经》本称《诗》，共辑录两千五六百年前的诗歌 305 篇，故又称“诗三百”，其大致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春秋中后期。而《周易》的成书时间是在西周前期。《诗经》的成书时间晚，所以里面有与《周易》相似的诗句，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心雕龙》：文学要向《周易》学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书籍，它的作者是南朝的刘勰。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是以“文心”而“雕龙”，所以就给自己的大作取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书中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建立了系统的文学理论。该书除了大量引用《周易》文句来说明文学创作的原则方法外，还直接把《周易》当作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尺。

(1) “道”是文学的本源。

刘勰大笔一挥，文气直接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相连接——“先秦诸子百家他们都是讲‘道’的，《周易》也是讲‘道’的，我们的文学当然也要讲‘道’”。

注意，刘勰所说的“道”含意很丰富，既有老庄的“自然之道”、“天地运行之道”、《周易》的易道，也有孔孟的“仁义之道”、“中庸之道”，好像对佛学的“空无之道”也没有什么排斥。

(2) 以《周易》之数之美。

《文心雕龙》全书一共五十篇，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周易》“大衍之数”来安排全书结构：起于第一篇《原道》，终于第五十篇《序志》，这正是“大衍之数，其数五十，其用四十九”。

(3) 频繁引用《周易》阐发道理。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半数以上，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引证《周易》原理，把它们运用到关于具体的文章写作的讨论过程中。比如《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祝盟篇》、《论说篇》、《诏策篇》、《奏启篇》、《议对篇》等八篇中有与《周易》经传有关的例证；《神思篇》、《体性篇》、《风骨篇》、《通变篇》、《定势篇》、《情采篇》、《镕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丽辞篇》、《比兴篇》、《夸饰篇》、《事类篇》、《练字篇》、《隐秀篇》、《附会篇》、《总术篇》、《时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有与《周易》有关的例证。以上例证一共是四十七则。

(4)《文心雕龙》经常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

比如《周易》中贲卦，象征文饰；其上九爻辞说：“白贲，无咎。”意思是，一切装饰，都是用来修饰本质的；因此，朴实无华返朴归真，也是很美丽的。

刘勰据此阐释，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不能过分地追求形式美，以至妨碍思想感情的表达；文章运用辞藻，是为了表达思想，但辞藻越是浮艳诡谲，中心思想就越容易被掩盖。

刘勰还用《周易》乾卦“刚健”的思想来解释文学上的“风骨”，大力推崇“刚健”之美，以矫正时弊；用《周易》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变化发展，主张不断创新。此外，刘勰还把许多《周易》的语词融化，活用到《文心雕龙》的词句里。

总之一句话，要想文章好，先把《周易》学！

苏东坡的易学与文学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都知道一代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他的文采可谓是激越飞扬：他的散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开宋词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名篇传诵甚广。前几年，以它的词作曲的通俗歌曲大大流行了一把，在大街小巷、卡拉 OK，经常听到有人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想到这些词句是九百年前的人写的，不禁让人再次感叹文学穿透时空打动人心的魅力。难怪有人要把苏东坡和李白并列，有人为他树碑立传，还有人称他为“万古风流苏东坡”——比“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一下子多风流了九千年！

那么，苏东坡的文章这么好，他有什么秘诀吗？按照刘勰《文心雕龙》的思路，可以认为，如果苏东坡的文章了不得，那么苏东坡对易学也一定搞得非常透彻了。

事实确是如此。

苏东坡有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秘密：他从小就读《易经》，毕生研究易学，而且还写了一本理论专著——《东坡易传》。可以说，苏东坡文章写得好，易学理论的指导少不了。

苏东坡小时候就被祖父送到老家四川眉山城内的天庆观，跟从一位有名的道士学习了三年。所以，苏东坡小小年纪就开始学《易经》，从那个时候开始，《易经》中的许多思想逐渐融入到了苏东坡的血脉里，后来就演变成了他那些著名文章中的哲理闪光点。

当然，苏东坡毕生研究易学，他的父亲——“老苏”苏洵的影响也很大。“苏老泉，三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三十多岁的时候才浪子回头，用功读书。他研究《易经》等经典，曾经写了一本《易论》；晚年的时候，又以“十年读《易》费膏火”的功力，写了很多《易经》研究论文，立志于写下一本研究《易经》的“伟大作品”，做一个两千年《易经》研究的“终结者”。可惜苏洵的这个“伟大作品”实在是有些难产——看看自己身体日渐衰老，时日无多，苏洵心里这个后悔呀：



20岁的时候我怎么玩得那么疯、那么狂呢！大好青春都被我休闲掉了！于是临死之际，苏洵将这个“未竟事业”托付给了苏轼、苏辙兄弟，作为长子的苏东坡也就只好勇挑重担了。

苏东坡继承了先父苏洵的治学理路，坚持在《易经》研究里借天道谈人事，摒弃虚无玄谈，切近日常事理，使得《易经》成为讲哲理、言人事、砺道德、明心性的实用之书。在此基础上，苏东坡又把很多儒家、佛家和道家的观点融入到对易理的阐释中，使得《东坡易传》平添了几分清亮、几分活泼。所以不难理解，苏东坡的文章、诗词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由于易理，以及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等诸多丰富营养的滋润。

就总体而言，苏东坡的易学对他的文学影响巨大，比如就文章的总体风格而言，苏东坡就以《易经》的涣卦理论为指导，推崇行云流水、文章天成。

当年苏洵在研究《易经》时，曾经大赞水和风的形态——“风水之极观备矣”！然后用《易经》的涣卦总结：“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他认为，风和水二者相遇形成涣卦，这就像是写文章，要“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这样好文章自然就来了！

苏东坡直接继承了他父亲对《易经》涣卦理论的研究。认为好的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由此可见，苏东坡的文章、诗词之所以从宋代起就广为流行是必然的了，“行云流水”嘛，当然是要“流”、要“行”了！

再比如，就文章里情感的抒发而言，苏东坡总是达观通变，意趣盎然。那么多人生的困苦和劳顿为什么对他就没有太大影响呢？《周易》里“易”字的第一个意思是变化，第二个意思是不变。苏东坡通过易学，早已对世界的纷纭变化想开了，看透了，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曾经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再加上一句就是“眼前见天下无一处不好景”。

话说苏东坡被贬到偏远的黄州（今湖北黄冈）做小吏，领到的那一点儿薪水一家子人连饭恐怕都吃不饱，换了是别人，早就牢骚满腹、骂不绝口了。苏东坡



就没有，他搞到一块城东的荒地，自耕自种，还给这块地起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自笑平生为口忙”，安详、自足的生活之余，他还四处游玩。有一次，他与友人夜游赤壁，友人看到美景禁不住要发出悲叹：“人生苦短！”苏东坡就不，他反而是忘却自我，快乐始终：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于天地，眇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易经》的《象》里有一句话，最为人所熟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屡屡遭到贬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但他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以其昂然向上的达观和智慧，自强不息，创作了2700余首诗，300多首词，800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无独有偶——对联与《周易》

对联，又称楹联，俗称对子，在中国古代曾经浩荡奔流、盛极一时，至今余韵回响。就世界的范围来讲，对联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学形式，也是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民俗特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高高张贴的对联：春联、寿联、挽联、贺联……而且几乎哪里都可以贴：住家、宫廷、庙宇、商铺……对联如此重要，以至有人提出，应该把“清代对联”提升为一个文学典范，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一起受后人追慕。

关于对联的故事太多，恐怕任何一个文学爱好者都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几段。但是，要做好一副对联却很难，不仅要讲究词句对仗，还要求声律平仄，又要注重修辞、用典和文采，完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的青丝白发，多少珍贵的大脑细胞耗费在这一字千钧的反复斟酌之中。当今社会会对对联的人已经很少了，这究竟是中国人的幸运，还是中国人的不幸呢？



首先,还是来看看对联这种文学典范的几个基本参数:

其一,最早的春联: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由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写的一副桃符春联。

其二,最常见的对联:

对于百姓人家,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

对于商铺,有“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对庙宇,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其三,最经典的对联:

关于个人修养,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关于景色,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富于哲理味道,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联呢?有人说,中国古代的诗句中有对偶句,文章中有骈句,这都是对联的来源,而汉字是一个一个的方块字儿,这就为严格对称的对联提供了可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对偶的文学现象呢?中国人头脑里所谓的“无独有偶”的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究根揭底,对联的思想源头在《周易》。《周易》里说得明白,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种概念几千年前就在中国人的头脑里面根深蒂固了。而阴阳对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的重要的审美的原则——对称为美。

三、《周易》经传词语串讲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古老典籍,《周易》里面有很多词语至今还在现代汉语里被广泛使用,注意到《周易》是这些词语原始出处的人不是很多,至于《易传》里面现代仍在使用的词语就更多了。比如在现代汉语里至今还把女式皮包叫做“坤包”、女表叫做“坤表”,而用“坤”这个词指代女性,无疑来自《周易》传统。下面,我们把这些成语、习语做一下罗列和解释,再把《易传》里的几个格言找出来,以供没有系统学习过《周易》、《易传》的读者参考。



《周易》中的成语、习语

(1) 群龙无首。

在现代汉语里的意思是：比喻一群人中没有一个人领头的人，这里所说的一群人中的每一个，都是有些本事的，比如《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教主阳顶天一死，光明左右使、四大法王、五行旗互不买账，各行其是，于是明教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这就是典型的群龙无首了。“群龙无首”原本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的用九爻辞：“见群龙无首，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出现一群龙，每一条都不是首领，吉祥）前面讲过，龙虽然是水生动物的领袖，但它本身不是群居的动物，每一条龙一般都会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各自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才说“群龙无首”是“吉利”，这本原的意义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群龙无首”的含义已经相差比较远了。

(2) 不速之客。

出自《周易》第五卦需卦的上六爻辞：“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在洞穴中暂居，有三位客人不召而至，恭敬相待，吉祥）古今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异，都是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的客人——依据古人的经验，对这种客人也要客客气气地对待才好。

(3) 无妄之灾。

出自《周易》第二十五卦无妄卦的六三爻辞：“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这句爻辞的意思是：不妄为却也碰到灾殃，比如拴着一头耕牛，有个行人把它顺手牵走，住在这附近的人却要背负偷牛的嫌疑）这里的“无妄之灾”是什么灾祸呢？后代的学者们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无妄之灾”是不妄为——没有差错、没有缘由——而遭遇的灾祸，就像是飞来横祸，没有办法；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妄”字是“望”字的通假字，“无妄之灾”就是没有预料到的灾祸，就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种说法都有一些道理，看来这“无妄之灾”到底是什么灾，还真是有些搞不明白。

(4) 夫妻反目。

出自《周易》第九卦小畜卦的九三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车轮辐条脱落，车子不能行进；夫妻反目冲突，家庭不再和睦）“反目”的形象也很好理解，夫妻二人原来是含情脉脉地互相凝视，到双目圆睁互相怒视，再到互相背对再不理睬，这就是“反目”。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反目成仇，比



不和睦的意思加重了些。

(5) 谦谦君子。

出自《周易》第十五卦谦卦的初六爻辞：“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谦逊有礼的君子，可以成就大事，吉祥）从卦象上来看，《周易》的谦卦是坤上艮下，就是地下有山的意思，是高山藏于平地之中，象征着谦虚。我们现在经常说某某人是个谦谦君子，是说男子风度良好，待人接物谦逊有礼，这与古人的意思相差不大。

中国古人对谦虚的崇尚由来已久。《尚书》里有一句古训：“谦受益，满招损。”《道德经》里也说：“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看来中国古人真的是很看重“谦虚”，也很谦虚。可惜，现代的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谦虚的好处，还曾经一度把谦虚当成是一种不敢争先的缺点来批评。看来谦虚的好处还真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6) 突如其来。

突然出现的意思，出自《周易》第三十卦离卦的九四爻辞：“突如其来，焚如，死如，弃如。”（有学者把这句爻辞解释为：突然升起了火红的晚霞，像烈火燃烧，又很快熄灭，没有踪迹）

(7) 匪夷所思。

出自《周易》第五十九卦涣卦的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解散朋党，大吉。因为解散朋党而集聚起山丘一样巨大的群众力量，这就不是平常人能够想到的）“匪夷所思”的古今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不是平常人能够想到的。

(8) 虎视眈眈。

虎视眈眈，形容贪婪而凶狠地注视，出自《周易》第二十七卦颐卦的六四爻辞：“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这句爻辞的意思是：逆着常理以求颐养，吉祥。像老虎那样眈眈注视，牢牢锁定目标，没有过错）如果你到动物园里对老虎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就会知道老虎的目光是很凶狠的，有质感，看上去就好像有一种欲望在跳跃、燃烧，“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古人的描述真是很形象。

(9) 贯鱼——鱼贯而入。

“鱼贯而入”是按照次序、依次进入的意思。我们现代人说“鱼贯而入”，古



人说“贯鱼”，都是表明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简单讲就是按照“先来后到”，而我们现代汉语所说的“鱼贯而入”就是脱胎于《周易》里的“贯鱼”。“贯鱼”二字，见于第二十三卦剥卦的六五爻辞：“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像贯串在一起的鱼一样，宫女们依次承宠于君王，吉祥）试想古代先人们打鱼后，为了晾晒或者烹制的方便，用一根树枝就可以把几条鱼首尾贯穿起来。在这长长的一串里，每一条鱼的顺序都是既定而不可改变的，于是，“贯鱼”就有了顺序的意思。

（10）革面——洗心革面。

“洗心革面”是彻底悔改的意思。同样的，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洗心革面”也是脱胎于《周易》里的“革面”。“革面”二字，见于《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的上六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君子像豹子一样敏捷地发动变革，庶民也会改变面貌跟从变革，这时候出征打仗会有凶险，安居正道就会吉祥）此外，我们现在所说的“革命”、“变革”、“革故鼎新”、“革新”等诸多词语，都是从革卦“革”的含义衍生出来的。

（11）厉薰心——利欲熏心。

“利欲熏心”是贪图财利的欲望迷住心窍的意思，这个成语最初的文字源头是“厉薰心”，根本就不是贪图财利迷住心窍的意思。“厉薰心”见于《周易》第五十二卦艮卦的九三爻辞：“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这句爻辞一般的解释是：强力止住腰部的运动，结果肋部的肌肉撕裂受伤，剧烈的疼痛像是烟火熏燎心肺一样难忍）

（12）观光。

我们中国人现在常说“旅游观光”，所谓“观光”就是观赏风光的意思，现在出国旅游太平常了，小老百姓随便到哪个国家看风景都可以说是“观光”，这与古人所说的“观光”可差距太大了，古人所说的“观光”的意思要隆重得多。“观光”出自《周易》第二十卦观卦的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观仰大国的光辉盛治，有可能成为国君的宾客）这里的“光”，是指国家大治而呈现的光辉景象，“观光”也就是充满着仰慕之心到文明国家学习、考察，而能成为国君的宾客的人，自然也不是平头百姓了。

（13）硕果。

“硕果”是大的果实，我们现在一般用来比喻巨大的成绩，出自《周易》第二



十三卦剥卦的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句爻辞的一般解释是：硕大的果实没有被摘食，君子摘食将驱车济世，小人摘食将会剥落万家）在这里，古人所说的“硕果”也是一个比喻义，究竟古人是把什么比喻为“硕果”，在爻辞中没有明确写出来——这个东西会给君子、小人以及百姓带来这么大的生活改变，估计是与权力有关的东西。

（14）朵颐——大快朵颐。

我们现代的用法是“大快朵颐”，就是吃得痛快淋漓，或者彻底满足某种欲望。按照这种讲法，“朵颐”，就是指那个潜伏已久的欲望，其实不然。“朵颐”二字，出自《周易》第二十七卦颐卦的初九爻辞：“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舍弃你灵龟般的美质，却来学我垂腮进食，凶险）所以，古人说的“朵颐”不是个好事情，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快朵颐”恰恰是对古人意思的反向使用。

（15）高尚。

我们都知道“高尚”是指道德水平高，“高尚”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使用得非常频繁，不知是我们这个年代高尚的事物越来越多了，还是人们把“高尚”一词用滥了。“高尚”一词，古人使用得非常慎重，在《周易》中它仅仅出现在第十八卦蛊卦的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句爻辞的意思是：不为王侯所用，把自己的情操修养看做是至高无上）按照其最初的含义来看，所谓“高尚”，一般是指隐士。

（16）同人。

古代人说“同人”，近、现代人说“同仁”和“同志”，意思都比较接近，都用来指明我们大家的共同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甚至是共同的利益。“同人”二字，见于《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卦的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在原野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亨通，有利于办像涉渡大河那样的大事情，有利于君子保持正直与节操）

（17）祭祀。

出自《周易》第四十七卦困卦的九五爻辞：“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削鼻截足，为尊贵的权位所困，渐渐有所解脱，有利于举行祭祀）与现代的两个字组成一个词不同，古代人所说的祭祀是指“祭”和“祀”，虽然它们有些相关，但还是可以区分开的。



(18) 介福。

“介福”二字，现在在老牌的店铺招牌上容易见到。等下次再见到时，我们就不会看不懂了。在这里，“介”是大的意思，“介福”简单讲就是有大福气的意思。“介福”，出自《周易》第三十五卦晋卦的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这句爻辞有学者解释为：进长之际满面愁容，守持正道就吉祥如意。承受到弘大的福泽，这来自于尊贵的王母）这里的“王母”当然不是民间传说里的王母娘娘，学者们一般认为“王母”就是祖母。

(19) 黄金。

“黄金”二字，现在很常见。最近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又创新高，黄金的价值又提高了。本来中国古人是习惯用单字的，比如“金”字也有黄金的意思，“黄金”二字连用，足见古人对这个金灿灿的东西的重视。“黄金”二字，见于《周易》第二十一卦噬嗑卦的六五爻辞：“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这句爻辞的意思是：吃干肉，吃到黄金，比较危险，还好无事）吃干肉怎么还能吃到黄金呢？要知道，在古代黄金还没有升值的时候，黄金只是一种比较容易加工的金属，古代人用黄金制成弓箭箭头、投枪枪头，这样狩猎的时候，如果箭头或枪头折断的话，猎物的身体里就会残留有黄金。这样，吃肉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吃到黄金颗粒，这也算是中了头彩！当然如果颗粒太大，不小心咽进去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无意间就成了所谓的“吞金而死”，但一般没有事，所以说“贞厉，无咎”。

(20) 白马。

“白马”二字，见于《周易》第二十二卦贲卦的六四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这句爻辞的意思是：朴素白净，就像是通体纯白的白马，不是有盗贼，而是娶亲）白马是很吉祥的一种动物。古代人祭祀的时候要杀乌牛、白马，乌牛是祭地，白马是祭天。比如汉朝时，为了约束同姓诸王不造反，汉朝皇帝就搞出了一个有名的“白马之盟”。中国古代的一个大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的最为著名的一个论题就是“白马非马”——白马不同于马，有现代学者用语言哲学的方法来解读它，很成功。河南洛阳有一个鼎鼎大名的白马寺，据说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时有一匹白马驮经……关于白马，以及由白马衍生出来的白龙马，在中国民间有无数动人的传说和故事。

(21) 泣血。

“泣血”是哭出血来，哭都哭出血来了，形容哭得悲惨。据说人如果非常伤



心的话，眼泪哭尽就会哭出血来，哭出血来如果再继续哭，双眼就会失明。“泣血”，出自《周易》第三卦屯卦的上六爻辞：“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这句爻辞的意思是：乘马之人来来往往，泣血伤心血泪涟涟）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人这么伤心，我们不得而知。

（22）大作。

“大作”是指很有水平的作品，一般都是应酬时的客套话。最初的“大作”二字连用见于《周易》第四十二卦益卦的初九爻辞：“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这句爻辞的意思是：有利于大有作为，做大事业，最为吉祥，没有过错）除了“大有作为”、“做大事业”的意思外，还有学者把“大作”解释为耕作，就是种庄稼——不用说，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

（23）反复。

“反复”一词在现代汉语里使用非常频繁，我们现在所说的“反复”的第一种含义是一遍又一遍、多次重复的意思，第二种含义是颠过来倒过去的样子。它最原始的出处是《周易》第二十四卦复卦的卦辞：“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句卦辞的意思是：亨通。出入平安，没有疾病，与朋友往来没有什么过失。反转回复按照规律，每七天就有返回初始之时，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在这里的“反复”，是现代汉语里的第二种含义。

（24）号咷——号啕大哭。

我们现在通常称某某人放声大哭为号啕大哭，所谓号啕大哭的原型是“号咷”，出自于《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卦的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这句爻辞是说：志同道合者先是呼号悲哭，后来破涕为笑，因为终于与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汇聚在一起战胜了敌人）原来古人的号啕大哭还真不简单，要有一番艰难困苦的经历之后，才能够喜极而泣，放声痛哭。就现成的例子而言，而且与这句爻辞文意非常贴切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会师的热烈情景，那可真是“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易传》中的词语和格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因此要自强不息。



(2)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地厚实和顺,君子因此要宽容大度。

以上这两句格言,有学者把它们拔得很高,认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概括,是传统文化最最精粹的部分。所以,清华大学把这两句话拿去做了校训,用以光耀门庭。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修积善行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祥庆,积累恶行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祸殃。这是《易传》里面与佛教教义最为接近的话。由此也可以看出,善恶报应的说法,中国古已有之。

(4)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秉持乾阳气机的人成为男子,秉持坤阴气机的人成为女子。关于男、女的话题一直都不断,很多人也搞不懂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坤卦的卦辞也有“元、亨、利、贞”四字,只不过坤卦的“贞”比乾卦的“贞”更加偏重于静守的一方面,“利牝马之贞”。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习惯把女式的皮包或手表叫做“坤包”、“坤表”,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有“坤车”、“坤房”,这些当然都是来自《周易》的乾男坤女之说。

另外,《易传》之中有“大哉乾元”,这就是元朝的“大元”的来历,研究学问的人要注意了。

(5) 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

阴阳二气自然运行就叫做“道”……仁者发现“道”有“仁”的意蕴就把它叫做“仁”,智者发现“道”有“智”的意蕴就把它叫做“智”,百姓日常应用“道”却对它茫然不知。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从这里来的。在这里,“道”就是一头大象了,所谓“仁者”、“智者”就跟摸象的盲人差不多,老百姓就差得更远了。所以,探知事物的本原真的是很困难,首先需要超越的就是我们自己。

(6)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这两句话不容易翻译为白话文,比较平和的一种解释是:贵重的物品不好好收藏起来,就会使小人有偷盗的念头;姣好的容貌再刻意打扮,就会使心术不正的人有淫邪的想法。一种容易有争议的解释是:轻忽于收藏财物就是引人为盗,妖冶其容貌姿致就是引人淫荡。如果这么翻译的话,丢失财物的人不会



有意见，自认倒霉而已，只怕是那么多爱美女人会出声抗议。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翻译，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而且这种道理古人两千年前就知道了，可惜现在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身上金银首饰、手表、钻戒越挂越多，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很多年轻女子们爱起美来就更是凶猛——唯恐自己的面容不够完美，身材不够性感，她们百般雕琢，化妆美容减肥不说，塑身塑到了动用手术刀、注射器的地步，这种勇气也真真叫人佩服！“不靓丽，毋宁死！”相反的，心灵美不美，似乎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了。

（7）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超越于物质的具体形态的，就是“道”，局限于物质的具体形态的，就是“器”。这是中国古人对“道”的直接表述，说明了“道”的“形而上”的特征——“道”是不能够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探究来把握的。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划分：道学和器物之学。后来西学东渐，翻译家们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的哲学翻译为“形而上”，于是大多数中国人就把哲学认定是“形而上”之学，是真学问，而古人所说的“道”反而无人问津了。

在《易传》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现代常用的词汇，比如“消息”、“性命”、“始终”、“纯粹”、“养贤”、“和平”、“饮食”、“原始”、“天下”、“范围”、“典礼”、“崇高”、“革命”等等，当然经过长期使用，这些词汇中有些已经逐渐偏离了其原来的含义，在这里就不作深究了。另外，有些词汇是古人取名字的时候经常用的，比如“致远”、“守仁”、“天德”、“荣禄”、“化成”、“乐天”，意义都很好，我们给小孩取名字的时候大可参考一下。至于单名的情况，比如刘备的“备”字，在《易传》里也有比较深刻的含义，这就要有心人去仔细挖掘了。

四、《周易》时代的文化风俗

作为上古文献，《周易》中记载了很多历史故事，比如“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丧牛于易”、“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等。估计当时的人对它们都耳熟能详。可惜由于时代久远，现在已经搞不清这些故事的具体内容了。还好，《周易》中还记载了很多文化风俗，从中可以看出祖先的生活习惯。



比如既济卦的爻辞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就是说，东边的人家杀牛进行祭祀，还不如西边的人家心诚薄祭，这样更能得到神灵的福佑。

男尊女卑与《周易》本身无关

有人说，《周易》是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理论源头。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周易》的首卦是乾卦，第二卦才是坤卦；而在战国时候解说《周易》的《系辞》里面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是男，坤为女，这样“天尊地卑”就是男尊女卑、男贵女贱了。

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稍有易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按照自古以来的解释和出土文献，《周易》有三个版本，即第一版《连山》、第二版《归藏》和第三版《周易》，它们统称为“三易”。一般认为，夏代的《连山》是艮卦为首，商代的《归藏》是坤卦为首，到了周朝的《周易》才是乾卦为首。就“三易”来讲，其思想内涵是一体的。所以，不能说周朝的《周易》以乾卦为首是男尊女卑的理论源头，同样也不能一看到商代的《归藏》是以坤卦为首，就认为商代的人重女轻男。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人类是先进入母系社会的，所以在母系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会高于男性，而在随后出现的父系社会，男性的地位才一般会高于女性。而夏、商、周三代都是父系社会，男性的地位已经开始高于女性了。所以《周易》是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理论源头的。我们倒是可以说，很可能是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观念的影响，《系辞》的作者把本来平等的天、地关系和乾、坤关系进行了扭曲，变成了一尊一卑，一贵一贱。这样一来，后来所谓的儒家伦理，所谓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根据。直到两千年后的20世纪初，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仍然是压迫中国农村妇女的不堪负累的大山。

中国传统家庭的八卦取象

所谓八卦就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这几个字，或者说这几个称呼都很抽象，刚刚接触它们的人会觉得很难理解。

那么，就一个传统家庭来讲，八卦都各指什么呢。

乾就像是父亲，坤就像是母亲，震就像是长子，巽就像是长女，坎就像



是二儿子，离就像是二女儿，艮就像是小儿子，兑就像是小女儿。

乾的性格刚健，父亲一般在外挣钱养家糊口，是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往往就是一个家庭里的顶梁柱，所以乾的具体形象就是父亲。

坤的性格笃厚，母亲在家里一般要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往往是她的辛勤劳作使得一个家庭温馨、幸福，所以坤的具体形象就是母亲。

震是动，是雷，鼓动万物，震惊百里。这就像是一个家庭里的大儿子，做事要有闯劲，对家庭要有责任，对社会要有担当，为父母分忧，也要为弟弟、妹妹们树立榜样，所以震的具体形象就是长子。

巽是人，是风，收集细小，吹拂万物。这就像是一个家庭里的大女儿，既要帮助母亲勤俭持家，小心谨慎，还要关心亲人，嘘寒问暖，使得家庭和睦，邻里友善。

坎是水，水要流，这就像是二儿子，上面既然有哥哥担当，他就可以走出去，走得远一点，开辟自己的生活领域。

离是火，是丽，就女性来讲，意味着美丽。这就像是家庭里面的二女儿，青春少艾，又没有姐姐那么多的操持，所以更加有闲暇梳妆打扮，自然可以靓丽异常。

艮是山，默默而立，这就像是家庭里面的小儿子，沉默寡言，自行其是，以现代观点来看，就很有些叛逆性格。

兑是悦，就是快乐，这就像是家庭里面的小女儿，天真无邪，活泼好动，整天笑嘻嘻的快乐得很，是一家人的“开心果”。

如果就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八卦取象又有不同。比如就女性而言，兑是快乐，所以表示快乐天真的少女，离是美丽，所以表示靓丽光彩的中女，巽是言语，所以表示罗里罗嗦的老女。就男性而言，艮表示沉默寡言的少男，坎表示四处奔波的中男，震表示事业有成的长男。

当然，就不同的系统而言，八卦取象也就可以次次不同。比如就人的身体而言，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就家畜而言，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泽。仔细揣摩这些取象，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根据的。比如古人通常用八卦里的震和离来表示武器。在已经出土的金属矛头上面，确实发现古人刻有离卦卦形。为什么呢？离又是火，而戈、矛等金属武器的锻造又离不开高温，也就必须



有火，所以离又可以表示武器。而古人常常用震来表示弓，可以想象，弓作为发射箭矢的武器，发射的时候弓弦一定要震动，所以就用八卦里的震来表示弓。这样，古代战车作战时使用的主要武器，即战车左面的矛和右面的弓，都可以用八卦卦象来表示了。

另外，再想一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武器，无论是火药作推力的枪弹、炮弹，还是燃烧助推剂发射的大小导弹，都可以用八卦里面的离卦和震卦来表示——它们都离不开燃烧和震动。比如喀秋莎火箭弹，点火—飞行—爆炸，这离不开火，这都是离卦；战机的发动机轰鸣—震动空气—炸弹的冲击波，都是震动，这都是震卦。所以，古人的八卦取象还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几千年后仍然适用，值得我们现代人仔细体会。

不是迎亲的，就是打劫的

《周易》里面提到好几次“匪寇，婚媾”。用通俗的话讲，意思是：“不是迎亲的，就是打劫的”。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把迎亲的队伍和打家劫舍的盗寇混为一谈呢？原来，古时候迎亲是件了不得的大事，通常是家族的大小人等全部出动，骑马乘车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这种规模和阵势，大致可以和一伙强盗相比。而且古人认为，强盗是流动作案，就像是洪水一样，破坏力很强，所以用八卦里的坎卦来表示，再后来就把强盗也叫做流寇。比如当年的李闯王，纯粹的流动作战，打到哪里就是哪里，明朝的军队很头痛，称之为“流寇”。

不过话又说回来，古人似乎对“寇”字并不是只用作贬义，比如《周易》经文中还有“不利为寇，利御寇”。如果“寇”字仅仅是贬义的话，那么人们不禁会问，难道还有“利为寇”——有利于做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时候吗？因此“不利为寇，利御寇”这句话还真不能从字面理解，古人是不是想说“不利于出击，而利于坚守”呢？

出嫁为什么要带上妹妹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首新疆民歌：

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西瓜是大又甜哪！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你一定要嫁给我。

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很多人听不懂：为什么姐姐出嫁要带着妹妹去呢？其中有些人不免会胡乱猜测。其实这是新疆当地的风俗，姐姐出嫁，妹妹是去做伴娘的。

在中国古代，也有姐姐出嫁要带着妹妹去的：姐姐嫁去做正妻，妹妹则是做侧室——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小老婆。比如《周易》经文中“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就是说，帝乙将女儿出嫁，大女儿的衣着不如从嫁的妹妹的衣着那样华丽，这是因为她脸如满月，长得十分丰满娇好，穿上什么样的衣服都会吉祥如意。帝乙是商朝的一位国君，这就说明姐妹同嫁是古代王公们很通行的一种风俗。比如娥皇和女英姐妹两个就一起嫁给了舜，而当晋公子重耳流浪到秦国时，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怀嬴等九个嬴姓女子嫁给重耳。当然，这种风俗只有在—夫多妻的社会里才能实行。

鼎，古代人的火锅

《周易》的第五十卦是鼎卦，鼎卦巽下离上，下面是风，上面是火，卦辞是“元吉，亨”，非常吉利。

说到鼎，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不会陌生。笔者记得自己读过的小学历史课本上就有一个商朝“司母戊大方鼎”的照片，这个青铜大鼎有八百多公斤，方方正正，四个脚，看上去非常沉稳。实际上，鼎有圆形的，还有三个脚的——这就是所谓“三足鼎立”的渊源。另外，还有“钟鸣鼎食”、“问鼎中原”、“革故鼎新”等成语，连金庸的小说都有一本叫《鹿鼎记》的，取意正是“群雄逐鹿”和“问鼎中原”。那么，鼎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在古代，鼎是举行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在祭祀之前，先把牛羊肉或鱼肉等食物放在鼎里，加水加调味品，然后就点上大火猛煮。接着再开始祭祀。等到祭祀的礼仪过程快要结束时，鼎里的食品也就煮熟了，这时候就要请所要祭祀的神灵先来吃——神灵们吃的当然是气味。祭祀结束后，大家就开始各自操家伙大吃一顿，滚烫热辣香喷喷，大鱼大肉吃得真舒服！

原来，这鼎，就是古代人的火锅！



第六日

玄之又玄

——《周易》与道教、佛教

一、《周易》与道教修炼文化

《周易》与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与《老子》、《庄子》一起被道教奉为“三玄”。在道教中，修炼得道，进而化为超脱尘世、长生不老的神仙，这是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而说起《周易》与道教修炼，涉及的问题有很多。

究竟什么是“神仙”

我们都知道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在于修炼成仙，那么，究竟什么是“神仙”呢？

道教认为，人经过修炼是可以成为“神仙”的，而“神仙”和“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按照《周易》理论，人是生活在一个阴阳锁扣的时空场里面，而且这个时空场还是以阴性物质为主的，所以人体也是以阴性物质为主要组成成分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百十来斤的身体。《庄子》之中有对于神仙的直接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可以看出，“仙”跟人不一样，“仙”是纯阳之体，全身以阳性物质为主——你现在知道吕洞宾为什么把好好的一个富有创意的名字“洞宾”舍弃不用，死活要改名叫做吕纯阳了吧！简单来讲，按照现代人的某些观念来看，所谓神仙就是一个超人，当然也有超女，比如何仙姑。



魏伯阳的“神仙学习笔记”

东汉时代，有一个叫魏伯阳的，他家里世代做官，他本人却一心要修炼成仙。要想做神仙，理论很重要。他就仔细研究《周易》，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被他发现：在《周易》理论指导下，神仙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入山修道炼丹成仙，并且撰写了神仙学习笔记——《周易参同契》。

魏伯阳认为，究根揭底，炼制丹药修炼成仙这种大事情是与宇宙天地的大道理完全一致的，而《周易》对宇宙天地的大道理描述得最为准确——一种模糊的准确，所以要表达明白的话，一定要用《周易》里面的话语来讲述炼制丹药的具体方法。

所以，《周易参同契》凡是讲述关于炼丹的鼎器、药物、火候、变化等事情，都一定要借用《周易》里面的概念和思维方法。比如，铜鼎和炉子两种物件，是炼丹的基本工具，但是魏伯阳认为铜鼎在上，炉子在下，就像《周易》里说的乾卦为上，坤卦为下，所以就用乾和坤来指代铜鼎和炉子；同样的，他还用离和坎来指代汞和铅两种原料，等等，这种种曲指满篇都是。

这样的类比或隐语再经过几次连缀和几次重叠之后，早已经叫人晕头转向了，如同在读天书，哪怕你熟读《周易》，哪怕手边有很多学者的注解——更是一点儿也不体贴我们普通读者脆弱的耐心。好在大家对其理论性内容也不大感兴趣——现在这个大环境，对于读者是“读图时代”，对于作者来说则是“无体系时代”，我们大家一起寻求的是神仙的快乐，而不是关于神仙的枯燥教材。

具体来讲，《周易参同契》里面写了修炼成仙的两个基本方法。

神仙修炼第一秘笈

神仙修炼第一秘笈：外丹大法。

简单来讲，就是下面弄一个大炉子，生火烧啊烧；上面坐一个大鼎（也就是大锅），装上炼丹的各种材料煮啊煮。

具体而言，炼丹是以铅、汞为原料，与水、火相配伍，其中用药的分量、炼丹的火候、还丹的过程，这些在《周易参同契》里面都有详细规定。而且魏伯阳还说了：外丹（金丹）炼成之后，其服用效果是很好的，它可以使人返老还童，得到长生。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笨方法，现在有很多人发现《周易参同契》具有科学性



质,是因为它确是一部炼丹的科学著作,在化学史上的地位举世公认。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三部分中,对它的内容作了专门的探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认为,虽然没有办法和现代化学相比较,用炼外丹的观点读《周易参同契》,对于研究中国化学的历史很有帮助。

一般来说,道士和神仙爱好者们通过炼丹炉所炼就的外丹,里面含有铅、汞两种重金属,对人体十分有毒。很多时候,服用外丹不仅成不了仙,还会中毒,甚至死亡。自古因服食外丹而中毒死亡的人非常之多,包括好些个贪图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汉朝的刘氏子孙。

神仙修炼第二秘笈

神仙修炼第二秘笈:内丹大法。

有了内丹大法,神仙修炼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以后,神仙爱好者们就与锅炉工完全绝缘了,不再烟熏火燎、乌漆墨黑,成为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脑力工作者。关于神仙的学问的层次也大幅提升了——从燃烧热力学的层面一下子跃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

内丹大法的理论根据,就在于《周易》的天、地、人合一的基本理论。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在周流不停地运动,互相交感生成了万事万物;而作为万灵之灵的人的生命,其本身也就是天地阴阳交感运动的一个具体的再现。所以只要把握了阴阳二气周流运动的规律,就可以加以运用。所谓“顺则凡,逆则仙”,就是把阴阳二气周流运动的规律“反其道而用之”,你“人”不是越活越老吗,我“仙”就是越活越年轻!

根据这个道理,魏伯阳在书中提出:神仙修炼,要分四个阶段。

神仙修炼第一阶段:筑基。就是打好身体基础,准备好革命的本钱。因为“筑基”一般要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也叫“百日筑基”。

为什么一定要花这一百来天专门保养身体呢?现在不是说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亚健康”嘛!如果把脚癣、近视、鼻炎、失眠等小病小灾都算是有病的话,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所以一定要先补足身体的亏损,从而祛除病魔,使你有足够的心情去体会做神仙的乐趣。

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百多天里要把电视、电影、电脑以及小说、游戏等娱



乐全都狠狠地彻底地戒掉，因为你一定要学会养性敛神，使你心气平和，静静体会身体内外阴阳二气的周流运动。

神仙修炼第二阶段：炼精化气。

什么是“精”、“气”、“神”呢？精、气、神是人体的三宝，是生命的动力，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因此，修炼神仙的第一步操作，就是把阳气不断地吸入到人体内，进行阴阳运化，把人逐步改造成“仙”。

具体的要求，最简单地讲就是专心致志，以意御气，使阴阳二气在体内按照一定的路线——就是经络——运行。气机运行起来，就会有冷、热、酸、麻、胀、痛、温、凉八种感觉，一般称之为“八触”。这“八触”说到底，就是对应人身体内的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八种气机的运化。

神仙修炼第三阶段：炼气化神。就是在身体内部使阴阳二气交结，凝聚成内丹。

内丹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奇妙，其实很简单——据说，它就是结石。我们“人”生了胆结石、肾结石，谁也不觉得奇怪，也不会去问：“哎呀！你水平真高啊，怎么弄出来的？”如果这个结石——内丹放在肚子里，人们反而就觉得奇怪了。其实内丹和结石是一回事，都是人体造出来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神奇之处。

神仙修炼第四阶段：炼神还虚。这是修炼内丹的最高境界，据说一个人一般需要九年时间才能修炼成功，从而使人进入虚空境界，也就是进入神仙洞府，或是天上宫阙。

二、佛教高僧解说《周易》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学是在东汉明帝时公开传入中国的。在传入之初，为了尽快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尽快使世人明了佛学所讨论的内容，僧人们开始利用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佛学理论。《周易》、《老子》、《庄子》，当时被人们称为“三玄”，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想的“共同话语”、“交流平台”。《周易》作为“三玄”之首，自然成为各位学者和高僧的共同话题。



应该说，这次对接非常成功，完全达到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目的。无论是“以佛解《易》”，还是“以《易》说佛”，都使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甚至有人感叹：佛学只是名称改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中国早已有之！再后来，就有很多人赞叹：“清净涅槃”果然玄妙，还是佛经里道理讲得更加透彻、深入！从此，佛学在中华大地上就可以昂首阔步、独立前行了。

话又说回来，同为“精深道理”、“智慧高峰”，既然《周易》与佛学已经有了甚深缘法，二者也就经常互相挽手、结伴而行——历史上多有高僧解《易》，这倒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一大景观。

康僧会：佛法可以从《周易》里找根据

三国时候，康居国的僧人康僧会来到中国，到当时的吴国讲授佛法，翻译佛经。吴国的国主孙皓——挺有小聪明的一个末代帝王，曾经剖断“老鼠屎案”——不信佛法，当面质问：“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都是你们佛教自己的理论。在中国难道还有什么根据吗？”康僧会回答说：“有。《周易》的《文言》里不是说：‘积累善行的家族，必然留下很多祥庆，积累恶行的家族，必然留下很多祸殃。’所以我们说，做恶事要下地狱受苦，做善事要上天宫享乐。”孙皓一听，真有因果报应！不由得对康僧会就客气多了。

《周易》与佛学的对接，就是从康僧会的这一段话开始的。在那时以后，很多比较有名的僧人，比如东晋僧人慧远，都曾经为《周易》与佛学的对接寻找切入点。到了南北朝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士大夫、僧人，都以谈佛论《易》为时尚。比如梁武帝佛法修行很一般，却专门撰文，以成佛的意识（元明神明）为体，以日常思虑为用，用这个独创的“体用论”来解释《周易》里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希迁：佛学与《周易》的会同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清净”，这是佛学的三法印——看一种学说是外道还是佛法，就是要看它是不是与三法印相符合。

变易、简易、不易，这是《易经》的三原则。

《易经》所谓变易，是要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间和空间当中，没有一事、一物、一情况、一思想是不变的，都在变化。这一点，对应佛学中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所谓“无常”，是说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永恒存在的，所以名为“无常”。

所谓“无我”，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合化而成，都是“空无自性”，就是没有什么“本性”、“本质”——在《易经》看来，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和合而成，当然没有所谓的“本质”了。

以上这些，是佛学与《周易》二者会通的根本之处。

到了唐代，中国佛学的发展到达鼎盛期，经文教义研究日渐深入，各宗各派次第成立。他们都以本宗经义与《周易》挂钩，相互发明，迭出新意。其中又以禅宗、华严宗最具有代表性，而曹洞宗又是禅宗里的翘楚。

曹洞宗是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由盛唐时的禅师石头希迁开始——希迁（700—790）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再传弟子，曾经在一块大石头上盖草棚居住，所以得名石头希迁。希迁对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很有研究，认为既然《周易参同契》上说《周易》、黄老、炼丹三家合同，那么其实参禅打坐也是一样，也与《周易》合同，所以他也写了一本《参同契》——他用五言偈颂的形式，讲了《周易》思想对参禅的指导意义。

这本佛家的《参同契》影响很大，后世禅宗，特别是曹洞、云门、法眼三家，都引以为经典。

牟子：“人道法五常”，深得《周易》旨趣

在号称“广西东大门”的梧州市，其河东老城区有连绵成片的骑楼群。22条原汁原味、原风原貌的骑楼长街上，560座荟萃中外经典设计的骑楼组成了全国最大的骑楼城。骑楼城牌坊附近有一组梧州历史名人雕像，其中那位一手握竹简，一手数佛珠的儒者叫牟子。牟子，名融，苍梧郡广信（今梧州市）人，是东汉末三国初佛学家，也是广西宣传佛教的“第一人”。他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对佛学造诣尤深。

牟子的思想以佛为主，儒、佛、道三教兼而有之。他撰写的《理惑论》，是中国佛教著名论著之一。该书旁征博引，论证佛教和儒教、道教的思想观点互相一致。其基本观点是：儒、佛、道三教均有共同之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三者可以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牟子这一思想，开三教合一之先河，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对于佛的理解，牟子认为，佛是一种谥号，犹如中土的三皇五帝之号。佛的意义是觉悟，佛也是道德之祖。对佛的描述，书中采用类似庄



子对真人的表述：“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

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度佛教最初并无“性善”的思想。佛教作为挽救灵魂、追求超脱的宗教，是以人生为苦、以肉身为恶、以佛性否定人性、以来世否定今生为其立论的基础的。但这一套理论传到中国后，由于与儒家思想的相互作用而发生了变化。来世向今生靠拢，佛性向人性回流，“性善”的思想便由此而生。其最早的转化者就是牟子。

总之，中国最早宣扬佛教思想的著作《牟子理惑论》提出了“人道法五常”的观点（该书所论“怀善者应之以祚，挟恶者报之以殃。未有种稻而得麦，施祸而得福者也”的思想，与《周易》的旨趣实际上并无二致）。

太虚大师：《周易》是世间法

太虚大师（1890—1947）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的人物。他创办了几所重要的佛学院，开展僧侣教育，提倡僧制改革和教制改革，并且极力倡导“人间佛教”。他创办的《海潮音》杂志，至今还在出版，而且成为佛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刊物。但就是这么一位高僧大德，当年出家的动机却是不纯，虚老曾经自述他出家的动机：“我初出家，虽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缘，而最主要的，还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

太虚大师说，《周易》是世间法。

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佛学中的两个概念。简单来讲，世间法是解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运动变化，而不能根本断绝烦恼的理论和方法。与之相对，出世间法是解释如何超出三界之外、彻底断绝一切烦恼的理论和方法。佛学认为，我们人类世界是处于欲界——这个观点很深刻，世人都有欲望，直至欲望横流，也是不圆满的世界——有生老病死，有无常变化，所以自然烦恼不断，所谓的“剪不断，理还乱”，人人都有一堆窝心的麻烦事儿。佛学是讲究超脱、解脱的，要超出三界，所以是世间法，更是出世间法。

但是有很多儒家学者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所谓入世，就是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对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入朝为官、造福一方，或者是著书立说、振奋民族精神，或者在紧要关头为国为民寻找解救危难的真理，这都是世间法，《周易》能够提供这种精神动力，所以《周易》是世间法；所谓出世，就是离群索居，隐居世外，



或者是出家为僧为道，一心修行，这都是出世间法。所以，他们认为，既然道家修行离不开《周易》，那么《周易》理所当然也就是出世间法了。

太虚大师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认为《周易》还没有超出三界，还是在讲“世界”里的事情——佛经里说，“世”是时间，“界”是方位，作为出世间法德佛学，却可以超出“世界”的范围进行讨论——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周易》是世间法。但是，太虚又承认，《周易》里讲“定志”、“修业”、“成德”，这些都与佛学相通，就是说《周易》可以通向出世间法。

本光法师：《系辞》说得不对

唐代的时候，有一个佛学大师叫李通玄，佛法高深，十分有名，人称枣柏大师。他离世之后，给弟子们留下来关于《周易》的一套学问，叫“方山易”。这套佛教易学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传到20世纪，到了本光法师那里——本光法师（1906—1991），俗名杨乃光，四川平武人，曾经跟从谛闲法师、太虚法师学习，是一代高僧。本光法师诲人不倦。把“方山易”披露一些出来，让我们今人有幸领略李通玄大师的治学风采。

现在看来，本光法师所讲的“方山易”里面，最首要、最突出的一条，是对《易传》中《系辞》部分语句进行批驳。本光法师说，《系辞》成书比较晚，是在战国、秦汉时期，里面有很多错误。所以，研究《周易》不能够依靠、倚重《系辞》，更不能用它来代表所有《周易》思想。反之，应该多倚重《说卦》、《杂卦》两篇传文。

我们知道，《系辞》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影响极大，所以有人将《系辞》称为“易大传”，几乎用它来取代《易经》研究。从古到今有几千种《周易》研究著作，却没有人敢说：《系辞》错了，它说得不对。所以本光法师所讲的“方山易”是有独到之处的。

比如，《系辞》第一句话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本光法师说，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尊卑贵贱是指社会人事的地位，社会是人们生活的所在，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会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才有尊卑贵贱之分。而就自然界而言，万物同源，本身没有什么尊卑贵贱的差异。可以想见，《系辞》的作者要为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寻找一个有力的依据，所以就弄出这么一个“天尊地卑”的说教来，还要硬说这是从《周易》的乾坤两卦就定下来的。所以自古传承下来的“方山易”，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想想看，先秦诸子百家，哪一家说过天尊地卑的



话？就是内容杂驳的《吕氏春秋》、《礼记》，也绝对没有类似的讲法。所以在秦汉以前，无论是儒家的天道观，还是道家的天道观，都不说什么天尊地卑。再看一看《周易》乾坤两卦的卦辞、爻辞，哪里有一点点尊卑贵贱的意思！所以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句话不对，不符合《周易》的本意，这句话，以及紧接着的“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都应该是秦汉大帝国统一之后，逐步酝酿形成的。

另外，对很多学术问题，“方山易”也作出了解释，很有见地。比如《周易》为什么得名“周易”？——因为它是周朝人所研究的易学，所以叫《周易》。

妙慧法师：回到《易经》的天道时代

许林金鹤女士，法号妙慧，台湾嘉义人，曾经在大自然中苦修四十余年，一切自食其力，不受信徒供养，后为天山佛坛清净寺住持，对儒、道、释、医等中国文化之精髓很有研究。妙慧法师曾以甚深智慧，对《易经》进行一番系统阐释。

妙慧法师认为，《易经》是七千年前上古帝王伏羲氏创制八卦后流传下来的大学问。在远古时代，先民智慧未开，独具异禀的圣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以一划开天之势，显露人类理智思考，制成八卦，以八组符号分别代表自然界最通常的现象，并教民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豢养家畜，别立人兽，制定嫁娶作琴瑟，因夫妇而正五行，始定人道；造卜筮，定官名，以治天下，天下伏之，故谓之伏羲。

法师强调，因为当时尚未发明文字，所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等名称都是后人逐渐附加上去的，而先哲选取了“易”字来表明八卦里所蕴含宇宙的存在力以及包罗万象之玄妙哲理，至今仍难释其义，却也无可替代。七千年前的伏羲，如何有此通天辟地的智慧，开创这组既能解开宇宙之生发，又能建制人类伦常，一以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八卦？后人再多的揣度，也难明其高超奥秘智慧的源来与蕴底，他如何对先民解说，后人更是不知，但所造就的是人类文明史上难得再现的“天道时代”。

那么，什么是“天道时代”呢？

法师说，所谓“天道时代”是指远古时代，先民们生活在未受污染的大自然，天灵充满着氧气，地灵也充满着氧气，人们身体健康都是道体，思想清静，善根灵性具存，所拥有的智慧是没有中毒的先天智慧。在大自然的时代，按照天地的奥妙而生活，天地人是完全的合一，领导者也要以天地人合一的超越来教化



人民，听天命、顺天命是他们的智慧，不是他们的愚昧，所以他们能生活在完美的天道世界中。以今天的观念看来，那是活佛的世界、极乐的世界、大同的世界。不需要皇帝、乡长、村长的管理约束，每一位都是主人，完全的民主，又因人性的纯朴而能团结在一起。伏羲以八个符号就能表明当时天地人间的完美无缺，缘分深的人探讨八卦，按照八卦的宝贵来修，都能成为道体。中原脉脉相传的道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藉伏羲祖师的智慧开创出来的。

伏羲创制之八卦，为纯粹哲学思想之符号，可说明宇宙万物变化之哲理，与今人之言《易》，即识其为卜筮之书，乃风马牛不相及又不可思议。此因文明的进展，时代的演变，人智的发展使人心复杂，所表现出来的贪、嗔、痴，引发了斗争，使三皇时期的天道世界离我们远去了。

易学乃为研究“易道”之学，“道”是易学的生命，是易学的实质，“象”与“术”是表达“道”的方式。《易经》之成书，从所包含卦象及文字内容的组成，历经三古约四千年的发展，其外貌有三《易》，其本质并不变，因皆在表述易道。

何为易道？“道”字的初义是“所行道也”，原是平常不过的一个名词，即“路”。文王演《易》，用易学于筮，筮是占断吉凶的术，它所根据的原理原则，叫做“道”。“道”既为筮术的理则，而筮术又是为人断事决疑的，所以“道”也就成了支配人事的理则。后来孔子与老子二人摒弃筮术，以纯粹的哲学思想论《易》，“道”就成了与现象界事物之相对，即《系辞》所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学虽然赋予了“道”字一个抽象义，却很难成为一个概念周全的定义。从实质上讲，“道”是成宇宙、生万物、无所不在、亘古长存的一大流行。此一流行之作用，从何而来？老子归乎于“自然”。何谓自然？不知其然而然是耶。

宇宙万物皆在变动之中，变的本源是任何事物皆具阴阳二性。阳性与阴性相交而生变化，发生万物。万物之中，唯人与天地并立。所以《易传》不仅有申论自然现象变化过程与法则的“天道”和“地道”，也有论及人类活动规则的“人道”。

易道哲理，经过各位圣哲的阐发已臻成熟完备，后人则转而从“数”与“术”上演说易道。汉世的象数易、宋儒的河图、洛书及先天易的哲学理论，皆难再现高见。易道之表述，不只是文字上的知识，圣人智慧的心血，是打不破的真理，是引导人灵魂归宿的宝藏。数千年来，拥抱经书的真理默默而修的圣哲，不计



其数,但得“道”之境,笔舌难述,如“达摩西来一字无”一般,绝对的真理,不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所幸一千五百年后,宋明理学家能藉佛学及老庄的学涵,以修证的功夫,验证孔孟之学的圣贤之道,又能以清晰的文字,表述修道的路径及得道的意境。周濂溪的“太极”和“诚”、邵康节的“先天”、二程子的“天理”、陆象山的“明心”、王阳明的“良知”、陈白沙的“自然”、高景逸的“中庸”、刘蕺山的“慎独”,都是他们悟道之后,对易学形而上之道本体赋予的不同名称。理学家所开创的,不仅融合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更将形而上所验证的真理,落实在形而下的治平事业,“内圣外王”、“明体适用”是他们的功夫,也是他们的功业。“宰相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三教门人研究《易经》最平常的成绩。

最后,妙慧法师告诉我们,没有实践修行,没有禅定,没有智慧,是不能理解《易经》的。真正的投入《易经》,要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才能返回先天的天智,了解宇宙的深奥。现今的文明社会,物欲的世界,既要维持生活,又要照顾家族,还有名利地位的追求,很难再回归大自然。没有返朴归真,失缺了天的灵气、地的灵气,失缺则无法超越,不会有大公无私的心,八卦怎么会发光呢?现在接触《易经》的人,只用现代的方法,对易道则无法明理通达,《易经》的实在价值还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太可惜了!该如何来挖掘古道文化,以继往圣之绝学,是我们每一个研究《易经》的人反思的主要问题。



第七日

医易同源同理

——《周易》与中医养生

一、《周易》与《黄帝内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周易》的自然哲学有密切的联系。《周易》对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影响巨大,二者在实质上是—致的,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实践之中也是互相支持、互为依托的。自古即有医易同源之说,对应的中医界也有一句名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医。”简单来讲,《周易》对《内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阴阳、变易、象数三个方面。阴阳源于《周易》,《内经》把阴阳这种思想方法在医学理论与实践方面作了发展;《内经》对变易运动观念的吸收和使用,使中医学呈现出有别于西医学的文化特色;象数则是中医学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当然,以上这三方面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在整体方向上所进行的区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可以继续讨论。

阴 阳

虽然《周易》经文的文章中并没有关于阴阳的直接论述,但阴阳思想无疑是包含在《周易》中的。构成《周易》符号系统的最基本的要素“——”、“— —”作为两个性质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的要素,代表着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或物质。由于这两种初始力量或物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整个宇宙及人类社会。《周易》作者用阴阳爻的不同组合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阴阳思想自然也就蕴含其中。《易传》微显阐幽,明确地揭示出阴阳大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认为宇宙间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对立统一的



奇妙作用产生宇宙万物。《内经》发挥《周易》的阴阳思想,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显然,这段论述是对《易传》阴阳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内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壮大、衰亡的内在动力,是现象世界纷繁灿烂而又秩然有序的幕后指挥者。

《周易》和《内经》都认为,阴阳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阴阳的对立统一、调畅、和谐是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条件。《周易》认为,万物资始于乾阳,乾阳在万物的生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万物资生于坤阴,坤阴在万物生化中起辅从作用。因为乾的性质是健运不息,坤的性质是厚德载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双方完全等同,也就无所谓阴阳,矛盾统一体也就不存在了。阴阳观是客观辩证律的主观反映,本身就蕴含着阴阳主从的思想。通过对《周易》的分析,也可以见到这个意思。

《内经》也认为,阴阳无论在天地自然还是在人身,作用是类同的。《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体中的太阳一样,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内经》还认为,阴气性主安静,守藏于内,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关于阴阳的区别与联系,《内经》中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比如“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素问·生气通天论》),“阳予之正,阴为之主”(《素问·阴阳离合论》),“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总之,《内经》认为阴阳相反相成,共同完成人体生命活动。

《内经》将阴阳学说运用于医学领域,扩大了阴阳的适用范围。《内经》对《周易》的阴阳学说中蕴含的阴阳互根互用、消长转化、相协相调的思想作了更系统明确的表达,并结合医学实际作了新的发展。

比如《素问·阴阳离合论》提出了三阴三阳的理论。所谓三阴三阳,即少阴、太阴、厥阴、少阳、阳明、太阳,其中厥阴、阳明是中医学独有的概念,所谓两阳合明,故曰阳明,两阴交尽,故曰厥阴。三阴三阳是从量上对阳阴的划分,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三阴三阳合称六经。

《内经》根据阴阳互根理论,又提出了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素问·阴阳



离合论》曰：“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开主外出，阖主入内，枢主内外出入，体现了三阴三阳分而言之，阴阳各有其经；合而言之，表里同归一气，既相互协调又各尽其职的理论。开阖思想显然源自《周易》。《系辞》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辟即开也。《系辞》认为，坤阴的功能是收敛包容，主入内，乾阳的功能是开放行动，主外出。

变 易

《周易》的中心思想，正如其书名所示，是讲变易的。所谓变易，通俗讲就是变化运动。对于“易”字，《说文解字》解释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而是盛衰消长的过程。后代学者一般认为，易有四义：简易、变易、不易、交易。《周易》认为，大到宇宙天地，小到草木昆虫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所以易之四义中的变易，是其核心。《系辞》有：“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变中又有不变，变易本身是不变的，变易与不易是对立统一的。变易即动，不易即静，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动静矛盾运动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法则。由于乾坤阴阳是事物发生发展衰亡的内在动力，所以虽然现象世界是品物流行的，但事物运动的法则性、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掌握的。掌握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就是所谓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人类掌握了易简的道理就能依理而行，成就事功。

《周易》认为，自然界是生化化、运动不息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人类与万物亦随着自然的生化节律而运动。《周易》运动观强调运动的往复循环性，这种观念成为支配中国人思维的核心力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奠基作用。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就是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述。这种生化运动是自天地开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正如《系辞》所云：“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周易》的变易之道为《内经》充分接受。“易”、“变易”之词屡屡见于《内经》，“易”在《内经》中有变易、交换、改变等意义。比如《素问·玉版论要》有：



“易，重阳死，重阴死。”王冰注曰：“女子色见于左，男子色见于右，是变易也。”又《灵枢·终始》有：“因而灸之，则变易而为他病矣。”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名词的使用，而是《内经》全书贯穿着变易的思想。《内经》认为，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动而不息”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和衰亡，都根基于运动，是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而运动中有静止，静止中有运动，动静的辩证转化决定了万物的生长化收藏。《素问·天元纪大论》认为，运动普遍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与人类之中。万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运动节律。个体生命有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人体的气血依昼夜十二时辰，从手太阴肺经到足厥阴肝经进行着如环无端的循环运动。疾病有着沿五脏、六经传变及“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运动规律。

更有意义的是，《内经》并不是一般地谈变易运动，而是结合医学特点发挥出一套气化学说。气化是气机活动变化的简称。气化一词见于《素问·气交变》大论》的“各从其气化也”。《周易》的运动变化产生万物的思想，为《内经》气化学说奠定了基础。《系辞》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特别是泰卦，乾下坤上，象征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气机理论的滥觞。《内经》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体都存在升降出入的气机循环运动。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讲自然界的气机运动。又说：“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这是讲人体的气机升降。《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布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这是讲脏腑的气机升降。最后，《素问·六微旨大论》总结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认为升降出入是万物存在的条件。

上面谈到，“易”字，还有易简一义。在《周易》看来，虽然世间万物纷繁复杂，但是其活动轨迹都能用由阴阳二爻组成的八卦及六十四卦来表达象征，卦象中蕴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正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周易》卦爻系统是对宇宙系统的简化模拟。《内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简易的观点，实际上，《内经》关于人体生理、病理



的理论是一种简化的模型理论。因为中医学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论，并不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对人体组织结构的解剖分析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对天地自然功能现象的长期观察，对人体的生理机能、病理改变的长期体验，根据天人同一的哲学信念，推天道以明人事类比而来，是简化的模型理论。这种理论的确能较正确地反映人的生理病理，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使中医学在二千年前的古代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影响至今，荫福后人。

“易”字的最后一义为交易，《周易》通过八卦的相互交错，表明世间事物是互相渗透、互相交织的，事物的运动发展不是孤立进行，而是互相联系的。《周易》不是一般地指出了万物的普遍联系，而是探讨了普遍联系的一般形式，即交易。交易通俗讲就是交通的意思。《周易》谈交通交易的地方很多，如泰卦，乾下坤上，象征天地气交，万物资生。《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归妹·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周易》认为，只有交通，万物才能化生。《内经》也认为，无论天地自然还是人体，都存在着交通交易的过程。如果交通交易过程受到阻抑，天地不能生化，人体就会发病。比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说：“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素问·生气通天论》有：“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说：“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反之，天地失于交通，就会出现“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风雨不节，白露不下……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情况。

象 数

“象”和“数”是《周易》研究之中一对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有必要着重阐释一下。

《易传》多次言象。《系辞》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可以说《周易》就是一部讲象的书。象在《周易》中有如下一些含义。

(1) 天象，即天的象。《系辞》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乃谓之象”，“天垂象，见吉凶”。



(2) 卦象,是对天地万物的模拟和象征。《系辞》在解说八卦产生的时候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3) 八卦取象。无论是宏阔巨大的天象还是系统整合的八卦卦象都可以取象为具有较强可感性或形象性的具体事物。在《易传》看来,在具体形象中尚也隐含着不可感的八卦意象,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谓“天下之赜”就是在事物的具体形象中的取象。《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显然圣人之意是由“象”来表达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这里的“象”、“易”已经不仅是具体的象,而主要是指其中隐含着的一般意象。

象不仅仅是静止之象,而且是运动之象。象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理解。所以在《周易》中,象是类分事物的根据,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里划分“类”的根据就是“象”,根据事物的象来从总体上划分。八卦就代表着八种基本的象,在《说卦》中,每一卦都代表一系列事物。以今天的观点看,古人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归为一类,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事实上,古人是从阴阳的角度将有同一类功能的事物归为一类。我们知道,分类是人类认识的基础,古人不是从有形的角度而是从无形的角度,依据八卦卦象对纷繁的现象世界进行了简约划分,起到了执简御繁的重要作用。

《周易》“象”思想贯穿于《内经》理论体系之中,是《内经》核心理论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医学基本方法——取象比类的基础。《内经》正是汲取了《周易》“象”的思想,结合阴阳五行理论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理论不是建立在解剖、生理学基础上的,而是运用《周易》观象、取象的方法,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之象的观察,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推导出人体的阴阳、五行之象。关于观象法,《素问·五运行大论》有:“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此基础上,根据天地之气的升降,类推人体之气的升降:“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灵枢·经水》则用自然界十二经水,类推人体十二经脉。在《素问·六节脏象论》之中,岐伯将五脏与阴阳、五行



联系起来,确立了四时五脏阴阳的整体医学模式。其根据就是五脏及其所属五华、五充等,与四时阴阳在运动功能之象上的一致。正如《素问·五脏生成论》所云:“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中医用望闻问切四诊诊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观象、别象的过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所以中医的辨证论治,本质上就是辨象论治。证就是疾病显露出来的形象证据。

《周易》中的数称为易数,包括天数、地数、大衍数、卦爻数、河图、洛书数等,这里探讨易数的一般意义及其对《内经》的影响。易数与一般数学显然有密切的关系,是在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与一般数学之数不同,它主要并不是用来计算,而是一种象征,它更多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质的而非量的特征,易数始终与易象相联系,是一种特殊的象。易数实质是在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理哲学。数在其中起到一种象征作用,这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某种相似之处。数与象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在易学史上一直存在象、数孰先孰后之争,本文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仅对象数的关系略加说明。上文已指出,象主要是对事物的运动状态的把握,是对世界本质的一种理解,而运动可以有万千种状态,对这种运动状态的把握必须将其静止化、简单化,这时就需要“数”,数将“象”形式化、简约化,正如《系辞》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阴阳之象、八卦之象、五行之象都蕴含着数,所以象、数密不可分,数是另一种象。《易传》中的天数、地数,将数与阴阳联系了起来,因为天为阳,地为阴,奇为阳,偶为阴。八卦布列八方,分别用一至八来代表,所以八卦中蕴含着数。一至十分为生数与成数两组,与五行相配,是为五行数。这样阴阳与五行、八卦又可以通过数联系起来。

在《内经》中,有两种数。一种是观察实测的数,包括对人体组织器官实测的数据,对疾病观察所得死愈之日数,针刺的次数等。另一种就是易数,它在《内经》中,起到理论架构的作用。《内经》将来自经验的零乱材料纳入易数体系,形成条理化的理论。《内经》中运用的有一至九,即所谓的天地至数和河图数、洛书数及九宫数。

《素问·三部九候论》曰:“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



生，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其下文具体地讲述了上部即头部、中部即手部、下部即足部各三处共九处诊脉部位。根据全息论的观点，人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理论上，诊察任何部位都可以获得疾病信息。《内经》之所以用上中下共三部九候来诊察人体疾病信息，无疑是受了数理哲学的简约化、形式化的影响。到了《难经》时代，更进一步简化为诊察手部的寸关尺三部脉象。《内经》对一至九的天地之至数的运用，都有论述，这里就不详细引述了。天地至数，在《内经》建构理论体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论作用。《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在《内经》作者看来，掌握了“至数”就能“道不惑”，可谓“明矣”，“简而不匮，久而不绝”。这无疑把“数”理解为宇宙运动的最基本规律。

河图数在《内经》中演变为脏象之数。《素问·金匱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其数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其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其数九。……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其数六。”《内经》脏象之数在运气七篇中亦有记载，见于《素问·五常政大论》。

洛书数在《内经》中演变为九宫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灾一宫”、“灾二宫”、“灾三宫”……“灾九宫”之说。《灵枢·九宫八风》有按文王后天八卦排列的九宫图，洛书九宫数，以一、三、七、九为奇数，亦称阳数；二、四、六、八为偶数，亦称阴数。阳数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气；阴数为辅，位居四隅，代表地气；五居中，属土气，为五行生数之祖，位居中宫，寄旺四隅。《九宫八风》阐明了“太一游宫”引起的四时八节及二十四气的节令转移和气象变化及对人体疾病的影响。天地至数、河图数、洛书数在《内经》中的具体运用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简化、象征认识对象是相同的，是一种简化的模型理论。

由上述可以看出，《周易》对《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上文仅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方面问题作了简要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内经》以及中医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当时的哲学思想《周易》阴阳



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由于《周易》与中医学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医易结合研究也成了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术著作很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进一步阅读、研究。

二、易学与中国古代人体科学

最近几年,中医在欧洲和美国都开始流行了。因为推拿之后“太舒服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放弃“公费”的西医治疗机会,愿意自己掏腰包到中医诊所去接受推拿。不久前,向来以严格著称的美国医学权威部门对针灸、拔火罐等中医治疗方法的疗效进行了认定,从而使得中医行医在美国合法化——要知道,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多数美国人都是把中医和巫术画上等号的,他们奇怪:一根小小的银针插到身体的一定部位就能够治病!一碗浑浑浊浊的中药汤——谁都不知道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分子式——就敢给病人喝?所以,他们宁愿相信这是心理安慰疗法,是现代巫术。

要知道,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在医疗技术最为发达的欧洲和美国,一样有很多很难治和治不了的病,小到失眠、皮肤病,大到癌症、中风、糖尿病,很多情况下西方医学拿它们都没有办法。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中医的治疗效果就非常显著了。而且,在西方医学至今还在这些疑难杂症的患病机理上夹缠不清之时,中医早就解决了这些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千年以前就解决掉了。

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人体科学,而且这门科学与《周易》关系密切——尤其是阴阳观念,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在《易经》中并没有关于阴阳的直接论述,但阴阳思想无疑是包含在《易经》中的。阴画和阳画是构成《易经》符号系统的最基本的要素,而阴和阳作为两个性质相反的东西,代表着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或趋势——当然从本质上来讲可以直接称之为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由于这两种初始力量或趋势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整个宇宙以及人类社会。《易经》作者用阴阳爻的不同组合构成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阴阳思想蕴含其中。《易传》显微阐幽,明确地揭示出阴阳大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认为宇宙间最基本的规律



就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对立统一的奇妙作用产生宇宙万物。

人，古人认为是一个魂与魄的结合体。当人在阳世气数耗尽、回归阴间时，形与神——魄与魂就要分离，这就是所谓的“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也就是说，魂的性质为“阳”，质性“清”，是一种“天气”，故而能上升于天；魄的性质为“阴”，质性“浊”，是一种“地气”，故而回归于地。

所以中医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壮大、衰亡的内在动力，是大千世界纷繁灿烂而又秩然有序的幕后指挥。对于人体而言，人体的奥秘全在于阴阳。

简单讲，中医把人体看作是与宇宙运行紧密勾连的“小宇宙”。

我是阴阳“小宇宙”

既然大宇宙是阴阳二气的不断运行，那么人体这个“小宇宙”当然也就是一团阴阳二气的连续运转了。

中医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就是说，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所有一切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

以人体部位来说，上为阳，下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以脏腑划分，则五脏（心、肝、脾、肺、肾）为阴，六腑（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阳。若再具体到每个脏，还有阴阳之分，如心脏可分心阳、心阴，肝脏可分肝阴、肝阳，肾脏可分肾阴、肾阳等等。

中医还按照人身整体的阴阳类型，把人分为太阴型、少阴型、太阳型、少阳型、阴阳和平型五类，这五类人精神状态不一样，筋骨气血也各有不同，具体来讲：

太阴型人，贪婪而不仁慈，外表谦逊而内心阴险，好得而恶失，喜怒不形于色，不通时务，动作、反应稍慢；

少阴型人，贪图小利，心思卑贱，好嫉妒，喜欢伤害别人，见到别人倒霉，心里就高兴，见到别人走运，就愤愤不平，心思急切，又忘恩负义；

太阳型人，爱出风头，喜欢自吹自擂，实际能力却很差，又好高骛远，做事冲动而不计后果，自以为是，死不悔改；

少阳型人，精细审慎，自尊心强，又有虚荣心，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到处宣扬，喜欢交际，不愿做默默无闻的平凡事；



阴阳和平型人，清心寡欲，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得失，识得时务，即使身居高位也很谦虚，能够以理服人，有协调、治理的才能。

再比如，《周易》里面用“六”和“九”两个数字代表阴阳二气的互相转化的极点，那么“七”和“八”两个数字就代表了阴阳二气的正常运行状态。就人体而言，女子内阳而外阴，男子内阴而外阳，所以，阳气在内的女子可以用数字“七”来表示，阴气在内的男子可以用数字“八”来表示。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女子和男子的生长规律就完全是按照“七”或“八”两个数字来的：

女子七岁，肾气开始旺盛，乳牙脱落，开始换牙，毛发生长。

女子二七一十四岁，肾气达到全盛，冲开血脉，所以开始有月事，可以怀孕了。

女子三七二十一岁，肾气平稳，真牙长成，骨骼发育完全，个子长到最高。

女子四七二十八岁，筋强骨壮，头发长得最好，身体最为健壮。

女子五七三十五岁，气血开始衰弱，面容开始枯黄，头发开始稀少。

女子六七四十二岁，面容全部枯黄，头发开始变白。

女子七七四十九岁，肾气衰竭，形容毁坏，月事断绝，也就不会怀孕了。

男子八岁，肾气开始充实，乳牙脱落，开始换牙，毛发生长。

男子二八一十六岁，肾气旺盛，精气充实，开始遗精，可以使女子受孕。

男子三八二十四岁，肾气平稳均衡，筋骨强壮，真牙长成，骨骼发育完全，个子长到最高。

男子四八三十二岁，筋骨壮盛，肌肉饱满、壮硕。

男子五八四十岁，肾气开始衰弱，头发开始稀少，牙齿也要出毛病。

男子六八四十八岁，肾气衰弱，面容枯黄，头发斑白。

男子七八五十六岁，肾气和肝气都很弱，形容枯槁，体力极弱，精液也很少。

男子八八六十四岁，肾气枯竭，头发和牙齿全部掉光。

所以说，男子八八六十四岁之后，女子七七四十九岁之后，精气衰竭，一般就不会再生育了。

除了早熟和早衰等特殊情况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男子八、女子七的规律来进行他们（她们）的人生旅途的，最多只相差一、两年。受这种生命大节



奏制约，儿童、少年、青春、壮年、老弱……人生的一个个阶段次第而来，人生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随之展开，上演着人间永不落幕的悲喜剧……

由此看来，人体这个“小宇宙”，也是清清楚楚地按照阴阳二气的运转规律来运行的了。

头痛不医头，脚痛不医脚

那么，疾病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句话：阴阳不和谐。

对于一个阴阳共处的整体而言，无论是阴盛阳衰，还是阳盛阴衰，都是异常状态；各种异常状态所表现出来的对应特征，也就是病症。

所以疾病的发生，从总的方面看就是人体中阴阳对立依存关系被破坏，失去正常的阴阳相对平衡状态，而造成阴阳偏盛或偏衰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人体正气和致病病邪两个方面。人体正气有阳气和阴精之分，致病病邪也有阳邪和阴邪之别。阳邪致病，就会出现阳盛伤阴的热症；阴邪致病，又会出现阴盛伤阳的寒症。阳气虚衰不能制阴，则出现虚寒症；阴精不足而不能制阳，则表现为虚热症。因此，中医总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从这个角度来说，治病也很简单。

一句话：协调阴阳，恢复和谐。

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即是导致各种疾病内在变化的基本因素，治疗疾病的原则是从调整阴阳出发，补偏救弊，促使阴平阳秘，恢复人体阴阳的正常状态。在临床上见到因阳热太过而耗损阴液者，给予寒凉药物以治其热，即“热者寒之”。因阴寒太甚而损伤阳气者，则给予温热药以治其阴寒，即“寒者热之”。若因阴虚不能潜阳而阳亢者，则需滋阴以潜阳，即“阳病治阴”。如阳虚不能制阴而阴盛者，则益阳以消阴，即“阴病治阳”。

据《史记·扁鹊列传》，春秋时代的扁鹊就用阴阳的对立给人解释病情、治疗病症，甚至把一个“死人”给救活了：

扁鹊行医到虢国，当时虢国太子刚刚病死。虢国大夫中庶子告诉扁鹊，虢国太子是因为“阳缓而阴急”而暴死。扁鹊说，那太好治疗了，只要把阴阳二气调整一下就好。于是扁鹊就给已经被抬进棺材里的太子针灸，太子当时就坐了



起来——死人活了！扁鹊于是名声大振，被奉为一代名医。

相对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水儿、药片儿、手术刀、放射线集中于病灶一点猛攻，中医就是更加高明的“头痛不医头，脚痛不医脚”——均衡协调，整体调养。准确来说，西医和中医不是一个层次的。虽然说西医也能够治病，但是相对于西医的强攻猛打的“蛮横”手段而言，中医更像是“调病”、“养病”，是促使病人恢复正常的和谐状态的“友善”帮助。

经络——枝干纵横生命树

一般来说，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通路系统，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分为经脉和络脉两大类。经脉的“经”，有路径、途径之意，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即主要通路。络脉的“络”，有联络、网络之意，是经脉的分支，错综联络，遍布全身。

实际上，经络是人体之中的阴阳二气流转循环的通路。

人的所有活动，都与阴阳二气在经络中的运行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经络，或者说是没有阴阳二气，人就不成其为人，那就是死尸了——准确讲这个过程叫“阴阳分离”，就是死亡。

所以说，经络是人体生命之树，而且是枝干纵横的生命之树。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棵生命之树的结构：

人体生命之树，可以分为主干、支干和枝叶——经脉、络脉及其连属部分三部分。

(1) 主干——经脉。

经脉主要有正经、经别和奇经三大类。

正经有十二，故又称“十二正经”或“十二经脉”，是人体里的阴阳二气运行的主要通道。十二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体，直接与相应脏腑联通。包括手三阴经（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手三阳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足三阳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足三阴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

经别，是从十二经脉别出的重要分支，又称“十二经别”。

奇经有八条，即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合称为“奇经八脉”。



(2) 支干——络脉。

络脉,是经脉的小分支,有别络、浮络、孙络之分。别络是络脉中较大者,有本经别走邻经之意,一般认为别络有十五支。孙络,是最细小的络脉,属络脉的再分支,分布全身,难以计数。浮络,是循行于人体浅表部位,“浮而常见”的络脉。

(3) 枝叶——连属部分。

经络中有许多细小分支,它们对内连属各个脏腑,对外连于筋肉、皮肤,称之为经筋和皮部。

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为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具有连缀百骸、维络周身、主司关节运动的作用。

皮部,是十二经脉功能活动反映于体表的部位。

“子午流注”、“神龟八法”——生命树的奥秘

生在宇宙中,长在宇宙中,这棵生命之树,自然与宇宙的运行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人体阴阳小宇宙的概念才更加清晰。所以说,人并不仅仅是那一百来斤阴性物质——骨、肉、血,还有在经络里流转循环的阳性物质——没有了它,人要完成一个简单的举手动作都会非常困难,甚至连站立起来都几乎没有可能。

对应的,中医里的切脉和针灸,就是根据人体的经络而来的。不理解人体经络的运行状况,用切脉和针灸对疾病进行诊疗也就谈不上了。反过来说,如果对人体经络和阴阳二气的运行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治疗疾病也简单得很。

《周易》里说阴阳盛衰消长变化,人体里的阴阳二气在经络里流转变换专门有一个名称,叫做“子午流注”。就是说,在一天里的每一个时辰,人体里的阴阳二气在经络以及脏腑里流转的“波峰”就出现在某一个脏腑处:

子——胆,丑——肝,寅——肺,
卯——大肠,辰——胃,巳——脾,
午——心,未——小肠,申——膀胱,
酉——肾,戌——心包,亥——三焦。

当然,人体里的阴阳二气在经络以及脏腑里流转的“波峰”也会出现在某一



个经脉相交的穴位处，这就是“神龟八法”——就是说，在人体之中，奇经八脉与正脉相交的八个点对应着八个重要穴位：

坎卦——穴位“申脉”，
 乾卦——穴位“公孙”，
 兑卦——穴位“后溪”，
 坤卦——穴位“照海”，
 离卦——穴位“列缺”，
 巽卦——穴位“临泣”，
 震卦——穴位“外关”，
 艮卦——穴位“内关”。

“子午流注”和“神龟八法”与《周易》理论相通，都是针灸治病的大法门，非常有用。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神医”，像扁鹊、华佗、仓公等，都有很多成功病例，现在听起来也很神奇。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医的原则是不变的——阴阳二气，经络运行，以及下面所说的五行运化。

五脏六腑——五色斑斓大转盘

一般来讲，阴阳和合可以化生出五行，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应用上，五行与《周易》中的阴阳观念联系十分紧密。要更好地理解阴阳观念，就不能不再来简单说一说中医中的五行。

自然界里有五行，人体之中也有五行。五行可以再分为阴五行和阳五行。总体而言，五行之气分别——对应着五种颜色，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讲，人体之内运化着的五行之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五色斑斓的大转盘——这就是中医所理解的生命的运动。具体而言，五行之气与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如下：

青色——木气——肝（阴）、胆（阳）——春季
 赤色——火气——心（阴）、小肠（阳）——夏季
 黄色——土气——脾（阴）、胃（阳）——长夏
 白色——金气——肺（阴）、大肠（阳）——秋季
 黑色——水气——肾（阴）、膀胱和三焦（阳）——冬季

汉文帝时的医生仓公说老师教他“五色诊病”，就是说五脏都有颜色表现于



面部,从面部的颜色情况就可以推断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健康与否——相对于人面部的五色斑驳,人体的内部器官就像是一个五色斑斓的大转盘了。

中医五行学说以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说明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人体内部结构的模式。

(1) 相生规律: 木→火→土→金→水→木,五行以次孳生,循环无尽。

(2) 相克规律: 木→土→水→火→金→木,五行相克也是往复无穷的。

(3) 相乘规律: 属于过度的相克,它与相克顺序上一致,但是克制的力量超过了常度,因而会破坏事物内部的平衡协调。

(4) 相侮规律: 有恃强凌弱的意思,属于反方向的克制。如水克火,但火势过大,水势太小,此种情况,水反而被火烤干,金克木,金弱木硬,金不能胜木反而毁损。

总之,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维持了人体五脏六腑的整体平衡和稳定;五行相乘、相侮则意味着五脏六腑失去了整体的平衡和稳定。相生、相克属于正常,相乘、相侮属于失常,人体就要生病了。

如,相互资生关系: 肾精滋养肝血,使之保持充沛,这就是水生木;肝藏血以济心,充养心血,这就是木生火;心阳温脾使之健运,这就是火生土;脾化生水谷精微以养肺,这就是土生金;肺司肃降,通调水道,助肾主水,这就是金生水。

如,相互制约关系: 肺气的肃肃下降,可以抑制肝的升发太过,这就是金克木;肝的疏泄作用,使脾之运化免于壅滞,这就是木克土;脾对水液的运化传输,可制止肾水泛滥,这就是土克水;肾阴上济心阴,以防止心阳亢盛,这就是水克火;心阳的温煦,可以制约肺气的肃肃太过,这就是火克金。

五行生克理论是中医的重要原则,根据这种规律进行治疗,往往可以迅速起效。这就是《周易》里所说的“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就是说,减损疾病,必须迅速,才会有可喜的结果,不会有灾难。

“五行六气”与人体

阴阳二气在地是五行,在天则是寒、暑、燥、湿、风、火六气,二者合称“五行六气”。它们在人体中是如何互相作用的呢?

六气的变化,在天的话使得天能够保持无穷的力量,在人的话使人能够了解事物变化的规律,在地的话则使地能够生化万物。地有生化,化生五味;人了



解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生出智慧;天有无穷的力量,就能运动不息,从而产生五行六气。

在天表现为风气,在地是木,在人体是筋,在物体的特性上表现为柔和,在人体内脏是肝。

东方是风木之气生发的地方,风气能使在地的木气生长,木气化生酸味,酸味滋养肝脏,肝阴肝血滋养筋脉,肝与筋脉和调则心气旺盛。凡是温暖的特性,谦和的德行,运动的作用,青的颜色,象征万物荣茂的力量,有毛的动物,生发宣散的时令,这些均属于风木之气。风气的异常变化能使万物遭受摧残,植物的枝叶陨坠。气味中的酸类,怒的情志变化亦属于木。过怒则伤肝,而悲可抑制怒;风气太过可损害肝,燥气能克制风气;酸味太过会伤害筋,辛味能抑制酸味。

南方炎热,能助长在地的火气,火气生苦味,苦味滋养心脏,心生血脉,心血和调则滋养脾气。所以六气的变化在天表现为热,在地是火,在人体为血脉,在功能上表现为使物体生长,在内脏是心。凡是炎热的性质,显露光华的德行,躁动的作用,赤的颜色,是万物繁茂的力量,有羽毛的动物,日照当空地气上蒸的时令,这些均属于火热之气。其异常变化是使万物焦炙枯槁好像火烧一样。气味中的苦,喜乐的情志变化亦属于火。过喜则伤心,而恐可抑制喜;大热伤气,寒能抑制热;苦味太过伤气,咸味能抑制苦味。

中央化生湿气,湿气使在地的土气生长,土气生甘味,甘味滋养脾气,脾气滋养肌肉,脾与肌肉健壮则肺气旺盛。所以六气变化在天是湿,在地是土,在人体是肌肉,在功能表现为使形体充实,在内脏是脾。凡是安静能容纳万物的特性,濡养润泽的功能,化生万物的作用,黄的颜色,能使形体充盛丰满的力量,裸体的动物,平静、云雨及时的时令均属于湿土之气。其异常变化为骤雨急下或淫雨连绵,乃至发生河水泛滥等灾害。五味中的甘,情绪变化中的思虑亦属于土。思虑太过则损伤脾,怒能抑制思;湿气太过则伤肌肉,风气可克制湿气;甘味太过亦会伤脾,酸味能克制甘味。

西方产生燥气,燥气能助长在地的金气,金气生辛味,辛味滋养肺气,肺能滋养皮毛,肺与皮毛强健则肾气旺盛。所以六气的变化在天表现为燥,在地为金,在人体是皮毛,在功能上表现为收成,在内脏是肺。凡是清凉的性质,清静的德行,保卫的作用,白的颜色,象征收敛的力量,有介壳的动物,肃杀坚劲、雾露下降的时令,均属于燥金之气。其发生异常变化,则使万物生机减杀,甚至发



生枝叶枯萎凋谢的灾害。气味中的辛味,情志变化中的忧亦属于金。忧愁太过则伤肺,而喜乐可抑制忧愁;热气太过会伤皮毛,寒气克制热气;辛味太过能伤皮毛,苦味可克制辛味。

北方产生寒气,寒气能使在地的水气生长,水气生咸味,咸味滋养肾,肾精滋生骨髓,肾精骨髓充盈能滋养肝气。所以六气的变化在天是寒,在地为水,在人体是骨,在功能上表现为使物体坚固,在五脏是肾。凡是凛冽的性质,寒冷的特性,贮藏的作用,黑的颜色,使物体肃静的力量,有鳞片的动物,清静、寒冷有冰雪的时令,这些均属于寒水之气。其异常变化,是剧烈的寒冷,甚至冰雹霜雪非时而下。气味中的咸,情志变化中的恐亦属于水,恐惧太过会伤肾,思虑能克制恐惧;寒气太过会伤害血脉,燥气能克制寒气;咸味能伤害血脉,甘味可克制咸味。

所以,各种各样的病症都是有其原因的,而且很多病症是与“五行六气”的运行相关联的。对于这样的病症不用治疗也会痊愈,这就是《周易》里所说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就是偶尔得病,不胡思乱想乱投医,不吃药也能恢复健康。

中西医能够结合吗

很明显,中医和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体观”——与中医眼中生机勃勃的“小宇宙”不同,西医更像是把人体看作是一堆零件组成的“结构精致”的机器。这种根本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医和西医在对疾病的治疗方法上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

就内科而言,一个疾病的产生,在中医看来是人体的阴阳和谐状态被打破——内有情志所伤,外有风寒入侵。疾病的产生也往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日积月累,身体元气逐渐衰弱,就“病来如山倒”了。这时候,就要“养病”,让不平衡的身体恢复和谐,让人体功能恢复正常运行,所以要培植元气,调整五脏,疏通经络,排除外邪……“疏通经络”可能很快完成,立竿见影,“调整五脏”、“排除外邪”都可以很快见效,但是“培植元气”的这个工作,就要慢慢来,要慢慢保养了——这就是“病去如抽丝”。

而在西医看来,内科疾病的产生,就是病灶那一块儿,或痛或肿,或麻或胀,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一层层追究,追到底就是基因突变、基因遗传。



西医怎么治疗呢？

一句话，“见招拆招，见式破式；攻其一点，不计其他”。

你不是肿吗，我用抗生素给你消肿，直到病人的身体产生抗药性。你不是肾坏掉了么，我给你切掉换一个。你不是多长了一块肉吗，管他是肿瘤、癌症还是息肉，先用刀切掉；什么，扩散了？那就用“化疗”，就是给你天天吃毒药，药你个半死不活；再不行，那就最后一招——用放射线“放疗”，来个“细胞大屠杀”，直到“玉石同焚”、“同归于尽”……

当然，西医也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比如青链霉素对肺炎的特效，预防接种技术对天花的完全消灭，但是，西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他”，这与以“整体阴阳协调”为主旨的中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二者的治疗方法也常常是反向的：一个注重整体协调，使人体趋向平衡，一个强力干预，使人体趋向不平衡——这两种方法的效果往往是互相悖反的。这就决定了中西医结合不会有很高的疗效。

正如《周易》的《系辞》里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根本上来讲，中医是“形而上”的，它和“形而下”的西医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勉强拼凑在一起也是疗效堪忧。

三、健康长寿在阴阳

养生是人生的一大主题——只不过对于这个主题，人们往往将其排在事业、家庭之后，对其重要性的认知一般也较晚。很多情况下人们都以为养生是老年人的事，是退休后的事。实际上，一个正处于青壮年的人如果不注意保养身体，很容易很早就病痛缠身，那么这时候再辉煌的事业、再美好的家庭也会黯淡无光以至于危如累卵，甚至变为空中楼阁。正所谓，失去健康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健康可是用金钱换不回来的。所以养生绝不是老年人无所事事的选择，而是保有健康最重要的手段，是人生幸福第一块基石——养生，一定要赶早。

那么一般来讲养生应该从何时开始呢？

俗话说，三十岁前人欺病，三十年后病欺人。一般而言，人过三十，少年时的心气与体力都没有了，就开始会感到身心的疲惫，气机一弱就会感到身上积



累的病痛，所以最晚从三十岁开始，养生就应该成为生活的重点关注内容。对于女性而言，至少应该再提前十年，即从二十岁左右开始注意了解养生保健的系统知识。

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养生的知识，这些养生知识是中华民族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一个基本保证，而细细推究这些养生知识可以发现，它们都以《周易》阴阳理论为核心内容。

为什么早睡早起身体好

从小到大，我们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么，为什么早睡早起身体好呢？

所谓“早睡早起”用古语来讲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周易》阴阳理论之中，太阳是阳，月亮是阴，白天是阳，夜晚是阴。而人是秉持阳气而生的动物，所以人的作息规律应该与太阳的运行规律相一致：太阳出来我就工作，太阳下去我就休息。这样一来，人与天地之间的阴阳运化达到了和谐一致，人身体里的气机运化就非常顺畅而没有阻碍，这样人工作的时候有力气、有精神，人休息的时候睡得香甜、心神安稳。这样的一种和谐状态保持下去，长此以往，人自然而然就少得病、不得病，活得长、活得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既长寿又健康。所以古人认为按照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状态，人人都应该能够活到一百多岁，确切讲就是两个甲子，即一百二十岁左右。

所以根据《周易》阴阳理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养生的第一大法则。这也就与《周易》乾卦九三爻辞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忤）若”的含义有些接近。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却往往违背了这种规则，人们习惯于开夜车创作，或者在晚上拼命加班，或者是看电视，然后抱着一大堆情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即使是睡着了也梦境不断……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吃完晚饭，太阳一下山就开始寻欢作乐：泡吧、上网、跳舞、唱歌、购物、听音乐会……半夜里再吃一顿夜宵，接着闹腾，一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肯上床睡觉，一觉睡到中午日上三竿，才睡眼惺忪地起床，然后说昨晚没有睡好，一直到下午也没有什么精神……而到了夜里，又再度亢奋起来。

这样长期阴阳颠倒的结果就是：精神不足，注意力不集中，身体消瘦，脸色



不好，内分泌失调，很容易罹患感冒、发烧等流行病症，这就是在与《周易》阴阳规律唱反调，完全走到了养生的反面。这样的人失去健康、罹患病痛，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

实际上，古人早就根据一年之中阴阳二气的运行规律总结出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经典作息规律。

春天阳气生发，草木开始生长，这时候人应该晚睡早起，就是晚上九十点钟上床睡觉，早晨五六点钟起床。起床之后，缓缓散步，以养肝气。散步半小时到一小时，衣帽要宽松舒适，以不冷为限。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安排一年活动的时期，人的心气足，正适合做谋划。在生活中要顺从春天发生的气息，尽量不要杀生，多给人提供方便，不要轻易动刑罚。如果与春天发生的气息相违逆，就会伤肝气，夏天就会得寒症。

夏天阴阳之气交合，草木茂盛，这时候人应该晚睡早起，就是晚上九十点钟上床睡觉，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夏天日照长，气温高，人也就应该适当地晒太阳，流流汗。夏天火气大，容易心烦，这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发怒，尽量使心情舒畅。调整心态，心志高远，使得气息能够发散出去，这样可以面色红润，精神健旺。如果与夏天的气息相违逆，就会伤心气，秋季会发肺病，冬天也会得重病。

秋天阴阳之气收敛，草木结实，这时候人应该早睡早起，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上床睡觉，鸡鸣即起，即早晨五点钟起床。与秋天的收敛之气相应，人应该尽量使心志安宁，尽量减少思虑，静养身心，收敛神气。如果与秋天的气息相违逆，就会伤肺气，冬天就会有饮食方面的病症。

冬天天地隔绝，阴阳闭藏，这时候人应该尽量减少活动，不应该劳动身体阳气。人应该早睡晚起，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上床睡觉，早晨七八点钟起床。为了避开寒气，一定要见到日光才起来。这时候人应该心志藏匿，心满意足。要多休息，多养神，避免因劳累而出汗。冬季应该避免风寒，注意保暖，千万不能使皮肤暴露在外，被风吹到。如果与冬天的气息相违逆，就会伤肾气，春天就会得重病，非常虚弱。

古人总结，如果不按照这些作息规律，人就会容易得病，而且这些病症往往是在下一个季节发作出来：春季得病，夏天发作；夏天得病，秋季发作；秋天得病，冬季发作；冬季得病，春天发作。这就完全违背了养生的道理，不仅失去健



康,而且减少寿命。

就阴阳二气而言,古人还告诫人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夏两季人要多动,秋冬两季人要多静,这样才能阴阳和谐,无灾无病——这也就是《周易》里所说的“出入无疾”了。

炎炎夏日当心阴寒入体

接下来谈谈饮食的阴阳协调问题,问题主要是出在夏季的冷饮上。

根据《周易》阴阳理论,温热为阳,寒凉为阴,关于这一点,相信只要是稍微有些知识的人对此都不会有什么疑虑。春夏是阳,秋冬是阴,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就有人会问:夏天吃冷饮,似乎应该是阴凉缓解阳热,也就是阴阳协调,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还真不少。

首先,夏季不应该吃太多冷饮。

夏季虽然属于阳,但是阳中还有阴,而且人本身就是喜阳避阴的动物。就人体而言,外为阳,内为阴——外面是暑热,赤日炎炎,人的气血都被调到外面去排汗降温去了,这时候的脏腑气血减少,肠胃的温度就比较低,基本属于不设防的状态。这时候你如果大吃冷饮,就是奇兵突出,直抄后路——人体就不得不从排汗降温的前线调气血回来救急,如果抢救不及,寒气就会侵入脏腑,人就要得病了——轻的要拉肚子,重的阴寒之气就要入体,成为病症。

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人刚刚跑完五千米,大汗淋漓,非常口渴,这时候面前有人递过来一瓶冰水……只要他咕嘟咕嘟地喝下这瓶冰水,他以后就再也不用跑五千米了,立刻病倒!没有第二种可能。

所以,冷饮以及各种寒凉之物,比如冰啤酒、冰西瓜,在夏季应该尽量少吃,最好不吃。特别是啤酒、西瓜之类的东西,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要特别当心,最好等一会儿再吃。

其次,寒凉体质的人,身体弱的人,以及病人、老人、肠胃不是很好的人,都不应该吃冷饮。

寒凉体质的人身体寒气重,冷饮的寒气更重,冷饮一吃进去,立刻就发作,人就抵挡不住,非常容易生病。身体弱的人、病人、老人身体阳气不足,也往往抵挡不住冷饮的阴寒之气,所以这些人都不应该吃冷饮。肠胃不是很好的人,



往往消化不了这些寒凉之物，所以也不应该吃冷饮，否则就是自找麻烦。

反过来说，身体特别壮、阳气强盛的人，是比较适宜吃一些冷饮的。另外就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是中医所谓的纯阳之体，阳气特别足，所以可以吃一些冷饮。当然，这也要有个度，过度仍然会出问题。

同样的，在夏天吹空调也要适度。从生发寒凉之气的角度来看，吹空调也就相当于吃冷饮，只不过吹空调是寒凉之气生发于外，而吃冷饮是寒凉之气生发于内，二者都可能在您正觉得舒服的时候给您种下引发病痛的祸根。

所以，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夏季就是应该让身体内的阳气生发出来，适当地晒一晒太阳，多出一些汗，这都对身体有好处。就饮食而言，应该是温度适中，与室内的正常温度一致为宜。

现代养生的误区

现在是商品社会，商业逐利的本性与传媒的力量相结合，对广大民众的养生保健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这些都是商业阴谋也许过于刻薄，毕竟还有那么一些人需要这些形形色色的保健品。但是那些打着“科学”幌子的所谓保健品、保健方法，实在是令人齿冷。

比如所谓的补钙、补铁、补锌、补充维生素的各种药片，有些病人或许是需要的，但是就一个健康人而言，服用这些都是心理安慰大于实际效果。所谓“生生之谓易”，人秉持天地阴阳之气而生，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在人的饮食之中已经足够，其些许不足只是人体阴阳不平衡的一些表现而已。对自己的身体长期不注意保养，舍本逐末地依靠服用药片补救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所以要认清保健食品背后的商业炒作，要对养生与保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周易》阴阳理论加强学习，千万不能跟风跑、随风倒，广告上说什么就信什么。

中国老百姓，我们吃的亏还少吗？



第八日

天人合一的独特智慧

——《周易》与建筑、风水

一、《周易》与古今建筑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你一定会对一个上圆下方的建筑印象深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博物馆了。那么，上海博物馆为什么要修建成这种上圆下方的样子呢？只有对中华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的回答。

原来，上海博物馆的这种非常独特的造型取自中国传统的“天地方圆”的理念。下面的方形象征着地，上面的圆形象征着天。而且，这个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天地方圆”的理念的源头，就是《周易》。在《周易》里，乾卦代表天，它运行不息，周而复始，就像是一个圆环一样；坤卦代表地，它静止不动，四方延展，就像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矩形。

此外，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标志性的建筑设计是“鸟巢”与“水立方”，其设计造型同样取自“天圆地方”这一古老的理念。“鸟巢”与“水立方”，其造型，一为圆形，一为方形。根据《周易》来看，都同样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理念。

所以说起《周易》与古今建筑，这里面的事情还真是不少。

住在洞穴里的日子好不好

在解说《周易》的《系辞》里说道：“上古穴居而野处”，就是说上古的时候，先民们都没有房子住，他们的住宅就是一些洞穴，夜晚的时候就钻进去睡觉，白天的活动都是在野地里，有时候还可能露宿野外。现代考古学的发掘研究证实了



这一点。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上古时代普遍存在着穴居的居住方式，而这种用来居住的洞穴，就是最早的建筑了。

那时候虽然黄河水与现在的一半水一半沙不同，河水还非常清澈，但是冬季的气候与现在差不多，还是比较寒冷。很快，天然形成的洞穴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为了冬天保暖，也为了躲避风雨，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广泛采取了人工掘洞的办法——就是在黄土坡壁上或深或浅地挖一个洞穴，前面用树枝树叶遮挡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几千年前的安居工程。黄土高原上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窑洞，就是这种穴居的现代样式。由于黄土易于挖掘，黏固性又比较强，再加上北方土壤水分少，所以窑洞里冬暖夏凉，很适合居住，是最为简陋的节能建筑。当然，如果是在平地上的话，这个洞穴就不是那么容易挖了。先民们也有办法，他们直接向下挖掘，挖出一个深坑，上面用枝条盖个架子，盖上茅草，也就成了一个“穴”。

《周易》的卦爻辞里有两处说到穴居。需卦的六四爻辞有“需于血，出自穴”，上六爻辞有“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里的“穴”，就是现在的房屋住宅。出门叫“出自穴”，进门叫“入于穴”。为什么有“不速之客”来呢？原来那时候民风纯朴，出门旅行一般都要借宿在别人家里，所以晚上旅行者就随便找户人家投宿，对主人来讲，这就是典型的“不速之客”。按照风俗，主人也要以礼相待，照顾一番。

这就是最早的建筑设计图吗

在《系辞》里说过“上古穴居而野处”之后，又有“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是说真正房屋的出现是在穴居很长时间之后，由一个智者——圣人发明的。

想象一下，先民们居于洞穴之中，或在野外露宿，遇到雷雨交加，或是风雪严寒，在野外露宿就苦不堪言，在洞穴之中也不能幸免——试想，这些临时性的树枝茅草又哪里能挡得住狂风暴雨呢？先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发明房屋以避风雨。发明房屋的创意据说是来自《周易》的大壮卦。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周易》的大壮卦的卦象来看，上卦震为栋，下卦乾为宇——上面有一根大木作梁，架空，下面就可以支撑出很多空间来，人们所需要的，不就是这个空间嘛！这么说来，大壮卦就是最早的建筑设计图了。



有了建筑设计图，就可以开始修建房屋了。最古时候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的，所以修建房屋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房梁架设好。栋，是木架结构房屋的主梁，它要承载房顶的所有重量，所以它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房屋的使用寿命。如果它的质量不好，在承受房顶的重量时会发生变形，就是向下弯曲——对于这种情况，在《周易》的大过卦里称之为“栋桡，凶”。这种情况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就会发生房倒屋塌的危险。但是，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有的房梁架设一段时间之后，它所承受的房顶重量不仅不会使它向下弯曲，它反而向上隆起，这种情况就非常好。因为它的隆起是由于自身的密度结构，不是因为承受重量，这也就说明这根房梁承重能力很强，可以完全放心了——对于这种情况，大过卦里称之为“栋隆，吉”。

古人房屋的内部分隔与装修

在《周易》的同人卦中有建筑中的“门”、“户”的文字。其初九爻辞：“同人于门，无咎。”坎卦中有建筑中的“牖”（窗）的文字。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樽是古代的酒器，簋是古代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器皿，缶是古代盛水的瓦器。牖在古代是指窗户。夬卦等卦中有建筑中的“庭”的文字。夬卦辞：“夬，扬于王庭。”《明夷》卦六四爻辞：“于出门庭。”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九二爻辞：“不出门庭，凶。”艮卦辞：“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易经》的卦爻辞来自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而《易经》卦爻辞中这些关于建筑的文字，已经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的雏形。

从《周易》的记载来看，很早的时候，我们祖先居住的房屋就有了内部分隔，而且这种分隔还是基于功能上的需要。在姤卦的爻辞里面有“包有鱼”、“包无鱼”的说法。“包”就是庖，就是厨房，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把生火做饭的厨房与日常起居的房间分隔出来单独使用。丰卦的爻辞有“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丰其沛”等，这里面的“屋”是指整个儿建筑，“家”是指住人的房间，也就是现在的卧室。“蔀”是凉席、竹帘之类的东西，“沛”是织物制成的幔帐，“丰”就是装饰的意思，所谓“丰其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装修房子。其中的卧室要特别装饰，所以要用竹帘把窗口和门户遮挡一下，挡住风雨，还要用幔帐把卧室里面好好装饰，既可以遮挡阳光，又可以防止蚊虫进入——丰卦说的是商人的住宅，所以是豪华装修！



九五至尊，皇家气派

由于《周易》用“九”来表示乾阳，所以“九”就成为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某种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专用数目；而《周易》的爻象里位居第五的阳爻称为“九五”，因为古代有很多学者把“九五”当作是最好的爻象，《周易》的乾卦九五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也是象征帝王大吉大利之辞，所以“九五”后来就成为古代皇帝们的专有名词，中国古代帝王也就被称为“九五至尊”。

在古代，“九”的应用太多了，比如周朝天子的国都，要方圆九里，城中南北向的和东西向的大路各九条，每一条路都要有九辆马车并行的宽度。周朝天子的后宫里面有九间内室，九个嫔妃每人分一间。周朝天子还把国土分为九份，九卿每人治理一份，定期汇报。按照从古到今的制度，天子的宫殿前面要有九座大门，相应的宫殿里面的院落也分为九进。

再比如明清两朝国都的所在北京城，它的内城有九座城门和九座旗炮房，城内外还有九座皇家祭坛。城内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高度都是九丈九尺，建筑格式都是九开间，有的九开间建筑每间还有九根柱子。紫禁城的四座角楼都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道脊，合计为九十九。故宫房屋有 9 999 间，皇城每扇大门的门钉都是九行九列，是“九九”之数。与“九”相搭配，“五”也很多。比如皇城正门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上有五座桥，对应着这五座桥天安门有五个门，天安门还有五阙，进深五楹。端门也有五阙。午门上面的重楼有五座，叫五凤楼，南北深五楹，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金水河“御路桥”上，在玉石栏的望柱上，都雕刻着蟠龙形象，金水桥南还有一对蟠龙华表分立两旁，显得壮观、华美异常。天安门的城楼为九脊重檐歇山庑殿顶，称“鸱吻”，具有“跃龙于瓦甍”的宏伟气势。这“鸱吻”相传为龙生的九子中的一个，属水、好望饰与屋背以镇火灾，取五行说中“水克火”的含义。又如天安门的东梁枋上，也绘满了金龙彩画，那龙的形象，如跃渊飞升，驾雾腾云。华表亦称为“谤木”，后来发展成为路标，终而成为象征性的建筑艺术性的装饰。天安门前的华表，其柱身为层层浮云，回环往复，云层中盘绕一条巨龙，腾空而上，给人们以云望天的感觉。再如北京故宫，简直是龙的世界。这里的殿堂、石雕、宝座、服饰以及一切御用之物，都以龙为饰。故宫饰龙之多，难以尽数，据说故宫有千万间，以每殿的六条背龙计，已有近六万条龙。金銮殿是帝王宝座，当然是雕龙



之物，太和殿六根蟠龙金柱，太和殿的藻井也是龙饰，故宫每座大型宫殿前的墙垛石阶，同样还是云龙石雕。此外三大殿台上的栏板也全部以龙凤纹饰，这种关于龙的建筑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来自《周易》，特别是来自“天下之至健”的乾卦旨意。

故宫，数不胜数的《周易》应用

在紫禁城里面，皇帝、皇后居住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名字也和《易经》有关。《周易》说，“乾”象征“天”，代表“君主”，天的特性是“清”，所以君主主要住在乾清宫；“坤”象征“地”，地的特性是“宁”，代表“后妃”，所以后妃要住在坤宁宫；“泰”字意为“平安、畅通”，交泰殿的意思即为《周易》中的“天地交泰”，暗示帝后关系和谐、美满。《周易》的《彖传》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在故宫的中心部位，是故宫三大殿之一的太和殿，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金銮殿，它的名字“太和”就源于这句话。

《周易·说卦》有：“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这就是说乾为天在正南，坤为地在正北，离为日在正东方，坎为月在正西方。与先天八卦方位对应起来，古人就将天坛建在北京古内城的南方，将地坛建在北方，将日坛建在东方，将月坛建在西方。而且皇城的四个门，南为天安门，北为地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周易》“天圆地方”的理念，天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圆形，地坛的建筑特点为方形，日坛的建筑特点为圆形，月坛的建筑特点为方形。天坛内的主要建筑圆丘周围有四个门，东门是泰元门，南门是昭亨门，西门是广利门，北门是成贞门，这四个门名称中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就取自于《周易》中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

所以说，在古老的紫禁城里，隐藏着数不清的《周易》“数”的应用，这些应用的合理之处在哪里？迷信之处又在哪里？这需要我们这些后来人仔细研究了。

八卦村中摆八卦

在浙江兰溪，有一个号称“华夏一绝”的八卦村，其建筑完全是按照《周易》中的八卦格局来进行规划建造的，是真真正正的八卦村。

在这个村落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的小池塘，以这个池塘为核心，有八条呈放



射状的巷子，村中 1 200 户人家就是这样分布成所谓“内八卦”的样式。村外还有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形成所谓“外八卦”的格局。而且，这个村落中的人都姓诸葛，是三国时候诸葛亮的后裔，据说是在七百年前迁移到这里来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孔明先生的后裔们铭记祖先的教导，过着安宁和谐的生活。

“在中国建筑史上尚属孤例”的八卦村，看来还真不简单。

二、《周易》与中国古代风水文化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风水，是《周易》理论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建造和家居摆设以及墓葬设计建造的全方位应用。风水，又有堪舆、卜地、卜宅、相地、相宅、图宅、青鸟、青囊、形法、阴阳等十几种名称，这十几种名称的内涵稍有差异，意义各有侧重，但是这些细微差别对于现代人来讲可以忽略不计，大可一概称之为“风水”。

那么，“风水”是怎么回事呢？

总体而言，《周易》讲，人在宇宙的阴阳二气之中生活，人与阴阳二气的关系，就像鱼之离不开水，鸟之离不开空气，人无时无刻不在与阴阳二气打交道。而风水，就是讲人与周围环境里阴阳二气的运行如何和谐相处的学问。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都要与所处的阴阳二气气场和谐相处，与周围的气场运行相适应，否则就要犯错误，出事情，有麻烦，遭灾难。

当然，对于风水这样有很大争议的文化传统，我们一方面要去其糟粕——把那些迷信内容一一剔除，另一方面也要取其精华——把其中可以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表述和理解的内容挖掘出来。至于到底里面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这可就需长期研究、反复实验了！

简单来说，从“风水”的得名来看，它就是要强调“风”和“水”的作用；而作为《周易》八卦里两种基本的物质存在，“风”和“水”在风水理论里也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简单讲，“风”使气发散、流动，“水”使气集聚、息止。



什么是风

什么是风呢？

风是气的流动，气朝一定方向的流动，就产生风。

注意，这里所说的“气”，一般不仅仅是指空气——这种氮气和氧气大分子微粒组成的气体，还要包括阴阳二气——细小的阴阳物质微粒、超微粒组成的“气场”。

在《周易》里，用巽卦代表风。巽卦的上面是两个阳画，下面是一个阴画，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日常所感知到的空气流动的风，它只是真正的风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就是巽卦下面的那一个阴画。而巽卦上面是两个阳画所代表的风，虽然在我们日常所感知之外，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代人称之为“天罡”，或者是“罡风”。

总体而言，阴阳二气的“风”是有流动规律的，它使得一定区域的气场按照一定规律分布。从宇宙统一场这个角度来看，各个部分的气场是通过“风”，特别是“天罡”来协调共振，从而达到其分布的规律性，而洛书九宫图，就是对这种一致性的集中概括。

具体对人而言，阴阳二气的“风”就更加重要，过于猛烈的风是有害的——中医里面说得好，把它叫“风邪”，告诫我们“避风如避箭”——因为猛烈的风会使人体里阴阳二气的正常运行发生异常，最简单的比如“中风”、“发热”，长时间猛烈的冷风更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对人的居住环境而言，好的“风水”的首要一条，就是要有高山遮挡，特别是在北面，这会使得来自北方的寒风不能够直接侵入，从而使阴阳二气得在这里缓缓聚集、生机盎然，比如群山环绕的凹地，这种地方用《易传》的话讲，就是“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反之，坏的“风水”就是大风猛吹的“当风”之地。

什么是水

什么是水呢？

在现代人的眼里，水是由水分子组成的，而水分子则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在古代人的眼里，则完全不同。

在《周易》里，用坎卦代表水。坎卦的上面和下面是两个阴画，中间是一个阳画。这就是说，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物质——它可以蓄载阴阳二气，使得它



自身具有相应的气场效应。按照古人的话来说,水是“阴精”,“内阳外阴”,“阴中有阳”。

由于各地地理环境不同,具体的阴阳二气配比不同,各地的水所带气息也就不同,在普通人眼里一模一样的“水”也就不尽相同了。

所以,古人用不同地方的水冲泡同样的茶叶,会喝出不同的味道。比如有故事说当年王安石让苏东坡取水上游,在船上顺流而下的苏东坡不小心睡过了头,只好取中游的水给王安石煮茶,希望蒙混过关,不料茶端上来王安石喝上第一口就尝出不对味了。

再比如,中国人经常说“水土不服”,意思就是说这不同地方的人对当地的水的气息会比较适应,乍换一个地方喝水,脾胃稍差的人就可能要拉肚子了,特别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水土差异。

水的这种差异也集中体现在酿酒上。一个地方的酒的品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水决定的,如果换一个水源,即使使用相同的原料和加工工艺,所造出来的酒还是会有很大不同,无论是白酒和啤酒都是这样,所以说虽然是同一个品牌,产地不同,风味也就差异很大。当然,经过加工处理以后的纯净水,其所含气息的特征差异就很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一搞,水里面的可以对人体有滋养作用的气息也就几乎被全部清除了,剩下的都是水分子了,所以纯净水对人体来说也就仅仅是起最基本的补充水分的作用了。

总之,在“风水”这个学问里面,水很重要,它可以对气进行蓄积和涵养,水的流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气的流转。至于长江大河,它们所蕴含的气息就更是宏大,往往对一个地区的“风水”环境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不流动的水就是死水,比如死水潭,它会对周围的“风水”环境起负面作用,而城市里的污水河沟,也一样是浊气逼人,周围“风水”可想而知。可惜,想要在大城市及其周围看到山清水秀的景色,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难了。

几条简单的风水规则

古人上千年的经验积累下来,有很多口诀似的风水“规矩”。这些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住宅或店铺风水好坏的基本参考。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是全对,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在作出结论之前还要注意把其他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周易》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注重研究阴阳二气的流动变化,“易”字的最基



本的含义就是变化。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嘛，说“风水轮流转”——既然人家“风水”是转动变化的，死抱着条条框框不放也就非常不明智了。

知道了什么是“风”，什么是“水”，就一起来看看几条简单的水风规则，看一看是否有合理因素。

(1) 从风水上来讲，屋子小、人口多，比屋子大、人口少好。

屋子小，居住人口多，由于人的气场运转，这会使得屋内气场充足、活跃，阴阳二气的配比更加合理，这就对人的健康有好处。如果房屋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只住一两个人，屋内的气场就基本上都是自然气场，“人气”明显不足，自然气场对人体气场就会有明显作用，久而久之，这可能会对居住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2) 家门口不可以正对着马路、河流以及湖泊。

古人说：“凡宅不居当冲口处”，“凡宅开路门及车门，不要直射”。为什么呢？因为就气息流动来讲，人来人往的大路，与一条奔涌的河流一样，气流都是很强的。如果门口正对着直直的马路，就相当于有猛烈的大风从门口不断吹入，对住户是很不好的。所以，古代的大户人家，不管是不是正对着马路，只要大门很宽，往往要在大门里面砌上一面墙，这叫“照壁”，就是要把气流的速度减慢。

(3) 对于院落来讲，要前低后高。

古人对这一点很注意，有“凡宅起屋，前低后高，主发财禄兴旺”，或“前低后高，代出英豪”的说法。反之，“前高后低，张幼昏迷；后低前高，一生奔逃”。因为院落的前面，是气息流动的进口，只有让气流由前到后进入整个院落，才可以使院落里的气场生气勃勃。如果前面过高，导致气息流动受阻，院落里就会死气沉沉，对人也会有负面作用。

在《周易》理论里，北方是坎宫，属水，水的性质是“润下”，要往下流，而南方是离宫，属火，火的性质是“炎上”，要往上升。所以风水理论认为，北方地势应该高，南方地势应该低，这样水火才可以互相作用，阴阳交流，形成“水火既济”的良好态势。

(4) 八卦与八风。

根据《周易》理论，按中国地理区位而论，八卦对应着八风——八个方位的风作用各不相同：

东北方向的风，属于艮卦，叫“凶风”，就是凶恶的风；

正北方向的风，属于坎卦，叫“大刚风”，即特别刚猛的风；



西北方向的风,属于乾卦,叫“折风”,摧折之风;

正西方向的风,属于兑卦,叫“刚风”,刚猛的风;

西南方向的风,属于坤卦,叫“媒风”,有媒介、调和作用的风;

正南方向的风,属于离卦,叫“大弱风”,特别温和的风;

东南方向的风,属于巽卦,叫“弱风”,温和的风;

正东方向的风,属于震卦,叫“婴儿风”,对生长发育有良好作用的风。

因此,风水里面最好是“山环水绕”,形成聚气的形势。“山环”,即在几个重要方位要有群山环绕,它的首要功能是保护——把有不良作用的风抵挡住,具体来讲:

正西要有山,用以遮挡从西面吹来的“刚风”;

西北要有山,用以遮挡从西北方吹来的“折风”

正北要有山,用以遮挡从北面吹来的“大刚风”;

东北要有山,用以遮挡东北方吹来的“凶风”。

西南不能有山,否则就会遮挡西南方向吹来的“媒风”;

正南不能有山,否则就会遮挡正南方向吹来的“大弱风”;

东南不能有山,否则就会遮挡东南方向吹来的“弱风”;

正东不能有山,否则就会遮挡正东方向吹来的“婴儿风”。

中国风水学有:“气遇风则散。”这种使气散的风便是折风、刚风、大刚风、凶风四种猛烈的风。中国风水学又有:“风为送气之媒。”这种送气之风指的便是东方来的“婴儿风”、东南方来的“弱风”、西南方来的“媒风”和南方来的“大弱风”。

龙脉——山脉

古代很多人都研究“风水”,很多帝王也对此笃信不疑。他们认为,凡是开国建都,都要选好龙脉,这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那么,什么是龙脉呢?

简单讲,龙脉也就是山脉,是连贯一气的山脉。在《周易》里,用艮卦代表山,艮卦的上面是一个阳画,下面是两个阴画。就是说,山不仅仅是一座实体的山,它还蕴含着阴阳二气。如果是连绵起伏的山脉的话,这阴阳二气就充沛而又连贯,就像是一条蕴含着“生生之气”的河流,在大地上纵横奔腾千万里,作用非常之大。古人认为,在自然界的动物里只有能量巨大的龙才可以与之相配,所以形象地称



呼这种连绵起伏的山脉叫龙脉——对应的，把大的河流叫做水龙。如果把整个中华比作一个人的身体的话，那么，龙脉就是人体看不见的经络，长江、黄河、珠江、淮河就是看得见的血管，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华大地的血脉，里面同样都有勃勃生机在不停地跃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称呼祖国大地为“万里山河”，反抗侵略叫“还我河山”，可见，河与山一直都是并列的。

古代学者指出，中国的龙脉，发端于昆仑山，所以他们又把昆仑山叫做“祖龙”。由祖龙分衍出两大行龙，即南龙、北龙。

南龙出昆仑山，过三危山、积石山，跨过黄河，至终南山与北龙分派，向南过上洛，过汉水，至荆山，沿大巴山脉向东南，过长江，至衡山，循南岭往东，在福建、浙江入海。南龙龙脉在南京（古代称金陵）形成虎踞龙蟠之势，南京被认为是建都的好地方——三国时孙权就建都在这里。

北龙一样是出于昆仑山，向东过三危山、积石山，跨过黄河，过终南山、华山，再跨过黄河向北转弯，过王屋山、太行山，沿燕山山脉向东直到辽东渤海湾为止。北龙龙脉有鸭绿江、黄河前后簇拥，一口气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沈阳等古都串联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心。不用说，古人眼中的北京就是一块建都的风水宝地。

要科学，不要迷信

当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风水”已经很难被正确理解了，对于它，普通人甚至缺乏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人谈“风水”而色变：“这不是迷信吗？”也有一些人盲目相信，居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放在“江湖术士”手里，任其宰割，可笑，可叹。

应该说，中国古代风水里面还是有“合理内容”的——一方面是生态，一方面是心态，我们应该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把这些“合理内容”挖掘出来，尝试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来验证、解释。这恐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当然，对那些挂着“风水”招牌、骗人钱财的“江湖术士”，我们都可以嗤之以鼻：

“我不信‘风水’！你骗不了我！”



第九日

重现古文明之光

——《周易》与自然科学

一、易学与中国古代天文

繁星点点，深邃宁静，像恋人的眸子在幽幽凝望……

每一次仰望夜空，都有人发出如此感叹：夜空为什么如此美丽，如此吸引人呢？它对我们人类的感召是这么强烈，简直让人有向上飘飞、投身其中的冲动！难道，那里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园？

——想多了头会很疼的，还是来听听祖先给我们讲的宇宙传奇吧！

宇宙传奇之诞生篇

古人说：无中生有。

既然有形的事物是从“无”产生的，那么天地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所以古人又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根据《周易》理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宇宙产生的最初四个阶段。太易——是元气产生之前的原始混沌状态；太初——是最初产生的未定形的元气；太始——是最初产生的气的形状；太素——是最初产生的有形之气的性质。

太易之后，太初、太始、太素依次产生，元气、形状、性质都已经具备，但是相互之间还没有分离，所以叫做浑沦。所谓浑沦，是说万物浑然一体，尚未相互划分开来。它看不到，听不见，摸不着，所以叫做“易”。易没有形状，它变成为有形的太极——人们所熟知的太极图就是对“太极”形象的具体描绘。

太极变化而分为阴阳二气，这就是形变的开始。在变化的过程中，清轻的



气上升成为天，浊重的气下降成为地，在阴阳二气交会的和气中产生人。所以，天地交合化生精气，万物和人得以产生。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天地经过一个周期的运化，也会消亡，但是它们还会再一次产生。宇宙是无限的，这样的产生与消亡也没有穷尽。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本来就没有开始，所以也就无所谓消亡。它本来就是无形的，所以也就无所谓穷尽。凡是产生的事物必定会消亡，有形的事物必定会转化为虚无。如果能让消亡终止，那就是不懂得自然的规律。拿我们人来说，人的精神——阳，属于天所有，肉体——阴，属于地所有。属于天的性质清轻就会离散，属于地的性质浊重就会凝聚。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精神——阳，返回天，而肉体——阴，返回土地，所以叫做鬼。鬼的名称来源于“归”这个词，意思是说：所谓鬼就是人死后返回到他真正的归宿。

人从出生到死亡，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婴儿期、少壮期、老年期、死亡期。人处在婴儿时期，心意专一，元气最为淳和，任何外物都不能迷惑，本性最为纯正。人处在少壮时期，血气旺盛，欲望强烈，外物逐渐浸染，本性就衰退了——不知身在何处，又不知心在何处，只好错认他乡为故乡。人处在老年时期，欲望减弱，身体也很安定了，也就没有什么外物要争夺了。所以说，老年人虽然不如婴儿时期的本性纯正，但是比起少壮时期来，就强一些了。人到了死亡的时候，就走向消亡，返回到他的本原去了。

所以能数得清的是人体的阴阳，所以它符合阴阳的规律，而且可以用类推的方法求得。阴阳的基本法则可以用类推的方法，由十推百，由百推千，由千推万，乃至无穷。但天地宇宙间的阴阳变化是无法计数、无法类推的，只有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推求。所以《周易》中的“易”就有三重含义：简易、变易、不易。《周易》就是“简易”，就是要在“变易”中把握“不易”。

宇宙传奇之运化篇

根据《周易》理论，虽然可以用“抽象”的六十四卦来大致把握无形的阴阳二气的总体运化情况，但是就阴阳二气的具体运化而言，用语言很难说清楚，只能大致说一说。

总体而言，天地运动变化的作用，在天使天显出星象，在地使地生成万物的形态，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循行天空，五行之气附着大地。所以说大地



主要是运载——运载由五行之气所生成的有形的万物，天空主要是运行——运行日、月和五星，运行天上的精气。大地上有形的万物与天上精气的关系，犹如树根与枝叶一样密切，虽然宇宙辽阔遥远，但通过观察天象，还是可以了解的。

《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由下卦和上卦组成的。就是说，天气在上，地气在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间的气由上升而下降，下降是天气的作用；由下降而上升，上升是地气的作用。天气下降，气就下流于地；地气上升，气就蒸腾于天。所以天地之气上下相互感应，上升下降互为因果，产生了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

大地位于人的下面，宇宙的中间。依靠了大气的力量，高高地被托举在宇宙之中。而人类是生活在大地之上，天地之气相交，人类就是生活在天地二气的交汇之中。所以说，人体必须顺应天地之气的变化，万物也必须依赖天地之气的的作用才能正常生化。

具体来讲，对人体发生作用的天气可以分为六种：寒气、暑气、燥气、湿气、风气、火气，它们可以和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厥阴——对应起来。

燥气的作用是干燥，暑气的作用是蒸发，风气的作用是运动，湿气的作用是润泽，寒气的作用是坚实，火气的作用是温暖。所以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位于中央，火气游行于诸气之间，寒暑往来，一年之中，六气运动影响大地，因而生化万物。因此，燥气太过地面就干燥，暑气太过地面热度就增高，风气太过则地面上万物振动，湿气太过地面就潮湿，寒气太过地面就开裂，火气太过地面就坚实固密。

对人体发生作用的地气可以分为五种：金气、木气、水气、火气、土气，也就是五行。

宇宙传奇之太阳-月亮篇

宇宙中充满了气——阴阳二气，日、月、星辰看起来好像是悬浮在虚空之中，实际上它们的运行都依赖大气，因而表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如太阳每运行一度，月亮就行十三度；众星随季节变换升降，北斗星不参与众星升落，始终高悬天顶……这些规律性虽然可以用万有引力来解释，但却是大气运行的规律使它们如此——这就是“第一推动力”了。

前面说过，阴阳二气，即阴气和阳气，其中阳气有运动、发散、上升、清轻和



温热的特性，阴气则有静止、凝结、下降、寒凉、沉浊的特性，正是由于阴阳二气的特性形成了天地。天是阳气的聚积，由于阳气扩散、轻清，不停地运动，因而没有形体。地是浊阴的堆积、凝结，沉重而混浊，因而积累的阴气成了具有形体的大地。

那么，天空中的星星呢？

星星的星体是由阴气凝聚而成，但是它们却是由阳气包围、推动着的，所以它们对我们人的作用是阳气为主，比如说太阳就是这样。月亮则相反，它对我们人的作用是以阴气为主。

月亮——古人叫它太阴——和太阳，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所见到的最大的、离我们最近的星体，它们分别代表了阴气和阳气（看看“阴”字和“阳”字的写法，一个有“日”，一个有“月”），对人类生活产生巨大作用。

关于太阳，《周易》里记载了三次太阳黑子：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它们分别是第五十五卦《丰》卦的六二、九三、九四爻辞，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太阳黑子记录。所谓“日中见沫”、“日中见斗”，就是在太阳上见到泡沫状、斗筲样的黑子。祖先们认为，太阳黑子的出现，标志着阳气将发生强弱转换，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我们比祖先们更加明确地知道，由于核聚变反应，太阳每秒钟都在产生巨大的能量，它的表面温度有 6 000 摄氏度。而有时候，太阳表面会出现太阳黑子。黑子是太阳表面可以看到的最突出的现象。一个中等大小的黑子大概和地球的大小差不多。黑子的形成和消失要经历几天到几个星期不等。当强磁场浮现在太阳表面，该区域的背景温度缓慢地从 6 000 摄氏度降至 4 000 摄氏度，这时该区域以暗点形式出现在太阳表面。在黑子中心最黑的部分被称作本影，本影是磁场最强的区域。本影周围不太黑、呈条纹状的区域被称为伴影。黑子随太阳表面一起旋转。从地球上看来，黑子大约经过 27 天完成一次自转。赤道附近的黑子比极区的黑子旋转得要快一些。黑子群，特别是伴有复杂磁场的黑子群常常是太阳耀斑爆发的位置。

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是 11 年左右。在地球上，蝗灾约 11 年大爆发一次。



太阳活动愈烈，蝗虫生得愈多。人类的很多疾病都与太阳的这一个周期有关，如伤寒、霍乱、猩红热、脊髓灰质炎、传染性肝炎、痢疾、破伤风等。

那么，月亮呢？

《周易》里三次提到了月亮，而且都是满月：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它们分别是小畜卦上九爻辞、归妹卦六五爻辞、中孚卦六四爻辞。

我们知道，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月光，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面，再从月亮反射到地球上来的光——这似乎就是古人把月亮叫做“太阴”的原因。在同一时间内，月亮只能被太阳照亮一半，而背着太阳的一半是黑暗的。同时，月亮绕地球转，又跟着地球绕太阳转，所以月亮对地球和太阳的位置，也在不断地变动，月亮对着我们的这一面，被照亮的部分有时有，有时无，有时多，有时少，这就形成了月亮的圆缺循环。

当月亮转到太阳和地球之间，这时月亮以背着太阳光的黑暗半球对着地球，我们便看不到月亮了，这叫做“朔”，它出现在农历的每月初一。

从朔日后的第一天，太阳一落山，月亮已经在西方地平线上了，往后每隔一天，月亮的位置就向东移一点，而它的形状像一把狭窄的镰刀，一天一天地肥胖起来，到七八天后，它以明亮和黑暗各有一半朝向地球，这时太阳一下山，它已经是悬挂在天顶的半轮明月了，这叫做“上弦”。其明亮半圆的直边朝向东方，一般出现在农历每月初七或初八、初九、初十。

再往后，月亮的明亮部分越来越大，到了地球处在太阳与月亮之间，这时月亮被太阳照亮的半球正对着地球，太阳正当落山时，月亮便从东方升出来，我们整夜可以看到一轮圆整的明月，这叫做“望”，出现在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十七日。

望日以后，因为这时月亮继续向东移动的缘故，月亮上升的时刻，一天比一天推迟，同时月亮的明亮半球朝向地球的部分，看起来也一天比一天少，到了望日后七八天，月亮又以明亮半球和黑暗半球各有一半朝向地球，又成了一个半圆形，这叫做“下弦”。其明亮半圆的直边朝向西方，一般出现在农历每月二十或二十三、二十四日。这时月亮到半夜才升起来，直到第二天上午，还可以在太



阳的右方天空看到它。

下弦以后，月亮的明亮半圆逐渐向内凹曲，变成镰刀形，而且一天比一天狭窄。这时月亮东升的时刻一天一天地接近太阳出来的时刻。最后又回到太阳同一方向，也就是月亮又转到太阳和地球之间，它又以整个黑暗半球朝向地球，又成为无月之夜的朔日了。

那么，月圆之夜有什么特殊吗？是很特殊。《周易》里提到三次满月，就是因为月圆之夜前后，阴气达到极盛，人会有心理、生理异常出现。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月亮的这种周期运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所谓“月经”，就是从四个星期——接近一个月一个周期的意义上来讲的。

现在，经过长期观察，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月亮周而复始的圆缺变化与人的情绪很有关系：在月圆时人们容易激动。据报道，满月时刑事案件增加，精神病人啼哭者增加。每年中秋佳节，皓月当空，远离家乡者会思念家人，合家团聚者会激情勃发，这都不是偶然的，是圆圆的月亮在强化人们喜、怒、哀、乐等情绪。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吟咏月亮的诗歌也是必然的了。试想，诗人们站在皎洁的月光下，一股“阴气”从脑门直流到涌泉，灵感呼啦啦乱跳乱蹦——诗人们当然一个个都是诗兴大发，不得不发了！

二、《周易》与现代物理学

阴阳是《周易》的最基本的理念，但究竟什么是阴，什么又是阳呢？这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话，那《周易》可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了。与当代物理学发展的最前沿——对“反物质”的探求——相比较，可以引出一系列颇有趣味的思考：如果“阴”是普通物质的话，那么古人所说的“阳”，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呢？“阳”，是否就是“反物质”呢？

阴、阳，中国古代的物质概念

《庄子·杂篇·天下》里说：“《易》以道阴阳。”按照最直接的理解，这句话是说，《周易》是讲述“阴”和“阳”的道理的书。确实，《周易》书中的六十四卦都是



由阴爻和阳爻组成的。其中，乾卦和坤卦比较特殊：乾卦六爻全部是阳爻，坤卦六爻全部是阴爻；而乾卦和坤卦在六十四卦里也特别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阴，什么又是阳呢？

现在凡是学习过一点哲学的人都能比较容易地给出一些答案，特别是熟悉辩证统一规律的人，比如“动静”、“刚柔”、“起伏”、“进退”、“明暗”以及“雌雄”、“男女”这些相对的概念。就一定程度来讲，这些都对，但又都不是“阴”和“阳”的本初的含义。

就现在的一般观点，“阴”和“阳”两个字的意义在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那里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阴”是暗的意思，“阳”是高或明的意思。应该说，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所给出的解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为，“阴”和“阳”这两个字在中国很早就开始广泛使用了，比如《诗经》和《尚书》里都多次出现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相信，在古人造字之初，“阴”和“阳”是很简单的两个相对的概念。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最初的文化创造中，非常注重直观，他们往往用最简单的概念直接把握住本质世界。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文字，还是在中国哲学中，都体现得非常充分。所以，归根结底，“阴”和“阳”是最基本的关于物质的简单概念。正如《庄子·杂篇·则阳》中所说的：天和地，在有形体的“物”中是最大的概念；阴和阳，在没有形体的“气”中是最大的概念，“道”则总括一切。古人认为：“天”是气中“轻清”的那部分——“阳”——上升飘拂而成的，“地”是气中“重浊”的那部分——“阴”——下降凝聚而成的。

所以，“阴”和“阳”的准确含义是指组成世界的两种基本物质，即“阴气”和“阳气”。相对而言，“阴气”比较沉实，所以容易下降，而“阳气”比较清扬，就是轻飘飘地容易往上浮。“天”是“阳气”凝聚成的，而“地”是“阴气”凝聚成的。在这里“天”和“阳”是一类，“地”和“阴”是一类；在总体上，物质世界被分为“阳”和“阴”两部分。

古人把物质世界分为两部分，这一点似乎很好理解，因为这是中国古代人对宇宙基本物质组成的认知。中国从远古时代就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最初的混沌中，巨人盘古醒来了，他举起大斧，把本来含混一团的天和地劈开来。这与易学中“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原理十分契合，简直就是“太极生两仪”的人格化的民间通俗讲法。

但是，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古人除了把物质世界分为“阳”和“阴”（或“天”和



“地”)两部分之外,还对物质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描述,就是说,“天”和“地”是物质的聚合状态的存在,“阴”和“阳”是物质的离散状态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就现今物理学的研究来看,物质的存在方式的确有两种:

第一种是不连续的粒子状态,即凝聚态物质,中国古人称之为“物”。一般的气态、液态、固态物质都是属于存在方式,我们生活中见到的有形体的物质,比如桌子、椅子,以及地球、太阳,它们有一定的形态或体积,都是由基本粒子聚合而成的;而气体虽然是弥散的,但是这种弥散只是其基本组成颗粒之间距离的随意扩大,其基本组成颗粒则一直保持不变,或是分子或是原子,所以气体实际也是由基本粒子聚合而成的。

第二种是连续的波或场的状态,即弥散态物质,中国古人称之为“气”——注意,这里的“气”是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现在汉语里所讲的空气的气——现代科学称之为“场”。比如我们目前所知的磁场、电场以及电磁波等。在这种弥散态存在方式中,物质没有形体和大的组成颗粒,可以看作是连续地存在于空间之中,可以同时使大范围的空间受到作用,这与凝聚态物质颗粒集中作用于空间一点是截然不同的。当然,由于“波粒二象性”原理,同一物质可以以凝聚态存在,也可以以弥散态存在,比如光。

所以,古人所说的“阴”和“阳”主要是指弥散态物质,“天”和“地”主要是指凝聚态物质,而《周易》就是讨论“阴”和“阳”两种弥散态物质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一本专著。

反物质,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

我们知道,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具有一定的质量,在地球上,质量表现为向着地心的重力;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而原子是由原子核外的带负电的电子、原子核内的带正电的质子、不带电的中子三种基本粒子构成的。那么,通常的这种物质就是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全部吗?不是的,至少还有另一种物质——反物质。

什么是反物质呢?反物质就是由反粒子组成的物质。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些反粒子的特点是其质量、寿命、自旋、同位旋与相应的粒子相同,但电荷、重子数、轻子数、奇异数等量子数与之相反。例如,氢原子由一个带负电的



电子和一个带正电的质子构成,反氢原子则与它正好相反,由一个带正电的正电子和一个带负电的反质子构成。物质和反物质相遇后会湮灭,释放出大量能量。

1931年,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1902—1984)大胆提出了“反粒子理论”,因为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而遭到诸多同行的百般嘲弄:粒子还有反的吗?你拿个反粒子出来我看看!但是过了不久,美国科学家安德森(1905—1991)就给予“反粒子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支持:他在实验中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正电子的发现,毫无疑问地引发了科学家们新的探索之旅:1955年,反质子在美国的一家实验室中被发现,其后人们又发现了反中子。到20世纪60年代,所有基本粒子的反粒子差不多全被人们找到了。而最简单的反物质——反氢原子也被人们制造出来了。

为了探索反物质之谜,科学家在实践上采取了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反物质,进而从更多的角度研究反物质。1995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世界上制成了第一批反物质——反氢原子。科学家利用加速器,将速度极高的负质子流射向氦原子核,以制造反氢原子。由于负质子与氦原子核相撞后会产生正电子,刚诞生的一个正电子如果恰好与负质子流中的另外一个负质子结合就会形成一个反氢原子。在累计15个小时的实验中,共记录到9个反氢原子存在的证据。由于这些反氢原子处在正物质的包围之中。反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反物质。因此它们的寿命极短,平均寿命仅为30纳秒(一亿分之三秒)。1996年,美国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成功制造了7个反氢原子。此后,在实验室中制造反物质的工作受到很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2000年8月10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用于制造反物质的反质子减速器投入使用。2002年9月18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宣布,成功制造出约5万个反氢原子,这是人类首次在受控条件下大批量制造反物质。科学家认为,能够大量地制造反氢原子,对准确比较物质与反物质的差别、解答宇宙构成等问题将有重要意义。

研究反物质的第二种途径是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研究反物质的自然状态。1997年4月,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五个著名研究机构的天文学家宣布,他们观测到了在银河系上方约3500光年处,有高于可见光强25万倍的伽马射线源,这可以间接地证明反物质的存在。



2003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发现太阳耀斑爆发形成了反物质。他们分析了高能太阳分光卫星拍摄到的2002年7月23日太阳耀斑爆发时的图像,研究发现此次耀斑爆发形成了大约半公斤反物质,证实了科学家关于耀斑爆发期间被加速的高速粒子与慢速粒子碰撞可能会形成反物质的推测。但与科学家预期有所不同的是,反物质形成后并没有在原地与正物质碰撞湮灭,而是被耀斑爆发瞬间带到另一个地区,然后湮灭。由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主持的国际空间站磁谱仪实验,其实验目的就是为了在地球外太空寻找反物质以及暗物质粒子。

关于反物质的用途,目前物理学界对它可预测的应用是:由于物质与反物质相遇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地球能源日益短缺的今天,无疑提供了一种解决困境的可能;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在未来携带反物质进行星际旅行,可以大大减少所携带的燃料的质量:比如将氢和反氢混合湮灭来获得能量,0.01克的这种燃料所产生的推力相当于120吨由液态氢和液态氧组成的传统燃料。

阳,就是指反物质吗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对物质世界的描述与现代物理学有非常一致之处,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普通物质相对应,存在着另外一种物质,它的性质与普通物质是相反的,甚至于这种物质还可能组成一个与我们的世界相对应的“对称世界”。

中国古人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地”相对应,有一个“天”,即天上世界,自古相传的神话传说对此不乏充满想象力的描述。和我们现代人的理解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古人所说的天、地和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天和地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天和地,即我们头顶着的蓝天,脚踩着的大地,甚至我们用天文望远镜所看到的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只要是由普通物质构成,都还是仅仅局限在古人所说的“地”的范围内。因为依照古人的概念,他们所说的“地”就是指普通质量物质世界。

而随着现代物理学反物质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雄心勃勃地进军太空了:1998年6月2日,“发现号”航天飞机从美国宇航局的肯尼迪航空中心起飞,它载有2吨重的阿尔法磁谱仪的一个小型组件。



除了搜寻反物质粒子、反物质小颗粒外,科学家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在宇宙中寻找由反物质构成的星体,甚至一个由反物质组成的世界。很多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早已迫不及待,他们早早地把反物质写进各种各样的科学幻想小说里,比如依靠正电子确定行进路线的智能驱动机器人,用反物质驱动的超光速宇宙飞船,以及用以星际航行的反空间——反物质隧道。

但是,中国古人和现代物理学对“另外一种物质”所具有的相反性质的描述还是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现代物理学所说的反物质,它只是基本粒子所带电荷正负与普通物质相反,其质量仍然是正的,这与普通物质相同。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或者“阳”)的质量似乎是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阳”物质做成的一个物体,如果我们站在地面上把手放开,让它做普通物质的自由落体运动,它不仅不会下落,反而会往上升,而且越升越快。这就是中国古人对“阳”物质性质的描述:“清轻而上浮”的意思。

再比如,占物质世界的总体组成比例:中国古人所说的“阳”物质与“阴”物质应该是各占物质世界的50%;而最新物理科学观测发现,宇宙由23%的暗物质、73%的暗能量、4%的普通物质组成,其中凝聚态的反物质所占的世界总体质量比例微乎其微。

最关键的是,就目前现代物理学界所知道的情况,由于反物质与普通物质一相遇,就会发生物质湮灭,放出核爆炸般的巨大能量,所以反物质与普通物质应该彻底分隔开来。我们可以根据著名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来计算出物质湮灭具体的能量大小,即只要1克质量的普通物质与1克质量的反物质相遇、发生湮灭,就可以释放 9×10^{13} 焦耳的能量。这些能量到底有多大呢?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这些能量可以把10万吨的物体一下子提升到90千米的高空,所以物质湮灭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就很可能由反物质引起的,其爆炸当量相当于1000至1500万吨TNT炸药(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当量分别为1.25万吨、2.2万吨)。

而中国古人所说的“阳”物质与“阴”物质应该是含混在一起的。如果“阳”物质与“阴”物质也会发生物质湮灭的话,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分离机制,即目前现代物理学还没有探明的物理原理把二者分隔开来,以保证不会发生剧烈的物质湮灭。



把疑问留给未来

所以,大致上讲,中国古人所说的“阳”,不是目前现代物理学所说的反物质。《周易》里面所讨论的“阴”和“阳”两物质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仍然难以用现代物理学加以阐释,只能等待未来的科学发展来解决。就《周易》研究而言,现阶段用中国传统的学术语言——“阴”和“阳”来进行表述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表述方式。

三、科学易

《周易》在历史上曾被人看作是占筮迷信,这主要是因为《周易》具有在今天被认为是迷信的形式和外衣——占筮,再加上它被不当、错误地应用,由此导致了视《周易》为占筮迷信的观点。但《周易》本身的内容并不是占筮迷信。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所谓的“迷信”和“科学”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古代的科学可能在今天被认为是迷信,但在当时恐怕是科学发展历程中必经环节,它也具有科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第二,哪怕是科学本身,当其本身被错误地应用或教条地应用时,也和迷信差不多。例如,当前有学者批评现代社会充斥着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这个“科学主义”不就是从科学滑向了迷信的一种思潮吗?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周易》,或者说把《周易》与现代科学相互对照而展开研究的学术流派及其理论著作,被称为“科学易”。需要注意的两点是:第一,把《周易》与现代科学的既有理论和成果相对照,可以加深我们对《周易》的理解,从而对《周易》本身有进一步的说明。第二,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和角度对《周易》进行各种研究和阐释,就这种研究方法而言学术界还存在很多争议和质疑,古代人的思想和现代科学还是需要作出明确的区分,不可以把二者完全混为一谈。我们需要牢记:“真理再向前迈进一小步就是谬误。”

根据“科学易”的研究,《易经》蕴含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广泛的科学知识,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即如《系辞》所言“广大悉备”。就数学而言,它蕴含了全部近代数学思想,不仅包括二进制、十进制数学,而且还包括勾股定律、黄金分割律、排列组合、求极大极小率、概率、大衍求一术、二项式定律、余数定理



等等。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原则、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等，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某些内在而深刻的联系。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渊源的炼金术，就是凭借《易经》的阴阳学说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生理学中双螺旋理论（即 DNA 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是因 DNA 中的 64 种核酸数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数目相符合。当代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生态学问题，其本质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材”思想之间的联系。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科学易之实例

1987 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哈林顿宣布：太阳系存在第十颗行星，并称这是千真万确、毋庸置疑的。这一宣布使人类有可能解开两个玄妙的宇宙之谜：一是 19 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二是 26 000 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但是最早预测太阳系第十颗行星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旅法学者刘子华于 1940 年在巴黎用《易经》八卦原理推算出来的，并且计算出第十颗行星的密度为 0.424 克/立方厘米（水的密度为 1），轨道运行速度为 1.689 公里/秒，离太阳平均距离为 74 亿千米，以 179 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他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使世界震惊。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说：“他费了许多考证和智慧显示出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的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称：“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如此与最近四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物理学家卡普拉在 1975 年出版了《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的探讨》。他后来在该书第三版（1991 年版）中归纳了有关科学的六个新观点，并强调它们在东方传统思想中都有类似的观点：第一，整体和部分关系，从把了解部分性质为主转为把整体放在主要地位。第二，从考虑基本结构为主到重视过程。所观测到每一结构都是其潜在过程的表现。第三，从客观科学到认识科学，在研究自然时不能不谈到自己（测不准原理）。第四，承认基本定律、基本原理等作为知识基础的经典观念亦在变化。把我们的描述、概念、模型、理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存在基本原理等。第五，从发现“真理”走向近似描述。第六，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主宰态度转向两者的



合作和非暴力。特别要说的是，卡普拉从许多方面比较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经》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思想的相似处。他认为：现代物理学与《易经》都把事物的变化看成自然界的本质，而由变化产生的结构及对称性只是第二位的。《易经》具有通过变化产生的动态模式的观念，可能与现代物理中的S矩阵理论最为接近，八卦图同强子八重对称性类似。他的论著问世后，对世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美国地质学家特奇根据八卦归类、推理的系统结构，撰写出专著《地球构造图》。他把地球划分为八块，以此来论述地震和各种矿床分布。

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的观点。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博士说，他之所以怀疑德国舒氏的奇偶性不灭定律，与他在西南联大时读《易经》有关。

《易经》的博大内涵，对现代语言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荷夫，运用《易经》八卦来分析英语中的单词。他把每个单词的形、声、义用八卦中的爻来表示，相同者为阳“——”，相异者为阴“— —”，进而把所有的英语单词归之于八种结合。为当代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

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田新亚认为，八卦可以比拟于元素的八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性质有多处是可以对应的符号。易卦排列能和组成物质的元素内在组织上的周期性适应。此外，尚有特具的显示功能，是已有元素周期表所不能表达的。按《易经》原理推断，化学元素决非现在的100多种，应该更多，现在已被科学所证实。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管理易”，把《易经》思想运用于管理科学，推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国际易经研究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成中英，吸取中国《易经》文化而提出管理新理论，即“C”理论，他说：“中国的易经有两个作用：一为察微知变，就是透过细微的东西，作为判断；一为变通入神，在变通当中，了解对方的心理。这些都是管理的软件。”有人认为日本管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应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孙子兵法》，70年代研究《三国演义》，80年代研究《易经》。许多科学



家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正在由近代分析潮流为主的阶段转向以整体综合潮流为主的阶段,中国《易经》中一些哲学范畴、思维模式,更加符合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图景,特别是《易经》的天、地、人的自然界一体理论,独特的象、数、理思维方法,是启迪科学家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难题的思想体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在推动作用。

据统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闻名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其中有多项与《易经》的理论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些项目是: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理论,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分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如今,世界上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易经》进行研究和探索。



第十日

化成天下

——《周易》影响遍海外

《周易》是中国哲学、也可以说是东方哲学最古老的一部经典，长期以来，它被尊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甚至被认为囊括天、地、人的一切知识，是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经学家，甚至政治家、文学家，都和易学有不解之缘，都学习、研究过《周易》。而他们中的许多学者在对《周易》这部古老典籍进行阐释、解说时，往往根据时代需要和各自的活动领域进行种种的思想发挥，于是易学便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这说明易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影响巨大。

易学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流传海外。在海外，对《周易》的研究与应用，更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

一、《周易》的西语翻译

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单纯的转化过程，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实际上其本身更是不同文化、学术的相互渗透、辐射和影响。《周易》的西语翻译正是体现了翻译这一重要的文化价值。

《周易》第一部西方语译本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中国杭州译出，为拉丁文本，揭开了易学走向世界的序幕。金尼阁曾于



1610年、1620年两次来华传教，同时悉心研究《周易》，他译的拉丁文版《易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西文译本，因此被称为西方易学上的哥伦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 1659年到中国，在上海、苏州、镇江、淮安等地传教23年，他同恩理格、殷铎泽等人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周易》翻译成《西文四书直讲》，书中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之意义，1687年在巴黎出版。法国传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所译拉丁文版《易经》，书名叫《中国最古的书》，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

第一本英文版《周易》是英国传教士麦格基于1876年译出，由于该书杜撰成分过大，被西方某些评论家评论为败笔之作。由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51—1897)翻译，1882年在牛津出版的英文版《易经》，尽管冗长、呆板，但是当时在西欧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影响的译本。1963年纽约大学又将其再版。1950年，美国贝恩斯(Cary F. Baynes)根据卫礼贤译本(德文版)转译成英文的《易经》在纽约出版，这本书胜过所有据中文原著翻译的英译本，成为当今西方英语国家通用的“标准译本”，一再被翻印。当代欧洲心理学权威、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英文版《易经》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长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对《易经》给予了极高的肯定性评价。

最早的法文版《周易》出版于1750年，由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译。后又有法国霍道生的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比利时人哈雷兹于188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易经》，成为当今西方通用的法文本。

最早的德文版《周易》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由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译。卫礼贤精通汉语，1899年来华传教，在华居住达25年之久，曾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华期间，他对《易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向中国的易学家、京师大学堂校长劳乃宣和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请教。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周易》讲座。1913年开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译笔简洁流畅，忠实可信，成为理雅各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译本。卫礼贤之子卫德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43年向驻北京的德国人作学习《易经》的辅导报告，1944年将辅导材料整理成书，书名为《周易八论》，成为今



天西方人学习《周易》的指南。1960年贝恩斯将其译成英文。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

早在1679年3月15日,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就用拉丁文写出了创建二进制算术的论文手稿,但是一直被他束之高阁。直到1701年,他才勉强把这篇论文提交给法国科学院,并当众宣读,但是莱布尼茨坚决要求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心里一直很困惑:二进制算术有什么用呢?

确实,与广泛使用的十进制相比,二进制算术似乎是太麻烦了,仅仅是把一个百位的十进制数字写成二进制,也要长长的一溜儿,又非常不好认、不好读。莱布尼茨心里很犹豫,因为从理论上讲,无论是二进制,还是三进制、四进制、五进制、六进制、七进制、八进制、九进制、十进制、十一进制、十二进制,甚至五十进制都是可以的。之所以人们习惯于十进制,就是因为它简便:0,1,2,3,4,5,6,7,8,9,这十个数字可以说是人类智慧千锤百炼后的经典了。二进制,难道仅仅是为了新鲜好玩而发明的一个把戏吗?

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莱布尼茨得知当时的清朝皇帝康熙也是个数学高手:那个神奇的国家,那个伟大的帝王!我应该和他联系。于是,在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给他的朋友、远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写信,希望他能够把二进制算术介绍给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意见。这个请求对于白晋神父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容易办好的差使。

1703年4月1日,望眼欲穿的莱布尼茨终于接到白晋的回信。果然,把二进制算术介绍给康熙皇帝这件事,白晋没有办到。但是,凭着对中华文明的相当深入的了解,白晋敏锐地把二进制算术与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联系起来:如果把阳爻——看作1,阴爻——看作0,那么六十四卦的符号就与二进制有关联了。随着这封信,白晋还给莱布尼茨寄去了宋代邵雍所制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莱布尼茨发现,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里顺序排列的六十四卦恰好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一一对应。这一发现使他兴奋异常,他立即对1679年的论文稿进行修改和补充,发表在1703年5月5日的《法兰西科学院院报》,题目是“关



于只用两记记号 0 和 1 的二进制算术的阐释”，副标题是：“和对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给出的中国古代伏羲图的意义的评注”。可以说，如果没有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话，莱布尼茨这篇论文的内容将非常贫乏，他将无法把符号抬高到他想要的高度。莱布尼茨甚至在这篇文章里认为，是他——莱布尼茨找到了六十四卦的“真正解释”，而对这个“真正解释”，中国人已经丢失了一千多年，此后中国人对六十四卦的解释是，“不知道离得多远的意义”。

到了 20 世纪，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二进制算术作为唯一的电子计算机可识别的算法，成为电子计算机的基础，这也是一个莱布尼茨所说的“不知道离得多远的意义”。

对此，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评论说：“莱布尼茨除发展了二进制算术而外，也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制造的先驱，这并不是一种巧合。……中国的影响对他形成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至少起了部分作用，正如《易经》中的顺序系统预示了二进制的算术一样。”

在莱布尼茨玩赏两张“易图”悟出算理之后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也通过传教士的“媒介”而受到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1767 年，这位享有盛誉的法兰西经济学家发表了《中国的专制制度》的长文。在文章中，他对《周易》一书作了专门的介绍，指出《周易》之中包含许多杰出的政治和伦理格言，这些格言成为中国人学问的基础，同时他还赞扬《周易》卦画之父——伏羲，认为伏羲使中国人开化，伏羲制定了明智和公正的法则，字里行间表露了魁奈对《周易》及其传说中的圣人的景仰态度。魁奈在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创作了《经济表》，这部经济学的古典著作早在 18 世纪便被学者们看成是与《周易》有关的论著。不论是魁奈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在谈论《经济表》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之与《周易》相对照——《经济表》像伏羲六十四卦“能将哲学要义解析明白”，所以一定要把两者并列刊出，互相对照。直到 19 世纪，欧洲的许多学者仍然在探讨《经济表》与《周易》的关系问题。这说明，《周易》一书自 17 世纪以来已在欧洲的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此外，《周易》对德国古典哲学亦有很大、很深的影响和启发意义。19 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凭借中国《易经》取得了伟大成就。黑格尔是 19 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他创造了著名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在西



方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据说,这位大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课堂上,他向听众赞叹《易经》:“《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而且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感叹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广大悉备”的《易经》!

三、太极旗与韩国

亚洲各国由于地缘、历史和文化圈等因缘,较之于西方国家,其接触、研习中国的易经最早。

时常见诸荧屏的“大宝 SOD 蜜”广告说:“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大宝”这一词汇早见于《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过去中国的皇帝登基就常称“荣登大宝”。按照一般的易学理论,从易卦爻象上讲,六爻中最重要的爻位就是第五爻,所以九五、六五爻通常都是很好的位置。在易学研究中有“三多凶、五多功、二多誉、四多惧”的常见说法,第三爻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位置比较尴尬、比较危险;而全卦的功德往往都归于第五爻,这就是通过“守仁”践行而得到的“大宝”之位。圣人如果得到大宝之位的话,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大大地成就一番圣人功业。

“大宝”还是日本历史上文武天皇的年号,从公元 701 年开始,至 703 年终。日本在 702 年,曾颁布“大宝令”。大宝令(亦称“大宝律令”)是日本古代的基本法典,701 年制定,包括律六卷、令十一卷,由藤原不比等纂定,继承以往日本律令,并参考中国唐朝的《贞观律令》和《永徽律令》编制而成。从此奠定了日本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基础,也是大化革新施行成功的重要标志,直到 757 年养老律令颁行之前,一直都是日本国家的基本法典。在“大宝令”中,明确规定学生必须通晓一两部中国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周易》。从此之后,日本历史上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学家和易学著作。

自端午节被韩国人冠以“端午祭”而获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又一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被韩国人瞄上,那就是《周易》。韩国民间已有将《周易》作为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的动向,只不过他们可能会像对端午节那样,将《周易》改得更适合他们的民族文化。在撇开沸沸扬扬的“炒作”因素之后,这种现



象和行动的确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人关注、深思——一切不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韩国国旗——太极旗，自 1882 年朝鲜王朝后期开始被使用，大韩民国建国后继续沿用。1948 年，韩国文教部正式确定韩国国旗现在的样式：旗中央是太极图案，四周配以八卦图形。据韩国官方解释，太极图中的红色代表阳，蓝色代表阴，阴阳合一代表宇宙的平衡与和谐。火与水，昼与夜，黑暗与光明，建设与破坏，男与女，主动与被动，热与冷，正与负等，作为宇宙中两种伟大的力量，通过相互对立而达到和谐与平衡。

以太极为中心，四角的卦分别象征阴阳互相调和，乾卦代表天空，坤卦代表大地，坎卦是月亮和水，离卦为太阳和火，各个卦还象征着正义、富饶、生命力和智慧。据韩国的解释，国旗底色为白色，象征韩国人民的纯洁和对和平的热爱。而整个国旗则代表韩国人民永远与宇宙协调发展的理想。

为什么叫太极旗呢？这是以太极旗中央的“太极圈”命名的——注意，这个“太极圈”虽然借用了中国“太极”这个名称，仔细看来，它与中国的太极图形还是颇有一些不同的：

（1）中国古代的太极图一般都是从左向右顺时针旋转，而“太极圈”则是从右向左逆时针旋转；

（2）中国的太极图是黑、白两色，而“太极圈”则是红、蓝两色；

（3）中国的太极图有两个“鱼眼”，象征阴阳转化，就是所谓的“阴极生阳，阳极生阴”，而“太极圈”则没有这个样式。

（4）中国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是一左一右，而“太极圈”中的两个部分则是一上一下。

有意思的是，有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在中国宋代周敦颐（1017—1073）公开发表“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之前，韩国“就早已理解和活用了与太极旗上所看到的太极图形和太极图所包含的阴阳思想”，该观点有公元 628 年建立的感恩寺的石刻、1144 年某高丽官员的石棺、壁画、民间俗语以及“医学上把病理生理分为阴性、阳性”为证。

并且，这位学者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太极旗上所见到的太极、阴阳和乾、坤、坎、离四卦在原理上取自易理，这是事实，但是太极旗的样式与周敦颐的太极图形或伏羲八卦、文王八卦样式不同，含意不一致，用中国的这些图式也解释不了



太极旗。太极旗是韩国人创造出来的，自然要由韩国人自己来解释。

虽然此太极不是彼太极，但是几千年来，朝鲜半岛一直受中华文化影响，无论如何，韩国国旗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韩国国旗的太极和八卦图形来源于中国的《周易》，这显而易见。

四、20 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周易》文化热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与《易经》

玻尔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之一。他虽然是西方人，但却对中国的《易经》进行过认真钻研，认为在《易经》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玻尔创立的量子力学，其中有一条“测不准原理”。对此，华裔物理学家、同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先生曾经指出，玻尔这个原理与中国《易经》太极图及老子学说有相近似的地方。此言不虚。

当玻尔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学说提出并协原理（亦称“互补原理”）时，总是觉得语言叙述不能充分表达原意，心中很是煎熬。1937 年应周培源先生邀请来中国讲学，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讲学，其间还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六和塔等历史名胜，后来在孔庙内见到了中国的太极图。当他看到由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时大为惊讶，立刻认为太极图就是他的思想最恰当的表现，为此后来他还选择太极图作族徽，象征中西文化的融合。玻尔曾与泡利很有兴味地专门探讨、研究了《易经》。在玻尔指导下工作过的中国学者冼鼎昌回忆说：“听他（玻尔）讲东方哲学与物理认识论的关系，我惊叹于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入了解，开始懂得他以中国阴阳太极图为其族徽图案的道理了。”

用《周易》原理预测太阳系的新行星

刘子华（1899—1992），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将现代天文数据同《周易》理论相结合，以西方人闻所未闻的易学象数思维方法，预测太阳系确实存在第十大行星——此论一出，轰动欧洲。

刘子华是四川简阳洛带镇（今成都龙泉驿区）人，1918 年中学毕业，官费赴



法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医学院。他业余爱好天文，对《周易》情有独钟。当时欧洲人都在谈论太阳系到底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刘子华在法国寓居近20年，掌握西方天文学最新成果，了解天文研究的前沿课题。他查阅巴黎所能获得的近700种易学著作，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易图，特别在意。终于，他从易图中找到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以易图为工具，进行创造性思维和精密数学运算，取得了这个惊人成就。

那么，具体他又是如何推导的呢？

首先，刘子华根据《周易》理论，把八卦与八颗星星一一对应起来。

在1930年，冥王星被发现，人们已知太阳系共有九大行星绕太阳运转，月亮只是地球的卫星。刘子华知道，《周易》理论说得很清楚：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生万物。故在任何存在中，均无不含有太极与阴阳……《周易》理论既能明确地将离卦对应太阳，坎卦对应月亮，坤卦对应地球，那么其余五卦一定也可以配合其余之五颗星球。因此，他遍查易学书籍，终于在明代易学大师来知德《易经来注图解》中，发现一幅《日月五星周天图》，根据这幅图，他进一步把八卦与八颗星星一一对应起来：

震卦对应木星，兑卦对应火星，乾卦对应土星，巽卦对应金星，艮卦对应水星，离卦对应太阳，坎卦对应月亮，坤卦对应地球。

其次，刘子华根据八卦的对偶关系，进一步探讨星星之间对应的数量关系。

刘子华将八卦配偶思想应用于观察天体，发现星球之间有某些相似现象。利用天文学家佛那马雍、爱斯克郎恭提供的研究成果，认为太阳同木星相似，月球同金星相似，地球同水星相似。刘子华把相似的星亦看作配偶，然后将各星球的天文数据代入，经过计算，证明它的确也构成平衡的常数，使他的行星预测工作又前进一大步。

刘子华进一步利用配偶律研究三个王星。从历学古籍《天原历理三书》（1682年徐发圃撰），知有“四隅星”之说，盗星在西南，种陵在东南，天狗在西北，女帛在东北。刘子华将四隅星同三个王星配合，盗星合天王、种陵合冥王、天狗合海王、女帛无星与合。他预感莫非是未知的第十大行星。他继续从易图中探索，发现元代易学家张理《易象图说》内篇，有《先天八卦对待图》，如获至宝。他对此图作了特殊解释，写道：“今按卦加上星球，则见太阳与木星同出于少阴，月球与金星同出于少阳，地球与水星同出于老阴……以此证之日与木、金



与月、水与地之成对相似，确有令人不能不诧异之符合。”

最后，刘子华确定，整个太阳系应是由十二颗星构成的一大家族，其中有初期八大星球，加上已发现的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还有尚待发现的新星——第十颗行星。

基于《周易》原理，他用“家族”模式看待太阳系：阴阳配偶是基本概念，乾父坤母，其余六卦是三男三女均成配偶；八卦与八星（日、月、五星，再加地球）对应，是家族中的基本成员；临、复、姤、遯四卦是一组，又是兑、震、巽、艮四卦之子，所以是属乾坤二卦的孙子辈——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以及未知星正好同四隅卦之子——临、复、姤、遯四卦对应，这样就形成了父母、六子、四孙三代共荣的八卦家族。

刘子华根据八卦家族的系统关系，经过复杂运算程序，终于得到未知星——木王星的几个基本数据，其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2公里，平均密度为0.424克/立方厘米，离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千米。运算程序虽出自卦理，其结果可脱离卦理而独立。刘子华对这一成果非常自信。他说：“以现代天文资料来证实宇宙的真面目能与八卦宇宙学理相吻合。……本书所有引据，纯系现代天文学以优良之工具和最近数世纪若干科学家辛苦研究所得之科学知识，故其结果应毫无疑问地相当精确而完备。”

法国巴黎大学科技史学院院长、刘子华博士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阿伯海尔，没有读过《周易》，更不懂八卦卦理，在反复研究刘子华的博士论文后，他不得不说：“关于科学方面，其结果令人满意。”听说论文是用《周易》八卦理论写成的，论文评审者、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本已拒绝对这个论文进行答辩，经反复考虑，收回成见，同意将论文印交答辩委员会。他对刘子华说：“你拿我们的数字，证明你们玄之又玄的八卦，再拒绝，就等于我们的数字错了。”答辩会议上，刘子华的博士论文获得一致通过，木王星的预测得到法国权威天文学家的认同，引起欧洲学术界的轰动，人们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八卦大为震惊。

《周易》与世界同步

近几十年来，欧洲、美洲、东南亚、日本的学者相继成立了易经研究组织，并在不少大学设立了易学专业，研究范围已由纯理论走向应用科学的领域，涉及数、理、兵、医、艺术等多种学科，出现了“人文易”、“科学易”、“管理易”、“艺术



易”等学术门类。《易经》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我国台湾地区易经学会主办的《易学月刊》发行至世界各地。近几年来,在武汉、北京、济南、安阳等地多次举办国际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安阳举办的《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每年一届,有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参加交流。有关研究《易经》方面的成果和著述层出不穷,仅日本近期就出版了 200 多种。其中主要有 1943 年出版的武内义雄著《易与中庸》,1958 年出版的诸桥辙次著《易经讲话》(五卷本)。1958 年后,先后出版了高田真治著《易经译注》、《易的思想》,宋井宇三郎著《宋代易学研究》、铃木由次郎著《汉易研究》、《易经译注》、《易与人生》、《伏羲八卦方圆图与莱布尼茨二进法算术》,户田丰三郎著《易经注释史纲》,赤冢忠著《易经释注》,本田济著《易译注》、《易学——它的形成与发展》等。

西方人称《周易》为“研究变化的书”。正如英国的《易经》研究者克·巴克斯特说:“仅仅在 50 年以前,西方社会知道《易经》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最近几十年里,《易经》的知名度正在飞速提高,它以实用性和系统性得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承认。”他甚至认为:“人们发现传统的西方关于现实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科学事实。而同时,我们的几位科学巨匠认识到,古老的《易经》令人惊异地接近了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生命的秘密同《易经》十分接近——64 个卦象可以与遗传密码中 64 个 DNA 密码子严格地对应!”

古老的《易经》与世界科学的发展同步。